



# 必有回响

——记21位社会创业家的故事与社会反响



银杏基金会  
GINKGO FOUNDATION



世界说  
GLOBUS

# 写在前面

---

2019 至 2020 年，银杏基金会联合世界说，采访了 21 位在中国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家，向更广泛的大众呈现他们找寻社会痛点、探索社会创新的故事与心路历程。

他们在生态环保、教育、养老、乡村振兴、文化、特殊群体等领域辛勤耕耘，许多人已在特定领域奋斗超过十年，或陪伴一群人、或守护一方土地。

这些社会企业家分别是：

探索环境公益诉讼和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法的张伯驹、推动儿童防性侵和性教育课程与社会关注的孙雪梅、打破乡村儿童信息和情感封闭的璐瑶、推动社会有毒化学品合规和为电商“去毒”的毛达、探索商业可持续居家养老模式的宁宁、为县镇高中青年创造良性成长空间的刘泓、用社区支持农业探索有机农业的石嫣、探索绿色金融工具让企业污染成本不再隐形的璇芷、激发乡村内生力量振兴乡村社区的林炉生、用影像记录社会真实问题和痛点的蒋能杰、用信息技术提供垃圾分类和社区参与解决方案的汪剑超、进行心智障碍者自主生活与权利倡导的李红与冯璐、探索食物银行中国落地的李冰、服务失能失智老人和推动养老照护险发展的王艳蕊、探索医务社工模式服务重症儿童的崔澜馨、通过协作和应用戏剧促进社会理解与沟通的陈志君、推动临终关怀政策和生死教育发展的王莹、打通可持续互联网治理荒漠化路径的马俊河、运用传统文化守护疫情下的藏区与东巴村落的邱华绒吾与和继先。

“心怀天下，脚踏实地；比肩而立，彼此为荣。”正如张伯驹所写，这些社会企业家们遍布全国各地，在各自的领域不断探索和耕耘，并在银杏基金会的“银杏计划”项目下相识和相聚，给予彼此经验和勇气，共同推动社会的一点一滴的进步。

他们是全中国最善良、最聪明、也是最坚持的人。

2020 年新冠疫情和国际局势让许多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和孤独。在每一个人都经历长期自我隔离，希望和信任几近干涸的当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期盼，期盼来自四面八方的涓涓细流在某个时刻汇成江河。我们希望通过记录和讲述这群人的故事，让听见和看见成为一个开始，鼓舞更广泛的青年群体，成为细流，加入发现和改变的行动队伍中去。

# 目录



- 璐瑶：一场坚持了十年的乡村边缘少年成长实验 **2**
- 孙雪梅：如果一堂课，能够改变孩子的一生 **10**
- 李红 / 冯璐：我们和心智障碍者，需要看见彼此 **18**
- 刘泓：改变乡镇少年的人生，他想从人文教育夏令营开始 **26**



- 马俊河：“我不能无家可归” **36**
- 毛达：检测多款 10 万 + 爆款口红后，一名环境学博士决定找电商谈谈 **46**
- 张伯驹：我为地球打官司 **54**
- 张伯驹：改变一部关于「野味」的法律，有多难 **62**
- 璇芷：断了污染企业财路，她让受害者不再跪着哭泣 **70**
- 汪剑超：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垃圾分类 **80**



- 林炉生：离京返乡六年，他在做「回乡见闻」中不敢想象的事 **90**
- 石嫣：下乡十一年的女博士，和那批离开城市的年轻人 **100**
- 李冰：为了那些身在上海却难求温饱的人 **108**
- 和继先 / 邱华绒吾：当你的语言中没有“病毒” **116**



- 王艳蕊：注定不停失去的晚年中，她选择为老人留下尊严 **126**
- 王莹：“我有权利，被当作一个活着的人对待。” **134**
- 宁宁：我们最后的岁月是否一定在养老院度过？ **142**
- 崔澜馨：重症儿童救助：钱之外，还缺什么？ **150**



- 蒋能杰：那个守在豆瓣上私信观众的独立导演 **160**
- 陈志君：他和他们的舞台，在工地和乡间 **168**
- 林红：十一年，她寻找那些正在改变世界的普通人 **176**

# 01 平等机会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一、第二条中写道，“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平等仍在撕裂着我们的社会，深化隔阂、漠视与分歧。社会创业家正在努力为平等机会创造可能。我们相信，一个更能够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实现性别平等、保障各类人群社会参与的社会，是大家共同努力希望到达的未来。



# 璐瑶： 一场坚持了十年的 乡村边缘少年成长实验

文 / 谢雯雯 编辑 / 朱逸蕾 图 / 除另作说明，由受访者提供

“

璐瑶把梦想家项目比作一个黑匣子。她想知道，黑匣子里的什么在起作用，孩子们的改变如何发生；另一方面，寻求改变、发生改变的孩子，是否能像她一样，裂变式、成规模地影响更多乡村孩子。

编者按：远离北上，扎根偏远乡村，璐瑶辞掉了高薪工作，正在做一个鲜有人敢尝试的实验——不计时日地陪伴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乡村儿童。璐瑶已经独自坚持了十年，通过建立“成长共同体”，陪伴了 92 名封闭、被边缘化的孩子。

我们关注这个成本极高、针对乡村封闭青少年成长的模式。不同于捐赠、支教等主流形式，矢志不移的“陪伴”，能否真正承托、点亮一个、一群，甚至更多孩子的人生？璐瑶已经有了一些答案。

广西田阳县的夏夜不那么安静。时针早已摆过零点，这个南方贫困县最热闹的商业区里，依旧烟火缭绕。人们吃着烧烤、唱着露天 KTV，慵懒地闲聊，啤酒一瓶瓶往下灌。

忙于暑期夏令营收尾，璐瑶姗姗来迟，这位北京大姑娘，用田阳本地人的腔调招呼着大家：“来来来，喝酒喂！”一边揉着发红的眼睛，璐瑶早已习惯与凌晨后的田阳作伴。

2009 年，璐瑶刚在英国完成金融、管理两个硕士学位，便前往田阳县巴别乡支教。田阳县巴别乡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老区百色市，被群山紧紧环抱，全乡有 12 个村属自治区定贫困村。

璐瑶在巴别乡一下呆了半年。一个清晨，璐瑶从小学宿舍推开门，看到一群孩子蹲在树荫下，光着脚丫，身上脏脏的、皮肤黝黑，他们双手捧着一个搪瓷饭盆，埋头吃粉。

一瞬间，平行时空的场景突然出现在璐瑶眼前，她从小常在北京看到，建筑工地上，一群农民工蹲着

扒饭盒里的午餐。璐瑶开始止不住地流泪，仿佛看到了这些孩子 10 年、20 年后的模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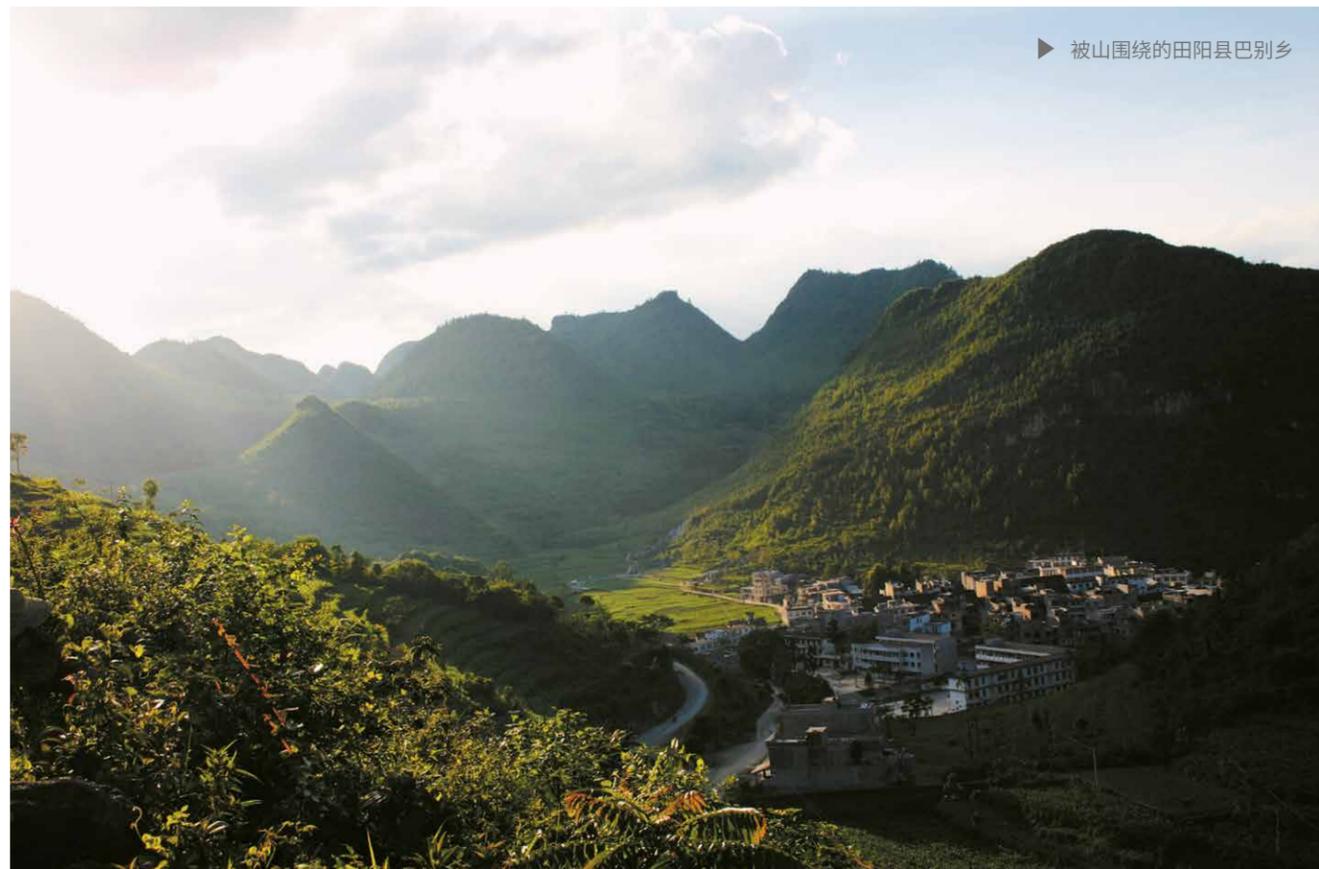
“我想发起一个助学项目，让孩子们看看外面的世界，发现更多可能性”，几轮家访后，璐瑶下定决心，借着酒意吐露了想法。

带她支教的本地老师却一盆冷水泼下来：“这助学不解决问题，一两年也不解决问题”。

村里的老教师看得清楚，这些年来，璐瑶不是第一个来支教的高知青年，也不是第一个“想要做些什么”的人。他们还是一半试探、一半邀请地问璐瑶：“你能坚持多久？”

璐瑶回到北京，入职金融街，开始一边职场打拼，一边兼职到田阳助学。当时 26 岁的她并不知道，自己会坚持十年。也没想到自己甚至会为了孩子，彻底辞去工作，告别世俗认知的“正确路径”，远离北京上海、扎根田阳。

▶ 被山围绕的田阳县巴别乡





▶ 梦想家孩子给家乡老人拍摄纪录片

## 十年只做一件事：陪伴

十年，璐瑶在田阳几乎只做了一件事。

她用草莓去解释这件事。“一颗草莓种子，需要我告诉他长大会成为草莓吗？”大部分家长和老师开始都回答“需要”。

璐瑶却不这么认为，“显然是不需要的，他自己难道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吗？他已经具备了所有生物信息，只要把他放在土里、给他浇水施肥就好了，甚至不用浇水，因为天上会下雨。”

这个“浇水施肥”，就是“陪伴”，不计年岁与日月。对于乡村孩子，这就是最稀缺的东西。

2009年，支教结束后，璐瑶发起了“巴别梦想家”，十年间，通过一对一助学、免费参与式工作坊，陪伴了92名封闭、被边缘化的乡村青少年。在他们成长时期最重要的八至十年，不断“浇灌”，陪伴、帮助他们寻找自己的社会身份，实现开放、适应和社会责任感。这些青少年，璐瑶称他们为“梦想家”。

她组织孩子们为乡村做社区服务，拍摄家乡纪录片，让他们加深对家乡的了解和连结。纪录片在田阳县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公演，一个孩子在公演场上，拍了人生中与父亲的第一张合照。

她带孩子们到百色森林公园做社会生存实践，每组500元启动资金，孩子们不知所措，她也不提供任何指导，反而到晚上复盘的时候，开导被当成骗子、委屈哭泣的孩子。

有孩子高考成绩不理想，璐瑶将境遇相似的学生聚到一起，组成“智囊团”QQ群鼓励她，并为填志愿出谋划策。

有孩子几乎被老师“放弃”，严重受挫，自我否定。璐瑶让孩子管理账目，1500块钱管丢了，也没有责备、质疑，自掏腰包把钱补上。

“信任是成本最低、但收益最高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往往很吝啬，连这都不愿意给。”

## “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信任赋予了孩子，他们也不辜负，给了所有人惊喜。

2019年，43名适龄“梦想家”中有41人考入大学，远高于当地适龄青年上大学比例，不少孩子上了985、211学校。

“十年前，我觉得我的未来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像爷爷奶奶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另一种是像爸妈一样去广东打工，赚钱回田阳还能买辆摩托车。”十年陪伴过后，20岁的“梦想家”梁振宝，站在田阳县第一小学的多媒体教室大讲台上，自信满满地说：“我的未来有无限可能”。

这一个个“梦想家”，也成了田阳的种子。“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回来”，这句早期一名孩子在QQ群里的一句话，如今在巴别梦想家最常被提及。

璐瑶成功打通了一条乡村青少年反哺家乡的“蹊径”，一条不同于传统师范大学模式的路。

早期加入梦想家、考上了大学的乡村青年们，正在进行身份转变，由从前巴别梦想家陪伴的服务对象，转变成为服务提供者，自愿担起了责任，开始服务更大规模、更广范围的乡村孩子。

曾经管丢了钱的苏光国，后来成为田阳县第一位去北京读书的大学生。他回乡后，给没有网络的村里装上了WIFI，给孩子们买了课外书，鼓励他们运动和阅读时间，换取上网时长，并教会孩子们使用网络搜索、查阅网课。

被亲切称为“秘书”的苏光富，在2018年本科毕业后回到巴别梦想家，成为璐瑶以外的第二位全职员工。



▶ 璐瑶与梦想家孩子们共同讨论机构未来愿景 / 王身敦



▶ 璐瑶和梦想家们在暑假工作坊表演即兴戏剧



▶ 接受采访前在阅览室里补觉的璐瑶 / 谢雯雯

## 一场成长实验，一切都是“算计”的

璐瑶半眯着眼颇为得意地说，这一切都是她“算计”的。十年里，璐瑶其实进行了一场长期陪伴乡村封闭青少年的“实验”。

经过大量当地走访、调研和理论研究，写出六万字的研究论文，璐瑶提出这样的假设——现阶段，乡村教育的问题不是贫穷，而是封闭，信息和情感上的封闭。这源于外出务工的家长无暇与孩子交流、乡村学校体系未能提供机会让孩子接触外界等因素。

作为梦想家创始人、参与式工作坊的设计者和组织者，璐瑶学习引导、心理学、社会学、戏剧、设计，项目评估……发了疯、不睡觉也要学各种需要的知识。

她发现，一个人学什么、如何学习，是对自己社会身份识别的投影；身份则赋予每个人不同权利、责任和义务，推动学习和成长。

“孩子们也是一样的道理”，根据假设，璐瑶设计了各种各样参与式活动，让孩子在不同活动中担当

不同角色。她想要做的，是通过不同的角色担当，帮助孩子实现对自我身份的认知，缓解封闭的乡村孩子与社会的割裂程度。如此，才能融入社会，产生成长的动力、责任感。

坚持十年并不容易，一段看起来非常脱离现实的人生冒险，却也都是璐瑶自己“算计”的。

2009年，辞去北京投行的工作后，她进入了国际公益组织，学习乡村社区发展，包括乡村教育理念、参与式学习。此后，她到了上海一家上市公司，拿着不错的薪水来支撑梦想家，一边学习项目管理和统筹，把自己的企业家客户发展成梦想家的捐助人。每一次拐弯，都为了离“梦想家”更近。

2015年，璐瑶选择辞去所有工作，成为当时巴别梦想家的唯一全职员工。

## 伙伴出走，孤独坚持

虽然按着自己“算计”的人生走了很远，没有伙伴，没人认可，璐瑶也好多次想放弃。

“我不回去（田阳）了”，2015年，辞了职计划乘火车从北京前往广西当天，清晨6点，璐瑶收到这条微信。发消息的是璐瑶支教时的伙伴，她最好的朋友，原本应该和璐瑶一起乘上这趟火车回田阳的梦想家最后一位联合创始人。

只好自己一个人到北京西站，退了朋友那张火车票。

之后大半年里，回到田阳的璐瑶每天半夜都一个人哭。“我想不通，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我这样决绝地回来，却发现事情根本做不下去”。那时的她，职也辞了，工资没了，约定好的最后一位伙伴也放弃了，机构没注册，一个满口北方腔的外地人在田阳没有任何社会关系。

但璐瑶没有走。

虽还操着纯正北京口音，时间长了，璐瑶常常习惯在句子尾巴带上田阳人惯用的尾音“喂”。她努力地在田阳“扎根”，也总在不理想的情况下继续坚持。

在田阳最热的5月，半个县区断电，多媒体教室没有空调，像个大蒸笼。梦想家十周年新书发布会因此推迟半个多小时，精心化的妆花了，一身红裙被汗打湿，她也不恼，带着歉意和暖暖的笑完成开场白。

项目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家长理解璐瑶想做什么，甚至有一些家长不相信这些活动都是免费提供给孩子的，觉得璐瑶“是要骗人的”。璐瑶便用一次又一次从未间断的寒暑假活动来证明。

在璐瑶与梦想家的孩子们一般大的时候，家庭条件不错，却也有种“被父母抛弃的感受”。出国留学，读了一个硕士不够再读第二个，一路只是被家里安排得明明白白。

不忍孩子感到被遗弃，当与联合创始人、当地孩子有了承诺，她便选择坚守。一开始，她是在重新陪伴自己内心里的那个小小朋友。但是，自己内心里的小朋友一旦被治好了，这部分动力在衰减，璐瑶告诉自己，“我要找到新的意义，不然这事就得停了”。

2017年，璐瑶第二次想放弃。当时的男朋友反对她继续做梦想家，项目推进不顺利、模式不被人认可，寻找外部机构资助也持续碰壁……

当时，璐瑶已经连续两年申请基金会支持被全部拒绝。被问到最多的就是：项目规模化如何、效率如何。“当我们在影响一个边缘的弱势的孩子的时候，他跟你谈效率”，璐瑶很不服气，她不认为这些东西能用冰冷的数据和项目报告评估。

连续多年一个人掰成几个人用的她，咳血咳了半年，整个春节高烧不退。

“你的存在都被挑战了，你项目有什么意义？”，心理咨询师质疑璐瑶时，她感到被冒犯，非常愤怒。但她也知道，这话说得没错，曾一度失去所有底气。

▶ 梦想家理事会成员由全部孩子投票选出 / 王身敦



▶ 梦想家孩子拥抱十周年视频中的璐瑶 / 王身敦



▶ 璐瑶与“秘书”苏光富 / 王身敦



## 会“规模化”吗？从 41 到 10000

幸好，璐瑶坚持得足够久。

2018 年，更多人看到变化正在发生，梦想家的模式被带到百色市和周边更多乡县，服务对象也拓展到了年轻乡村教师。

而工作坊、营会项目的主力，已由璐瑶一人，变为回乡全职的“秘书”和其他 41 位“出栏”梦想家。截至 2019 年，项目已累计招募志愿者 600 人，服务乡村孩子超过 1 万名。

现在的璐瑶，早已过了为所谓理想奋不顾身、受情感羁绊的年纪。现在，她继续坚持的动力，已转化成一一份社会责任。

璐瑶把梦想家项目比作一个黑匣子。她想知道，黑匣子里的什么在起作用，孩子们的改变如何发生；另一方面，寻求改变、发生改变的孩子，是否能像她一样，裂变式、成规模地影响更多乡村孩子。

梦想家十年的所有资料已经电子化、未来也将开放案例，供不同领域的学者和相关方研究。“黑匣子打开之后，我告诉大家如何做，这么做会怎样，那么做又会怎样……框架、设计，拿去！”

即使最后裂变、实验失败了，梦想家还是会告诉大家它是如何失败的，璐瑶不怕“失败”。况且，她已经有了更大的底气。

她的底气，来自项目十年积累、社会的更多关注和对深度陪伴模式的认可，也来自一些机构资助者的出现，当然，还有她身边“出栏”梦想家们。

“如果他们没有回来，梦想家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正是因为这些长大成年的梦想家选择在很忙

的时候也回到故乡，选择承担责任，服务更多乡村孩子，梦想家才如此不同。

说到这里，暑假工作坊期间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的璐瑶眼睛红红的，手指用力敲点桌子，激动起来，“我觉得值！”

她回想 2017 年，健康状况堪忧、整个项目被质疑的时候，秘书对她说，“就算今天咱们机构关门了，我的命运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已经改变了”。

一年后，秘书回到梦想家成为全职，又问她：“我的命运已经改变了，并且已经有能力改变更多人的命运了。你觉得值吗？”

璐瑶，今年 36 岁，十年，就是她的答案。



## 记者手记

2019 年 7 月，在炎热、盛产桂七芒果的田阳第一次见到璐瑶的时候，她正在为梦想家理事会选举忙前忙后，我们并无时间交流。后来为期三天整个梦想家夏令营也是如此，直到收营。

带着对她个人经历和梦想家模式满满好奇，我列下了近二十个问题，采访后又马上要赶动车离开田阳，时间紧迫。但去到约定的田阳一小阅读空间，我却看到璐瑶一动不动躺在角落的爬行垫上睡觉。想到这几天看到她眼睛一直发红的画面，我绝不忍心叫醒她，希望哪怕能让她再多睡一刻钟也好。“太拼了”是那几天她给我留下的最大印象之一。

但我也意识到，“拼”、“扎根乡村十年”这些“感动中国”事迹中经常出现的特质，只是璐瑶所为中的一个切面。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银弹幻象”丛生的时代，璐瑶认清和仍坚持着教育和个人成长的本质，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获得认可和资源的困境中坚持了下来——看着那些自信、懂得关心他人的梦想家孩子，感受着整个夏令营开放、充满活力和平等的氛围，璐瑶和巴别梦想家带来的深远改变不言而喻。

璐瑶十一年的实践，不但创造空间让一批孩子成长为有梦想有能力、有担当、反哺家乡的青年，也影响着部分教师与当地教育相关人士。她的“成长共同体”实践，在这个众人追求“短平快”、痴迷规模化的时代，成为深度陪伴和赋能之价值的又一次有力证明。

## 读者与社会反馈

上个月刚报名参加了一个公益组织为期一个月的陪读计划。说实话，我没有受访者的勇气，目前也没有准备好辞职全职投入乡村教育，但也还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力。感谢博主的分享。

——微信读者 shan

行胜于言。愿理想主义的光芒重新开始在这片土地闪耀。

——微信读者 JoeFeng

十年的坚持，是怎样改变了一群乡村青少年的命运？璐瑶发起的巴别梦想家项目，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梦想与坚持的公益项目。教育从来不是单向的“灌输”，它更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双向的互动与陪伴。无论科技如何发展，这份教育中的情感是始终无法被忽视的。

——“世界教育创新峰会 -WISE”官方微博

# 孙雪梅： 如果一堂课， 能够改变孩子的一生

文 / 方澍晨 责编 / 朱逸蕾 图 / 受访者、女童保护提供

“

孙雪梅希望社会各界都能意识到，防性侵教育是一门很专业的学科，必须严肃对待。

编者按：近年，中国儿童性侵案件持续高发，2015年至2018年11月，全国法院审结的猥亵儿童案件11519件。其中，熟人作案占极大比例。一些案例触目惊心，有的竟侵害多达100余人。然而，被公开的事例仅为实际发生案件的冰山一角。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受害儿童的未来人生、甚至是他们的生命。

“女童保护”基金创始人孙雪梅不忍于孩童的生命希望就此毁灭，以“防性侵”课程的方式，为孩子们扫除无知和恐惧，给予他们保护自己的工具和勇气。



▶ 正在授课的孙雪梅

“我国现在对性侵害量刑太低了！明年‘两会’，我们一定要继续建议专门设立‘性侵儿童罪’！”“女童保护”发起人孙雪梅对同伴们说，神情愤慨。

孙雪梅成长在贵州山区，在成长过程中，她听说过一些儿童被性侵的经历，那些受害者的痛苦，和因此带来的人生轨迹的改变，都常让孙雪梅回忆起来感到刺痛和“受不了”。

2013年，她还是京华时报的记者，每天大量追踪、报道各种公众事件，这让她更多、更细节地关注到一些弱势群体。那年5月，短短20天内，媒体接连曝光了8起性侵14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案例，舆论一时为之沸腾。孙雪梅所在的一个女记者公益活动群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也就是在那时，孙雪梅意识到，儿童性侵事件，一直都并不罕见。

于是，那年6月1日，孙雪梅与全国百名女记者联合多家媒体单位，发起了“女童保护”项目，以“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识”为宗旨，致力于让儿童远离性侵害。

在那之后，“女童保护”每年都会统计公开报道的儿童性侵案例。2013年至2018年，国内媒体共曝光2096起性侵儿童案例，每起都有不同数量的受害儿童，有的甚至多达100余人。

“这些数据是冷冰冰的。但我一想到数字背后的每一个孩子，他们惊恐害怕又不知道找谁说，不知道怎么去维权去求助……”孙雪梅说。

孙雪梅下定决心，将“女童保护”的工作重点定下。一是做防性侵知识普及，改变公众观念；二是致力于推动相关制度和法律的完善，以帮助遭遇性侵的儿童。

## 谈“性”色变

“同学们，性是非常美好的，”孙雪梅在台上大声说。她看到台下孩子们专注而有些羞赧，后排家长们神色紧张起来。

“但是要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年龄发生，”她继续说。家长们明显松了口气。

“我告诉你们这些，不是鼓励你们在青春期发生性行为，而是让你们对性的知识有全局了解，这样你才能对自己、对他人健康做出负责任的决定。”

2019年7月的一天，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餐厅的大包间里，孙雪梅向30多个孩子讲授新开发的青春期健康教育课程。这次课程应家长邀请而开。这些女孩子刚刚小学毕业，即将进入同一所寄宿初中。家长们联系“女童保护”，希望将这次课程作为送给她们的毕业礼物。

不过，这次邀约的部分家长提出：最好只讲防性侵部分。孙雪梅分析，家长可能觉得孩子还小，不需要知道性行为相关知识。

中国社会“谈性色变”的传统观念，是“女童保护”一直面对敌人。

早在2014年，“女童保护”就试图制作青春期版课程。但是，各方面专家、教育从业者，甚至“女童保护”团队内部，对课程内容和尺度都无法达成共识，争议纷纷——即使是完全不提性行为、连生殖器官名称都用“隐私部位”替代的儿童版课程，推广起来都还有障碍。

她曾通过联系教育局，到大理某村的一所学校授课。上课时，校长旁听一会儿就出去了，没有说什么。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校长表示：“讲这个，会不会把孩子教坏了？我们以前都没有提过‘性’这个字。”

过去几年，不少家长向“女童保护”讲述了青春期孩子怀孕流产的经历，希望在防性侵知识之外增设性教育内容。这让她感觉青春期版课程已经到了不能不讲的地步，这才重新将其提上日程。



## “我们的价值所在”

孙雪梅出生于性别不平等的乡村地区，她小时候村里很多人还视自家女儿为要“泼出去的水”，女孩子初中毕业后几乎只有两条路——打工或嫁人。女生上高中简直有些“痴心妄想”。

孙雪梅父亲是乡村教师，家里一共五个孩子，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孙雪梅只排名老四。自家大姐成为全乡第一个女大学生，而孙雪梅自己也作为县文科状元上了重点大学。孙雪梅家在他们村里成了“特立独行”的榜样。

父母为了给家里孩子挣高中学费，除了正式工作，寒暑假还不辞劳苦从贵州去到四川，打一份伐木工的活儿。孙雪梅到现在都记得，打工回来后，父亲半夜做梦都在大喊，“快跑，树倒下来了！”。

孙雪梅说，自己是靠着“重女轻男”的父母，和高中起各方的奖学金和助学金，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她希望自己得到的爱，能再通过她，以公益的方式传递下去。

现在，运营“女童保护”项目的同时，孙雪梅还有一份“正职”——凤凰网公益频道主编。工作“两头跑”让她极度繁忙，经常连睡眠时间都不能保证。而她也与许多同龄人一样，面对着一线城市的巨大生活压力，自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未来需要购置学区房和加大其他开销。

她曾经面临“诱惑”。曾有企业开出几倍薪水邀请她加入。

孙雪梅思虑再三，最终拒绝。“人的价值不是用钱来衡量的。”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的她，笃定将“女童保护”作为会终身参与的事业。

随着“女童保护”工作的推进，她的价值感和继续下去的动力也不断叠加。



曾有一位小学女生听完课，才意识到自己之前的一段经历是性侵。她告诉了家长，性侵者很快被警方抓获。学校邀请“女童保护”再去给几百名家长上课。

还有学生听课课后反馈某老师经常对他们动手动脚。“女童保护”去找学校交涉，最终将那名教师调离了岗位。

最近还有北京一所学校的老师在家长会上感谢了“女童保护”——一个女生在回家的路上遭遇性骚扰，她想起课程的内容，大声叫喊：“我还不到14岁，你想坐牢吗？”随即告诉了老师。

骚扰者在两天后被抓获，据说他经常在那一带，对年龄稍大的孩子性骚扰。

这一切都让孙雪梅和团队感到欣慰，“我们的课是有用的！”。6年前凭着满腔热情一头扎进女童保护公益领域的她，就这样坚持了下来。

深知众人的认知没有办法通过一两次课就改变，遇到困难时，她选择积极看待。

曾在某地区，“女童保护”已组织好了讲师队伍，



美丽的青春期  
认识身体与自我悦纳  
正确认识与异性交往和恋爱  
生命诞生、性行为与我们的决定  
辨别和预防性侵害



排好了授课计划。这时，一名已离开当地上大学的学生找到当地的志愿者讲师，讲述自己初中时被一名老师性侵的经历，并指出那名老师仍然在那所学校教书。志愿者讲师在当地志愿者群里讲了这件事，讨论下一步怎么做。没想到，群立刻就被解散了。很快，当地教育局下令，不再开展“女童保护”课程。

孙雪梅虽然生气，但还是一边寻找其他渠道，并且安慰自己“这也是对这个地方的一种震慑”。“不过这种很少，我们跟绝大部分地区的合作是顺利、愉快的”，她补充。

正是有这样情况的存在，更证明了女童保护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捂盖子不如提前揭盖子，告诉大家盖子下可能有什么。很多政府部门的人是爱孩子的，他们会主动去做，这也是造福一方。”

有专家预估，儿童性侵案件只有大约 1/7 会进入司法程序。孙雪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受观念影响，受害儿童或家长没有报案；第二，由于缺乏证据，公安机关没有立案。

她预判：未来几年，强奸、猥亵的报案率会提升。“不是因为这类犯罪比以前多了，而是大家的权利意识被唤醒了。我觉得我这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也是社会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 教案，55 次细节修订

听起来简单的儿童防性侵课程，如果疏漏了或错讲一些小细节，反而可能给孩子带来心理伤害，甚至导致生命危险。

儿童版教案从初拟到现在，一共修改了 55 次，“每次细小的修订都是有原因的”。

有时候，是为照顾孩子的感受。

孙雪梅记得在云南山村试讲时，一个女孩忽然哭了。课后，她说：“老师，你们一直在说，如果有人试图触碰隐私部位，要及时告诉爸爸妈妈；如果有人约我出去玩，要告诉爸爸妈妈。可是我爸爸妈妈在外打工，几年不在家了，我该告诉谁呢？”

孙雪梅“眼泪都出来了”。当天晚上，她就和同事们讨论，从此把“爸爸妈妈”改成“家长或者你信赖的其他大人”。

“防性侵教育不能变成恐惧教育，”她说。必须告诉孩子，身边绝大多数都是好人。“单纯让孩子认为‘不能跟任何陌生人说话’是不对的。但必须告诉孩子，帮助别人是有前提条件的，不能跟他走，不能离开常规路线，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有时候，是为平衡。

最开始的教案里讲“熟人也可能性侵”时，本来只举例提到两三个身份，其中包括孩子常接触的老师，为照顾老师的感受，得改成十几种身份。“比如说到老师、校长，也要说‘厨师、校车司机等’，老师就不会抵触。”

“同时，还要告诉学生，如果有课堂上讲到的、属于性侵害的行为，不管对方是不是权威，是不是日常尊重的人，都是坏人。如果没有，就不能拿这个来开玩笑。”

## 重重审核，排除那些普遍的误区

最近几年，来自各地妇联、教育部门、检察院等政府机构以及家长的主动邀约，已让“女童保护”忙不过来。

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女童保护”已培训志愿者数万人，考核合格讲师 6000 多名，与全国 200 多个团队签约合作，在全国 30 个省份，向超过 312 万名儿童、53 万家长讲授了儿童防性侵课程；线上课程也覆盖了数千万人。

在筛选讲师这一步，“女童保护”有重重标准。应征的志愿者经过培训后，通过试讲、考核等环节，才能成为讲师。

一些想当然的认识误区，让不少志愿者没能通过筛选。

比如，怎样告诉孩子们“如果遇到性侵怎么办”？孙雪梅回忆，“2014 年考核时，有志愿者没有仔细看教案，试讲时按照自己的理解，说什么情况都要先大喊大叫、奋力反抗。”

而正确答案是：要分人多和人少两种场景。人多的时候应该大叫反抗，寻求周围人帮助离开。但假如周围人少，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或周围无人的山野时，这可能会刺激施暴方，也许会从性侵发展到杀人灭口。这时就需要告诉孩子：“先大声拒绝和适当反抗，但如果对方转向暴力侵犯，就要注意不要激怒坏人，可以编理由逃脱，实在逃不了就要默默记住坏人长相、悄悄留下物品当证据。”

还有的志愿者在试讲视频中，说到坏人时，只让孩子们提防“坏叔叔”，是常见的错误观念。

“实际上，性侵儿童者不仅仅有叔叔，也有爷爷奶奶、阿姨、哥哥等。不仅仅存在异性性侵，也存在同性性侵，有老人性侵，也有未成年人性侵。只让孩子们认为叔叔才是坏人，可能埋下隐患”。此外，孙雪梅补充道，需要经常强调的还有：男童也可能遭遇性侵，也需要保护。

## 推动制度完善

除了个体教育，“女童保护”还一直致力于推动相关制度和法律的完善。每年全国“两会”前夕，“女童保护”都要召开座谈会，请来相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呼吁他们将相关内容写成议案提案。

会上探讨、呼吁的不少内容，正在逐步实现。2017年，女童保护与民法专家一起推动延长被性侵儿童民事索赔时效获得进展。受性侵儿童的民事诉讼时效从原来的2年，改为18岁起算，3年内有效。

对监护人性侵孩子的情况，“女童保护”推动剥夺监护权后的社会监护制度完善。监护人性侵孩子，出于生活保障、家庭伦理、亲情等因素，孩子往往不敢说，“要让这些孩子报警后还能过正常生活，他们才敢说出来。”孙雪梅说。

许多性侵受害者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后，要对不同的人反复回忆受侵害经过，甚至进行多次身体鉴定。“女童保护”呼吁推广儿童性侵案件“一站式询问”，减轻审案给孩子带来再度心理损伤。

近两年，在最高检推动下，一些地区已开始试点。江苏淮安，孙雪梅与当地政府部门合作培训讲师时，看到当地检察院建立的“暖阳之家”。那里环境布置得很温馨，被性侵儿童由心理咨询师陪同，接受女性工作人员询问，如果没有明显证据瑕疵，不会再次去询问儿童。

一直以来，“女童保护”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将防性侵教育纳入常态化教学，自己可以提供专业支持。老师需要严格培训，并且要有绩效考核。

过去几年与各地教育部门的合作中，曾经发生的现象是：教育部门认为“女童保护”对讲师的考核过于严格。不过可喜的是，面对坚持，他们逐渐也都接受了。教育部门事实上对教学质量的要求更高，不是谁都能随便进课堂。

孙雪梅希望社会各界都能意识到，防性侵教育是一门很专业的学科，必须严肃对待。

本文部分参考了首发于“乐天行动派”《跳出农门的女孩，立志要保护千万儿童》一文

## 读者与社会反馈

孩子对性的认知完全来自于大人对性的态度。如果你大大方方的和孩子谈论性，孩子是没有任何扭捏感的。我们这些做父母的羞于和孩子谈性，其实就是自身从小缺乏性教育的表现。

——腾讯新闻客户端读者 Chen&Amalee

村小支教老师，期待有视频课。

——微信读者锤不扁

我们不能用大人的眼光看待小孩的性教育。性教育从小开始没错的。

——腾讯新闻客户端读者极度深蓝

看看这些成年人的评论，你就知道开展新教育是多么艰巨的一件事了。

——腾讯新闻客户端读者孩儿他爸

想申请加入女童保护公益组织，如果方便的话作者可以给个联系方式，比如邮箱！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事业中。/ 社会太需要了，作为退休教师，希望能做讲师。

——微信读者水瓶 lyx/ 宋涓



# 李红 / 冯璐：

## 我们和心智障碍者， 需要看见彼此

文 / 谢雯雯 编辑 / 张希蓓 图 / 除另作说明，由受访者提供

“

李红感叹，当监护者选择放下过度保护和过度替代的“重担”，将选择的权利归还给孩子，并坚定地维护他们的权利，社会中也将有更多人开始选择正视和接纳。

编者按：上一次你在生活中遇到残障人士，是多久以前？对于亲人朋友当中没有残障群体的大多数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需要用力回想的问题。“他们”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仿佛并不存在，但对于占据总人口一定稳定比例的这部分人群来说，“消失”不能解决问题，而是更大的问题的开始。

在北京，有两位长期从事心智障碍群体社会支持工作的女性：心智障碍家长组织“融爱融乐”负责人李红，与利智康复中心主任冯璐。多年以来，各自家庭中并没有心智障碍者的她们致力于协助这个群体走出封闭环境、让“他们”被社会“看见”，某种程度上，正是不再消失的“他们”，才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使我们的社会成为更好的社会。

“他不能去。他怎么去？”八岁的儿子反问李红。

“他怎么就不能去了？”李红指的是儿子班上一名智力障碍的同学。此前，两次班级集体活动都没有他的身影。

“他不会说话，也什么都听不懂。分组的时候也没有人给他分组。”

“他不需要听懂和说话，他就跟着你们（就好）！”

提起这个在很多人看来似乎算不上“争议”的故事，李红还是忍不住抬高了音量和声调。为什么不能，凭什么不能？

“我们直接把他们排除在外，所以我们的孩子慢慢的也这么认知！一个上二年级的孩子，他懂什么！他最小的时候不这么认为的。但是他进到了教育机制下，就形成了这种价值观。”

李红是两个普通孩子的母亲。那个集体活动被排除在外的，不是她自己的孩子。

### 忽视

2008年，在外企工作的李红身心俱疲，她下定决心辞掉繁忙的工作，休整一年。抱着做志愿者的心，她加入了一家国际组织的北京分部，无意间一脚踏入残障支持领域。

起初她对残障群体和议题毫无概念。“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叔叔，他是当时我们家乡第一例脑炎导致了神经损伤的一个智力障碍者。可是特别搞笑，我当年从商业出来去到之前在国际组织，当时首席代表问我说，你为什么选择来这儿？你的家庭里面有残障者吗？我特肯定地回答‘没有’。”

当时的她对残障的认知停留在“必须是坐轮椅或者



▶ 李红



▶ 冯璐

看不见”上。在那个时候，这也是国内大部分人的看法。

进入残障支持领域以后，她开始留意起身边和社会中的这个人群。“我有一年去美国，一整天待在外面闲逛，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我就数着我遇到了16个残障者，在博物馆里、在写字楼里、超市里、公交车站、地铁站……我觉得我在北京基本上可能一个月能遇到16个，偶尔遇到都是在乞讨。”

2011年，也是在偶然机会下，冯璐来到北京一家名为“利智”的康复中心，院子里传来的哭闹声让她本能地紧张和害怕。在她的印象中，这些服务对象只是“极其罕见的少数群体”。

如果不是亲近的亲戚朋友中有残障者，我们很少能在公共空间里碰到他们，自然不熟悉，对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爱与痛也不那么在乎。我们忽视他们的存在，也忽视他们的“不存在”。他们似乎是活在“另一个世界”。

这样看来，2010 年或许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电影《海洋天堂》上映。文章饰演的 21 岁自闭症青年大福喜欢水和水族馆，李连杰饰演的单亲父亲王心诚身患绝症、四处为儿子找寻安身之所，他们的故事成为许多国人接触自闭症及其家庭群体的第一扇窗。

这也是许多人第一次意识上的冲撞——“他们”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同样在挣扎，在努力。

## 冲撞

大福这样的自闭症青年，便是李红、冯璐和她们的伙伴专注支持的心智障碍群体中的一员。“心智障碍者”，是业界对于自闭症谱系障碍、唐氏综合症、智力发育迟缓、部分脑瘫和癫痫造成的发展障碍等障碍人群的总称。根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 1200 万至 2000 万心智障碍者，他们在沟通表达、学习能力和社会互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

长时间沉默、不喜与人亲密接触、突然间大声叫喊、拍手、捂住耳朵……一些心智障碍者在表达方式、行为反应上的“不同寻常”，与社会长期以来对这个群体的残缺认识叠加，导致他们的社会形象被反复固化：缺乏能力，无法自理，需要被照顾。

普通人本能地害怕和退缩，亲人和社会则试图去“照顾”他们，方式是尝试规范他们的社会参与：小的时候，应该去康复机构而不是幼儿园；学龄阶段，应该去特殊学校而不是普通学校；父母垂老、离去后，他们也理所当然去到托养机构，人手不足、安全为重，外出被限制也是“情理之中”。



▶ 冯璐（右）陪同利智服务的楠姐（左）去买菜，楠姐顺便买了一瓶可乐

“有时候学校会借助其他家长的压力做出驱逐的行为。”如今成为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融爱融乐”负责人的李红不时会听到这样的消息。

据一项 2016 年在国内开展的义务教育调研，有超过四分之一（27%）曾在普校就读的残障学生的家长表示，自己的孩子曾有被要求退学的经历，而成功进入普通学校已不是易事。《2016 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显示，义务教育阶段，中国大陆有机会进入普校学习的残障儿童只占总数的 56.6%。这显著低于同期台湾地区的 95%。

“不应该是这样的，”冯璐不赞同这种“隔离”，“他们在庇护性环境里生活九年或者是六、七年，他毕业以后你再想让他去到一个融合性的环境里去，可能吗？他进不去。即使进去了，他也适应不了，因为庇护性环境和融合环境，人对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如今已经是北京利智负责人的冯璐，在这家服务 15 岁以上心智障碍者的非营利组织里遇到过很多从特殊学校毕业的青年人，比一般人有更多机会看到不融合带来的“冲撞”。

她陪同障碍者去坐高铁、去商场、去博物馆，都有过路人遭到惊吓，障碍者不被尊重，最后导致冲突的经历。绝大多数时候，冲突会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家长觉得是自己障碍者孩子的错，然后赔礼道歉。

也有些时候，连息事宁人都难以实现。其中一次，因为坐高铁时同车厢有人大声说话，冯璐陪同的自闭症青年士明焦躁不安，从身后抓住了对方肩膀，还刷蹭到了对方的眼角。经过道歉和短暂协商，冯璐陪着对方提前下车到医院做了检查，几天以后，冯璐收到了一张律师函，对方向冯璐方索赔 15 万元。

这些大大小小的“冲撞事件”，又反过来对障碍者的家人和陪同者造成“冲撞”，经历一两次类似的冲突，大部分心智障碍孩子的家长在带孩子出门前都会多一份犹豫和担心。

一位来自山东的妈妈的表现相当典型：因为女儿可能会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大喊大叫或有一些别的举动，她足足九年没有带孩子去过任何公共场所，作为母亲，她并不觉得女儿丢脸，但“总觉得会给别人添麻烦”。

“我觉得我剥夺了我女儿的权利。我女儿，不管她有什么样的状况，她也有跟别人互动、有走向社会的权利。”面对去做家长培训的李红，这位妈妈痛哭失声。

“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孩子，大部分家庭没有走出来，他们心里面有一种‘蒙耻感’，耻辱的耻，他老觉得低人一等，有的甚至跟亲属朋友都疏于联系，自主地跟社会脱钩。”

“这种心理本身是一种（家长的）自我保护。”李红无意苛责，但也直言不讳。

## 掌控感

“士明，怎么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你的伙伴们呢？”利智康复中心里，这位在高铁上“闯祸”的自闭症青年一个人呆在走廊，他的伙伴都去 KTV 了，但他选择不去，“因为我要擦地”，他镇定地回答。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在过去，如果机构安排了春游或者其他外出活动，都不敢提前告诉士明。激动兴奋也好，焦虑不安也好，士明会因为得知了新活动而一刻也睡不着、等不住。

改变的第一步，是从点滴小事开始，“归还”原本属于心智障碍者对自己生活的决定的权利。

士明怀着一个他自己也极少提及的梦想——做一个旅行家，去远方旅行。起初父母对这个想法并没有信心，“怎么可能呢，他自己情绪管不好，出去了不是给人家‘闯祸’么？”

冯璐却坚持要支持他，就从协助士明制定第一次旅行计划开始。

目的地选的是离北京不算近的成都和重庆，交通方式却选择了卧铺火车，士明不想乘飞机也不想坐高铁。吃饭问题怎么解决，吃什么，要谁陪同他去，邀请其他伙伴一起么？各种细节在协商后，全部由士明自己决定。



▶ 浩哥在利智助理的支持下，制定自己的一周生活计划

最终做了旅行预算，要 2800 多元。“怎么办？要花这么多钱呢。”

“跟我爸爸妈妈要！”这是士明的第一反应。

“嗨小伙子，你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也是成年人，我要是去旅行，肯定不会跟我爸爸妈妈要钱的，我要自己挣一点钱去，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利智的一位工作人员和士明说。

“可我挣钱还有一点困难。”士明自己一开始也不确定。最后，根据士明此前的生活经验，利智和士明的父母决定雇佣他做清洁和其他一些家务工作，自己挣钱，士明也欣然同意了。

“一开始我们一天就给两块钱，很少，因为他最开始擦地也不标准，”冯璐回忆，那是 2015 年，“后来我们给他涨到擦一次地 10 块了，他能力增强了，以前擦完后地上湿唧唧的，现在真的擦得很好很好。”后来，他还开始给家里煮面条、做蛋炒饭，也因为有了收入，学会了简单记账。

涨到 10 块后，士明还开始追求即时享乐的消费，匀出两块钱到社区里买点小零食，“可乐、冰红茶这些饮料，还有冰糖葫芦、雪糕，反正就是他的老三样，他就很开心。”

碳酸饮料不健康——士明的爸妈又开始担心起饮料的问题。冯璐笑了：“我就跟他爸妈说，难道我们每个人生活都很健康吗？其实并不是，那你为什么不能容许他不健康一下呢？这是他自己的事情。”

2017 年，士明攒够钱，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旅行，去了成都和重庆。2018 年，在父母的进一步支持下，士明去了青海，看望了利智一位离职回老家的工作人员。2019 年，士明又去了山东青岛。

“孩子的梦想太可贵了，你们一定要支持他呀。”

冯璐这么和士明父母说，也这么和更多心智障碍者的父母说。

寻求“掌控感”，或许是人生而为人的一种本能，只是在心智障碍者面前，家长们总想照顾好他们的所有生活细节，孩子却在无微不至的照料当中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

“我们最开始服务的时候，都是我们的员工设计好活动，看上去非常丰富非常好。”但青年们并不买账，他们不愿意进活动室、满院子跑，有外出活动也不好跟随。

后来，冯璐放手让他们自己设计活动，工作人员只做必要的支持。“你就发现没有人在（活动室）外面瞎跑了。当他的生活掌控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他没那么焦虑了，情绪也更加稳定了。”

“你不能因为他是一个障碍者，就剥夺他的这些权利，然后美其名曰我是为了你好。”回顾支持心智障碍青年的经历，冯璐这样总结。“权利一旦还给他，他是最容易一下就能领会的，因为他得到自由了。”



▶ 一名心智障碍者帮助“食物银行”在老小区里分发食物

## 融合

“谁的成长没有伤害啊？”李红感叹，当监护者选择放下过度保护和过度替代的“重担”，将选择的权利归还给孩子，并坚定地维护他们的权利，社会中也将有更多人开始选择正视和接纳。

十六年前，在广州，曾有一位名叫戴榕的母亲带着她的儿子，一个典型的中度自闭症儿童，给学校的校长、老师、班里每个同学的家长、社区保安和公交车司机都派了一封信。在信中，这位母亲向所有人解释了儿子作为自闭症的特点与困难，“我很希望他能够被学校和班级接纳。如果我儿子影响和打扰了您的孩子，不管在什么时间，请第一时间联系我，我一定积极介入，但同时我也希望，您愿意引导您的孩子去接纳我的孩子。”

她的儿子一直从普通小学读到了职业高中，今年已经 23 岁，依然是典型自闭症。他在社区中生活，有



▶ 李红与机构的同事们



▶ 父亲王心诚（左）和自闭症青年大福（右）  
/ 《海洋天堂》剧照

时会无偿帮面包店送面包，帮花店送花。他的同学还与他保持着联系，小学聚会也不忘邀请他。

类似的尝试也正在全国各地落地。在北京南边的丰台区，冯璐和同事们自 2013 年开始，协助了一批又一批心智障碍者青年去往普通社区中自主生活。故事通常从一处合租房开始，几位青年拥有各自的房间，他们平时去上班或去利智活动，晚上又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通常周末回一次父母家。

“我们一般都是先由智力障碍的青年人‘入场’，建立良好的社区关系，自闭症青年才慢慢进入。很多智力障碍的青年人情商很高。”

“第一次带青年人进入社区，我们的社工除了支持青年人去做社区、物业、楼门长、保安、邻居的拜访外，还会和青年人讨论在社区里看到其他人怎么打招呼。后来，我们去社区的青年人，哪怕是没有语言的，也会微笑着和他人点头。”

入住的青年还在冯璐和同事们的协助下开始在社区里做志愿者，主动清扫老小区的卫生死角，在不同的节日邀请社区党员和居民一起做月饼、包粽子，还做了环保手工皂免费送给居民，邀请他们一起参与制作。

“渐渐地，社区的人就看到，这些青年人其实很厉害，有自己擅长的事情。”邻居们开始放弃偏见，青年人则开始独自去社区里买菜、买米面，去下馆子顺便学习用餐礼仪，与社区的人说话、来往，学会自己管理钱，学会敲开邻居家的门请他们帮忙修东西。

“自主生活并不是独立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没办法独立生活，都需要别人的支持。”冯璐解释。

多年来，她通过自主生活的试验，看到了心智障碍青年身上的可能性：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参与空间，学着如何掌控自己的生活，他们也将不断学习如何与社会相处，拓展和建立自己的社会资源网。他们可以拥有更高品质的生活和人生。



## 同一个世界

李红不经意间踏入残障支持领域，12 年来转战了不同职能和机构，始终感受着这个领域的艰辛和挑战，却再也未离开。

留住她的不仅是因亲近而产生的感情。“残障看上去像是比较特殊化的领域，但实际上它所倡导的价值观都是主流的，都是关于你怎么去看待生命的尊严，怎么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理解什么是平等，什么是融合，什么是多元。”

她说起戴榕给校长、老师、家长的那封信，信的最后一句有这样一句话：我相信他们在一起生活长大，您的孩子也会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

那所小学的校长曾在毕业晚会上特别提到戴榕的儿子。“我们学校因为有了张峻绮同学，我们这些孩子可以成为更优秀的人。他们将来无论成为市长、成为医生、成为律师、成为记者，他们都因为从小接触过这样的一个人，相比那些没有接触过的人，将来会对这个群体有更多认识，他们会更懂得去爱别人。”

“其实不是仅仅为了这个群体。残障议题特别能放大人性的善，也容易放大人性的恶，特别能彰显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李红这样总结。

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些儿童他进到普通学校是他的权利还是他的错？如果是他的权利，这个权利

保障又如何不伤害到其他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学校的资源配置和机制有什么问题？这就反射到我们国家的资源配置，普通学校里没有懂特殊教育的老师。”

那次关于集体活动的争论最后，李红给儿子提了一个建议：“下次集体活动分组的时候，能不能你主动跟老师举手，说你可以跟他一组？”。她明白，无论是资源配置还是权利意识倡导，都不是一天或一年就能达成，但她想至少先让自己的儿子真正意识到，那位智力障碍的同学，与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

冯璐则谈起了自己的“职业倦怠”。去年 10 月，她曾一度因觉得自己阻碍了机构的发展而烦恼，可没多久后，她就收到了那张索赔 15 万元的律师函，为此忙碌了近半年，目前仍在努力推进。

“越是这样越要带障碍者出行，”冯璐想让更多人知道，尊重应该是互相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有这样的群体在，你就不应该在公共场所那么大声讲话。”

“我要感谢士明，他就是天使！他让我觉得当下有太多事情要做，我一定要留在机构。”她变得更坚定，“这根本就不是个体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障碍。我们要改变的，是这个环境。”

\* 文中部分心智障碍者使用了化名

## 读者与社会反馈

若不先去接纳不同的群体，又怎么能教孩子去接纳，大环境永远改变不了。从自身开始突破改变，也带领孩子去学习这种带着爱的接纳，他们才会去成长为一个真正懂得爱的成熟的人。

——微信读者 Carlos

平等的善意真的是这个社会最可贵的东西，大多数人的善都只限于在网络世界，我们应该将言与行实践于现实社会中，不应该将他们去主宰我们的生活之外。当一个耐心的倾听者和指导者，听见他们的声音，感受他们的内心。沟通一直都是最好的交流方式，而不是歧视和鄙夷。更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拒绝导致了一些误解。

——微信读者曳惑

大学曾经做过相关调研，才知道即使是智力障碍者，也和我们一样，会有好朋友，会喜欢逛街听歌发朋友圈，也会因为周围人一样的眼光受伤。理解和尊重是对所有少数群体最好的答案。

——微信读者 Kaleidoscopy

我在澳门生活，说说我的感受。这里能经常看到特殊人群，无论是公交上还是过道里，宴会上还是公园里。当然是因为政府做得好，他们会按程度分在不同的学校里和其他小孩一起生活成长，也许有一些太严重缺失没有自理能力，政府也会投入大量金额和精力去帮助他们，制造各种宴会让他们参加。

——微信读者 ja

我也有一位五岁大的自闭症儿子，正在积极干预，花费非常大，家庭生活都快支撑不下去了，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真心希望他长大以后能适应自己的生活，要不然我们死都不能闭眼。

——微信读者洋森

# 刘泓：

## 改变乡镇少年的人生， 他想从人文教育夏令营开始

文 / 朱逸蕾 编辑 / 张希蓓 图 / 除另作说明，由受访者提供

“

刘泓选择坚持下去，多年来学生、老师和志愿者们给予的积极反馈，就是推动他的力量。“青年发展现在几乎没有人不在乎”，刘泓说，但他相信这样的工作，总要有人去做。

编者按：成长是这样一件事——仅仅是某一时刻，某一个细节的微妙改变，就可能改写一个人的未来。这是教育的难点所在，却也是教育的魅力所在，成长自身蕴含着无限可能，园丁所要做的，是在适当的时机培育一个机会。

本篇就是这样一个创造机会的故事。十五年前，身在美国的小镇少年刘泓偶然间获得了一个机会，人生的无限种可能在面前铺开，最终推动着刘泓从美国教育质量垫底州的公立高中走向了哈佛大学的校园。

怀着这样的愿景与热情，刘泓又从哈佛走向了他此前并不熟悉的湖南乡镇，走进了那里的县城高中——刘泓希望，这些身在“欠发达地区”的少年们，也能够像当年的他一样，在人生需要指引和支持的时刻里，拥有更多的导向未来的机会。



刘泓在主持教师工作坊

一提起“哈佛”这个标签，刘泓下意识地警醒起来，脸上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一直保持低调的刘泓，甚少主动向人提起哈佛这段教育经历，而人们喜欢营造一种反差——哈佛高材生，回中国乡镇支教。

刘泓却对这类叙事本能抗拒，“我的教育背景，是我非常怕的一种原罪，因为它代表着某种不接地。”

2007年，刚刚回到中国时的刘泓正是这么“不接地”，那一年，他刚刚结束在哈佛的本科第二年课程，人生最重要的成长和学习经历都在美国，“对中国已经了解很少了”。

那年暑假，身体壮硕的刘泓扛着一大箱书，搭上了前往湖南邵东的绿皮火车。他想将曾经在美国接受过的人文教育，以类似的夏令营形式带回到中国“欠发达地区”。刘泓只给夏令营安排了一个英文名字——“PEER（朋辈/同伴）”。在刘泓的设想里，PEER的使命是“让每一名中国欠发达地区的青年人有机会选择优质的人文素质教育”。

“有机会”，对于刘泓和 PEER 来说，这三个字意味着很多事。

从美国偏远州市，到哈佛校园，对于自己在国内外获得的教育机会，刘泓深感幸运。他知道，即使是成长路上一些灵光乍现式的“启蒙”经验，也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未来。也因此，PEER 致力于促进中国城乡教育公平，想为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们带去更多的机会。这条路，刘泓走到了第十二个年头。

### “我意识到我很幸运”

刘泓自认是个很幸运的人：虽然家境普通，却也享受到了父母拼搏回来的某种“特权（privilege）”。

12岁那年，小学甫一毕业，刘泓就被带往美国读书。并非“非官即富”的移民家庭，他生于武汉，父亲是普通干部，母亲是大学教师。为了争取更多可能的资源和机会，母亲在加拿大结束访问学者项目后，即带着刘泓举家迁往美国，在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安了家。

在当时，这是一个极富冒险精神的举动，而坦帕市的教育质量，实际上在美国 50 个州里几乎垫底。

母亲曾有两年因学业没了收入，刘泓靠着助学金读完大学。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是“来自条件一般的家庭、到了美国普通城市去、从非常普通的公立高中走出来的”。

启蒙发生在高中阶段，刘泓参加了一个叫 TASP (Telluride Association Summer Program) 的夏令营，这个项目在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选拔十多名学生，与大学教授一同阅读、讨论、做文学分析、写作。借夏令营之机，他开始阅读社会科学经典：希腊罗马、文艺复兴……

就在那个夏令营，有一位美国教授带着刘泓，试读了三个《道德经》译本。这次经验有如当头一棒，刘泓意识到，自己的西方人文基础不错，但作为中国人，却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连美国人也愿意研究中国哲学，认为它有智慧，那我呢？”

夏令营的伙伴们也给了刘泓信心和动力，这些接受着精英教育的美国高中生，在申请表上大多填上了哈佛或耶鲁，那些刘泓所在的公立高中从未有人申请过的学校。他们鼓励刘泓：“为什么不试试？”

刘泓试了，竟然很顺利地就被哈佛录取。

到本科，刘泓便有意识地跟随彼时的哈佛燕京社社长杜维明，学习中国历史文化，阅读《论语》、《大学》、《中庸》等儒家著作。

羽翼丰满起来了，此时的刘泓动心要回乡看看。

## 从不懂中国， 到为学生量身订造夏令营

刘泓认为，无论成长在哪个地方，都应该有公平接受优质人文素质教育的机会。

恰逢有一位来自湖南邵东、到美国读本科的伙伴申梦晗，与刘泓一拍即合。对标了自己都在高中中获得启蒙，他们决定到中国县城高中举办夏令营。刘泓相信，这个阶段的孩子，只要有一点选择能力，改变就有可能发生。背上沉甸甸的一堆资料——《麦田里的守望者》、《动物庄园》、康德、托尔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与另外 11 名志愿者，满怀期待地向邵东出发。

到了学校才发现，自己实在太“不懂中国”。拿着这些西方经典名著，他们与学生的沟通鸿沟巨大。在邵东七中的第一个晚上，大概学生见他们样子和善，当晚便集体逃课，翻出学校。第二天，教导主任将学生聚集起来大声训斥，隔了一栋楼也能清楚听见。

这和预期很不一样，刘泓和同伴们面面相觑，互相问出了同一个问题：中学教育到底是什么？

这些学生在这里生活，这个学校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PEER 面对的教育对象里，许多是来自农村和县城的留守儿童。能进入县城高中已算是少部分幸运的、成绩达标的孩子，仍往往缺乏自信、不善表达，宁愿将更多时光消磨在手机上。

这是幼年时缺乏交流、无人陪伴等问题留下的烙印，但在 PEER 聚焦的高中阶段，大多数问题已沉潜到每一个孩子内心深处，再不会直白地表露出来，而当高考压倒一切成为老师、家长甚至学生自己的核心“共识”，沟通、聆听、分析与建议等一切至关重要的软性支持，更不得不为备考无条件让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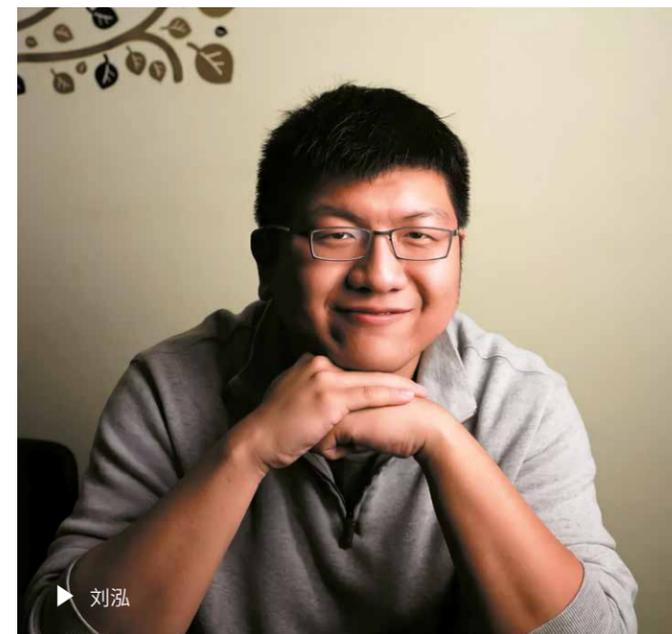
然而也正在这一阶段，仍然稚嫩的学生们却要做出一些可能影响自己一生的关键抉择：专科还是本科，要不要读免费的师范定向，如何决定志愿与未来专业……焦虑情绪掩藏在沉默之下，寻求帮助的手却不知该伸往何处。

“他们往往在很早的时候，被要求做一些没有办法预料到后果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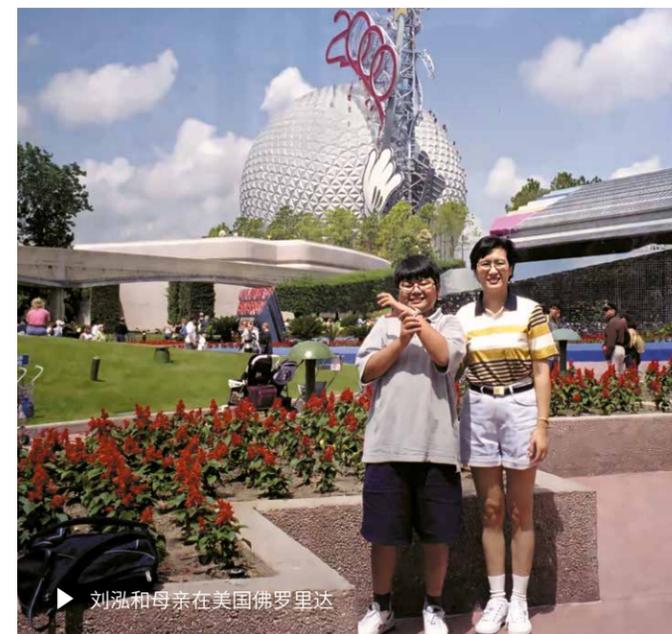
除此之外，县城学校的基础设施、硬件、教师资源，

也与城市相距甚远，当中不乏用“一块屏幕”传送课堂直播的学校。

城乡教育资源不断分化，使得曾一度以升学为唯一出路的农村中学生，面临困境的复杂程度与他们的年龄与能力所及日益悬殊。



刘泓



刘泓和母亲在美国佛罗里达



2000年，刘泓和初中同学在一起

## 连接社区，找到自主的力量

问题无处不在，刘泓思考，县城学生真实需要什么，如何帮助他们思考、做出负责任的选择。

“走进社区”成为了赋能第一步。这些高中生长期被围在学校围墙内，没人告诉他们需要走出校园。刘泓希望，学生能主动思考“我和社区的关系”、“我能为它做什么”，以此培养独立思维、激发能力与潜力，明白他们“有机会选择”。

每一年寒暑假，刘泓和伙伴们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到县城高中，带学生走出学校大门，走进社区，去发现本地问题。

学生们领到一叠任务卡后，即被带动以不同形式去全面认识社区——什么是政府职能？社区快递员怎么送快递的？大妈为什么愿意跳广场舞？如此与社区产生连接，对社区生态、环境有了整体认识，再做行动研究，促进社区行动。

贵州丹寨县一所民族高级中学的学生，发现县城里唯一一条公交线路不合理，而惠及更多人只需更改一两个站点的位置而已。这些学生们联合起来，收

集了很多同学、居民的签字。在把方案提交到当地交通部门后，成功修改了公交线路，这也成为参与其中的学生们人生第一次“有力量的”行动。

另一个小组研究“领导力”，关于如何在村里更好服务、动员他人，于是他们探访了邻村几个敬老院，每家收集一点点情况，事情虽小，至少表现他们对“领导力”的理解——去服务、动员和连接。

刘泓形容这样的知识为“Glocal”，利用本地知识（local），但同时具有全球意义（Global），在核心方法上，这种“激发学生从研究到行动”，是来自于国外发展学的方法论，公共精神贯穿始终。

维持了数年短期寒暑期项目，刘泓开始琢磨给予学生长久陪伴的方式。2015年，刘泓获得一笔投资，“PEER空间”应运而生。

PEER在合作学校划出一个全年的阅读和活动空间，每个“PEER空间”有一名“挚行者”，以组织者和协调人的角色，和进入空间的学生进行交流、对话。

“24小时生活在学校，如果一切时间都是为了所谓学习，会疯掉的”，刘泓说。

PEER空间给学生开出一个呼吸的缝隙，他们偶尔来读读书、下下棋、探讨本校议题，甚至cosplay等活动，在这个小空间里也能被接受。

有一年，有一所高中索性连元旦晚会也取消了，PEER空间的执行者便组织学生起来，做自己的音乐会。意外不少，门票演完了才送到、灯光突然出问题，但学生特别欣喜，那是自主做的事情。

离开“高大上”的公共议题，回归到“教育是生活”的本质。

## 朋辈、伙伴

7月中旬，在北京开放大学宽阔的会议厅里，数十个“PEER毅恒挚友”的志愿者正在完成最后一次培训，准备投向“PEER毅恒挚友”2019年暑期夏令营。

刘泓长得高壮，游走在志愿者们中间尤其显眼。为了听清楚志愿者的回答，他单膝跪地，离他们近些。志愿者们围坐在一起，一一讲述自己坚持参与PEER的初心。

“我高中曾经参与过PEER的项目，受到很深的影响，考上了大学。我现在回归，希望把同样好的影响带给其他同学”，一位准备前往溆浦中学的志愿者说。

一届一届，PEER服务的学生开始回潮，走出省外、甚至国外的青年，正把“外面的世界”带回来。

刘泓提到，PEER营造了一种场域，老师、志愿者和学生之间，是相对平等的“挚友（PEER）”关系。许多学生在人生的十几年里，其实从未被真正平等地对待过；而志愿者作为“外来者”，进入学生成长的社区，可以平等地借助他们的视角了解本地，共同探讨社区。

十数年过去，即使碰了许多壁，“PEER”这个名字的意义，仍然随着一次次项目的叠加，更加明晰起来。如今，PEER拥有了一个与之匹配的中文名称，“毅恒挚友”。

▶ 参与 PEER 的学生在采访当地老人，了解家乡的历史



▶ 湖南省邵阳市城步县第一民族中学的 PEER 空间



▶ 2007年，刚回到中国的刘泓建立了 PEER 夏令营



## 无法衡量的“改变”

许多 PEER 带来的影响可被直观觉察，刘泓却一时无法完全以一种所谓“成效论”，去衡量真正的改变何在。

他举了些例子：一个学生去中山大学做专项面试，更敢于、更知道如何表达自己；有的学生更愿意做有些“冒险”的选择，例如改变专业，去做自己热爱的事；同学散落到各个城市，会因为曾经参加过 PEER 而重新连接起来。还有些当地教师和退休教师，正更大胆地将自己未竟的教育理念，放在 PEER 空间中实施。

很难特别清晰地向资助者描述这些“变化”，刘泓坦白，PEER 至今筹资非常困难。学生有限，备考压力巨大，“高中”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相比“人文素质”这些空中楼阁的标准，投资者更愿意捐助显性的物资、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在小学生身上。

刘泓选择坚持下去，多年来学生、老师和志愿者们给予的积极反馈，就是推动他的力量。“青年发展

现在几乎没有人会在乎”，刘泓说，但他相信这样的工作，总要有人去做。

未来，PEER 会将重心放在成本更高的“PEER 空间”上，空间的长效对于高中阶段的学生非常重要；此外，PEER 还会做大学与中学之间的衔接尝试，继续围绕最核心理念，做下去：让学生可以做选择、有思考。

再次谈起“哈佛”，除了学术训练和同侪氛围以外，刘泓特意提起给他的最大感召。在哈佛 25 个校门当中，有个特别不显眼的校门。门拱上刻有一句话，他仍清楚记得：进门一侧“Enter To Grow in Wisdom（入则增其智）”，出门一侧“Depart To Serve better Thy Country and Mankind.（出则贡献国家与人类）”。

“尽人事知天命，在环境能允许的条件下，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刘泓说。

▶ 参与 PEER 夏令营的学生在展示自己的成果



## 读者与社会反馈

不错。发现了教育的作用，探索了教育的方法，深知了虔诚的重要，明白了坚持的可贵。

——微信读者悠然

看到这篇文章，我再次把 PEER 的所有脉络重新梳理了一遍。我是在 2015 年遇见 PEER 的，当时我还只是个一中的初三学生。如今都快要 2020 年了，真好。我记得我在 PEER 感受到的平等和多元，可以说，我中学时代的窗，是通过 PEER 打开的，它把光照了进来。其实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当初没有遇见 PEER，身处于乡镇中学的我，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面对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人生的路似乎已经订好，做出选择是没有自己的想法但又无法得到良好的帮助时，我该怎么办呢？但是我真的很庆幸也很幸运，我遇见了 PEER，认识了那么多优秀的挚行者哥哥姐姐们，他们并没有把我当做小孩看。我们一起做社区探索、参加社会创新、见证“七挚”的出现与成长、参加夏令营... 一起赋能共创。我真的很像和四年前的那个自己说，你没变成你小时候讨厌的那种人，你的人生出现了很多种可能性。PEER 给我带来了多种可能。我也不再是 15 年那个初三小女孩了，由于自己是公益的受益者和教育资源不平衡的亲历者，所以我越长大就越想做些什么。2020 年的冬天，我终于可以有机会实现我的小心愿了。

——微信读者 Echo of hogwarts

非常 cool 的事情，也是心中跃跃欲试想要尝试的事情 ..... 期待有一天可以做到。

——微博读者 learning 柠檬茶

人文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名词，但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人文关怀是非常急需的，这是教育很难弥补的一个缺口，为这个项目点赞。

——微信读者欢喜

很高兴通过我的学生认识了 PEER，成为其硬件支持者，今天才知道背后有这样的故事。这才是真正的精英，是哈佛想要培养的人吧？

——微信读者王文玲 Nancy

##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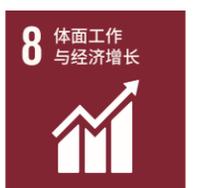
## 生态环境保护

地球村中存在文化、语言、国籍和行政疆域的分，但大自然并不存在天然的边界，河流奔腾不止于国界、阳光普照大地万物并无私心。同样的，海洋和大气污染无法仅凭单一行政区域之力有效治理，保护珍稀物种更是为了留存住整个生态系统。

社会创业家们从生态环境问题和系统的不同方面切入，有的着眼于环境生态立法、有的探索终端解决方案的提供，有的面向更广泛的大众进行倡导与教育。保护和恢复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促进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不仅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口号，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家人朋友、下一代，和我们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

12 负责任  
消费和生产

13 气候行动

6 清洁饮水和  
卫生设施8 体面工作  
与经济增长

14 水下生物



15 陆生生物

# 马俊河： “我不能无家可归”

文 / 苏静 编辑 / 谢雯雯 图 / 除另作说明，由王身敦拍摄

“

“有个杭州爸爸，每年都带他儿子来民勤种梭梭。”  
马俊河听说，小朋友回到杭州后，节水意识强了很多，洗手洗澡都给自己规定了时间，要是爸爸妈妈超过时间，他还会提醒。

编者按：听到家乡可能在 17 年后被黄沙吞没的消息，当时 23 岁的马俊河一开始震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他的家乡甘肃省民勤县位于两个大沙漠的夹缝中，地处中国北方沙尘暴的主要策源地之一。面对荒芜、贫困和希望的干涸，家乡人民正一代代地迁出。

马俊河开始关注民勤的荒漠化问题，最终选择辞职回到家乡，全力以赴地投入家乡的治沙事业中去，并成功打通路径，带动更多家乡人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一起守护民勤。

治沙十余年，已近不惑之年的马俊河骄傲地说：“距离看到那则新闻报道已经过去了 16 年，我的家乡还在！”

民国歌曲《苏武牧羊》词曰：“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

公元前 100 年，汉中郎将苏武因忠于大汉拒绝投降，被匈奴单于扣押流放到北海牧羊，关于苏武的北海，一说在今俄罗斯的贝加尔湖，一说在白亭海，即今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境内。

## “我不能无家可归”

民勤男人马俊河信奉第二种说法。

今年 39 岁的他出生于民勤县夹河镇国栋村，村子南面紧邻苏武山。他听村里老人讲，苏武山上曾有河，名叫“黑河”，河水从苏武山往下流经村东面的干河墩。

干河墩的“墩”本意是“土堆子”，在民勤当地多指古代遗留下来的烽燧，也就是烽火台。古烽燧以河为名，算是给“黑河”的存在佐证了些许，但没人清楚是河先干，还是先给土墩子取的名。

在马俊河出生前很多年，黑河就不复存在。也许，它对国栋村很重要，但它太小，在整个民勤绿洲上微不足道，不足以载入官方历史，没谁追问的话，人的记忆也就和这可能存在过的塞上河流一样模糊消失了。

从地图上看，处于我国西北内陆深处的民勤，就像一块楔子，隔在两大沙漠之间，西边是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东面是腾格里沙漠。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块绿洲原本就降水稀少而蒸发巨大。早年数据显示，整个民勤降水量稀缺，年均降雨量仅 110 毫米左右，年蒸发量却高达 2460 毫米，是降水量的 24 倍。

为了减少民勤进水量的蒸发和渗漏，上世纪五十年



▶ 伫立沙漠中的马俊河 / 王身敦

代末，民勤开始修建红崖水库，替代原有天然湖泊作为目前民勤县内唯一的地表径流石羊河的新终端。然而，在这座“亚洲第一沙漠水库”建成后，新问题出现了。因为水库选址在民勤湖泊进水的上游，石羊河末端的湖泊失去了原有补给，加之中游过度用水、地下水超采，以及过度垦荒导致的生态破坏等因素，民勤重要湖泊相继消失。

传说中苏武曾在附近牧羊的白亭海早变成了盐碱地，《水经注》中曾“碧波万顷，水天一色”的青土湖也不复存在——面积一度达 4000 平方公里的青土湖曾是民勤境内最大淡水湖，与现在的青海湖相仿。

青土湖干涸之后，长达 13 公里的风沙线形成，成为民勤绿洲北部最大的风沙口，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在青土湖呈合围之势。

“要是这两个沙漠合二为一，会形成一个近 10 万平方公里的大沙漠，成为中国第二大沙漠。民勤的绿洲将消失，再放大一点来讲，河西走廊就保不住了。”马俊河顺着 45 度斜坡踏上一块约二十米高的沙丘顶



▶ 马俊河和老乡在休息期间吃西瓜泡馍 / 王身敦

端，感叹：“沙子太厉害了，人呆不住，就成了生态难民。”

2020年8月初的一个烈日炎炎的上午，马俊河在距离县城70多公里的荒漠中，让人顺着他手指方向望，“看到最高的那些白杨树了吗，以树为边界，树里面是农民的庄稼地跟村庄，树外面就是我们种梭梭的地方。”

马俊河从2004年起开始关注家乡民勤的环境问题，五年后辞职回乡治沙，此后十三年间，他组织全国各地志愿者万余人，治理荒漠化土地3万余亩，并创建“梭梭农庄”电商品牌，将民勤本土的沙漠农牧产品互联网化，推动产品的互联网销售，增加当地农牧民收入，希望从根本上减轻土地荒漠化的压力。

相比15年前，年近四十的他从容了很多。

2004年，第一次听说民勤可能消失时，他直接呆住说不出话。当时，他已离开家乡外出谋生四年。从19岁从乡下跑去四川投奔亲戚做学徒，后转到昆明发展，做起中药材生意，按照老家人的眼光，只上了中学的他也算找到了不错的差事。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幻想如何衣锦还乡，“无家可归”的恐惧抢先占据他的头脑。

那一年《南方周末》的一则报道援引中国科学院专家观点称，按民勤当时沙漠化速度，民勤地下水将在17年后枯竭，届时两大沙漠将合拢，民勤也将随之消失。绿洲不复存在，沙尘暴将更加肆虐，可能会长期影响整个中国北方地区。那年5月，曾被民勤人寄予厚望的红崖山水库出现了1959年以来的首次完全干涸。

民勤的存亡，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

“民勤人外出的本来就多，加上那个年代高校已经开始扩招几年，在外面的大学生比以前更多。”马俊河回忆，大量像他这样没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也通过外出打工，在城市接触互联网。

“接触互联网后，人很自然产生新的认识。”打工之余，马俊河开始通过网络关注家乡荒漠化的相关信息。

## 一个出口

“大家受刺激后需要一个心灵出口。但对于拯救民勤，具体怎么做、能做到啥程度，心里都没底。”，马俊河说。专家预测民勤将消失的新闻发酵后，一时间上网讨论的民勤人非常多，正在兰州读计算机专业研究生的民勤学生韩杰荣，利用自己擅长的计算机技术，创立了“拯救民勤网”。

网站初上线时相当简陋，点进去后赫然八个大字——“保卫家园，守土有责”，下面是留言板，然而访问量很高。上线一个月，上千人留言，其中也包括当时23岁的马俊河。

“拯救民勤网”的热闹背后，是当地人对荒漠化的恐惧。2004年的民勤县官方数据显示，全县面积1.6万平方公里，荒漠化面积占到94%；在绿洲外围，有15万亩的流沙、69个风沙口正昼夜不停地进犯，“仅一年就有湖区30个村的1.3万亩良田被流沙埋压”。

韩杰荣比马俊河大四岁，两人进入社会的起点悬殊明显，一个是名校的研究生，一个未上过大学，但在民勤情结上，他们是默契的同乡。

“拯救民勤网”上的网友们也是如此。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一个事情你觉得朝东去合适，我觉得朝西去合适，互相开始争论”。

马俊河和韩杰荣两人商量，网站好不容易吸引了这么多人气，如果老是打口水战，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干脆我们自己先实践一下吧。”他们利用过年假期，骑着摩托实地走访计划造林的沙漠。那也是韩杰荣从1997年外出上大学之后头次认真地打量自己的家乡。

民勤资源匮乏，光靠种地，农民很难维持生计，长期处在人地水三者的矛盾中，本地人习惯了向外走。上世纪七十年代，马俊河的父亲曾和村里的很多剩余劳动力一样，去民勤周边的矿上做工。九十年代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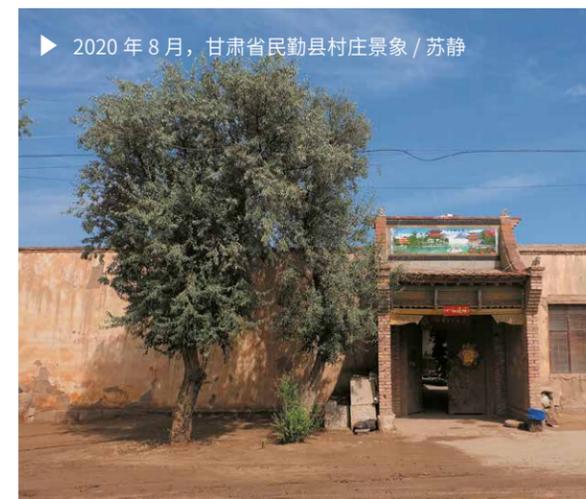
马俊河的哥哥考上中专，后来在邻省省会就业成家，妈妈也进了城，帮哥哥带孩子。

马俊河说，哥哥一家不用再耗民勤的水资源，但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能发挥的能量也与民勤关联甚微了。“对人来讲，想走总是能走得掉，一代人走不了可以两代、三代人走，但走掉之后，这个地方又怎么办呢？”

马俊河重回民勤，记忆中的家乡已经不复存在，他老家国栋村东南方向的干河墩黄沙漫天。而韩杰荣儿时印象中村民屋前屋后密密麻麻种着的白杨树、红柳，也都不见了。2004年起，民勤的沙枣、白茨、红柳等耐旱植物大量死亡，一年损失数十万亩。



▶ 2020年8月，雨后寂静的甘肃省民勤县村庄 / 苏静



▶ 2020年8月，甘肃省民勤县村庄景象 / 苏静

屡次走访后，两人于 2006 年发起成立“拯救民勤”志愿者组织。2006 年，民勤政府对治沙的决心也越发显著，全县机井关闭、耕地面积缩小，政府带领农民积极发展节水高效农业和沙产业。民勤县城入口，“不要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的标语至今醒目。

在民间，两人发起的志愿者组织一开始，也是通过联合媒体进行书画义卖，筹到善款后和林业部门一起去栽梭梭。

马俊河坦言，自己当年对治沙毫无经验，也没有什么“壮士断腕”的决绝，“只是有个很简单的思路：17 年之后民勤绿洲会不会真消失，那是老天爷的事，作为土生土长的民勤年轻人，如果尝试做点事可以让自己将来不后悔，那就去做好了。”

他盘算着，既然民勤面临的危机是荒漠化严重，那就治沙呗，治沙的话，民勤本地最常用方法是种梭梭。而且以他当时在城市打工的状态，“偶尔回乡客串一下‘种梭梭’，也非常合适。”

2007 年春，在完成地形勘察并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治沙协议后，马俊河带着 20 名志愿者回到民勤，这些响应网络征集来种树的志愿者大多是城市白领，从距离民勤 70 至 400 公里不等的武威、兰州等城市赶来。那年，他们完成了 20 亩地的栽种，小计约 1 万棵梭梭。

志愿者的热情让马俊河很感动，但也让他面临一个现实问题，随着拯救民勤行动影响力和规模的扩大，种下的那些梭梭林，以及公益行动本身都需要有人花费不短的时间来承担日常工作。

从网络讨论跨到实践，马俊河就这样被推着离民勤越来越近。2009 年，马俊河从兰州辞职回民勤，全职投入治沙。

## 生态问题还是社会问题？

为了更好地帮助家乡治沙，75 后韩杰荣与 80 后马俊河默契地进行了角色分工，此后十多年，两人也互为支撑。

更年轻、对农村更熟悉的马俊河，后来成为拯救民勤志愿者组织的总干事，全职负责民勤本地工作、志愿者联络任务，及互联网植树项目在民勤的运行。韩杰荣则在本职工作之余负责把握大局和偏技术性的事务。

幸运的是，除了热心的志愿者外，他们的治沙行动还得到了国外大学的华人教授、国内地方史学家、民勤当地政府干部、学者等多方面支持。在他们的帮助和建议下，马俊河和伙伴们进行了新的探索。

2010 年，以马俊河老家国栋村命名的“国栋生态沙产业专业合作社”成立，做过中药材生意的马俊河开始尝试在梭梭林种植被称作“沙漠人参”的肉苁蓉，在绿洲上种植沙漠甜瓜、放养沙漠鸡。沙枣、枸杞等沙漠土特产被他通过互联网向外推广。

因治沙而接触的媒体也希望帮他一把。2011 年春，之前采访过马俊河的杭州日报社发起“拯救民勤·绿色传递”

活动，许多杭州市民开始通过捐款和实地种植等方式参与进来，第一年就有 120 亩“杭州林”在民勤种下。这一活动持续至今。

“有个杭州爸爸，每年都带他儿子来民勤种梭梭。”马俊河听说，小朋友回到杭州后，节水意识强了很多，洗手洗澡都给自己规定了时间，要是爸爸妈妈超过时间，他还会提醒。

“拯救民勤的马俊河说，会替蓉蓉每年种上一棵胡杨树。”一位母亲在其社交账号上写道，这位母亲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也是长期在幕后帮助马俊河的人，蓉蓉是她过世的女儿。

马俊河越来越意识到，荒漠上常见的植物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当这位母亲想通过荒漠绿洲上一年年新生的植物寄托对女儿的爱时，也有人希望借助马俊河们的梭梭为喜爱的偶像做公益。穿过梭梭林，TFboys、鹿晗等明星的名字不断出现在路旁的爱心公示牌上。

在杭州日报一位记者的建议下，马俊河与团队定下“10 元一棵梭梭树”的代种标准，实现了利用互联

网种树治沙的可持续。每一份 10 元中，都包括了种植一颗梭梭所需要的幼苗、买水、运水及人工等成本。

在去种梭梭的路上还能看到一块写着“吃瓜群众林”的牌子，上面的标识画着个戴帽子吃西瓜的男人形象，原型正是马俊河。2015 年，马俊河和团队在甘肃省农村青年电商培育工程带动下开展起电商帮扶计划，注册了梭梭农庄商标，还开发了 16 种特色农产品，其中就包括他和团队开发的蜜瓜品牌“沙瓜先生”。

“从地理位置来看，民勤是天然隔离带。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农产品的糖分积累好，沙漠瓜果的病虫害也少，但毕竟距离中心城市太远。”曾任民勤县电商管理中心首届主任的张学亮说，民勤生鲜的品质不错，只要解决好物流和品牌问题，民勤农民完全可以通过瓜果增收。

张学亮还评价说，马俊河实际上是在用经济反哺公益。马俊河则希望自己不要被拔得太高，他希望人们更多地把“做公益”看成和当老师、做生意、开公司一样的寻常的职业，用更平常的眼光去看待他和团队这些年所做的事情。



▶ 来自杭州的志愿者兄妹俩，在一场大风后将 100 多斤的草墩子从沙里刨了出来 / 王身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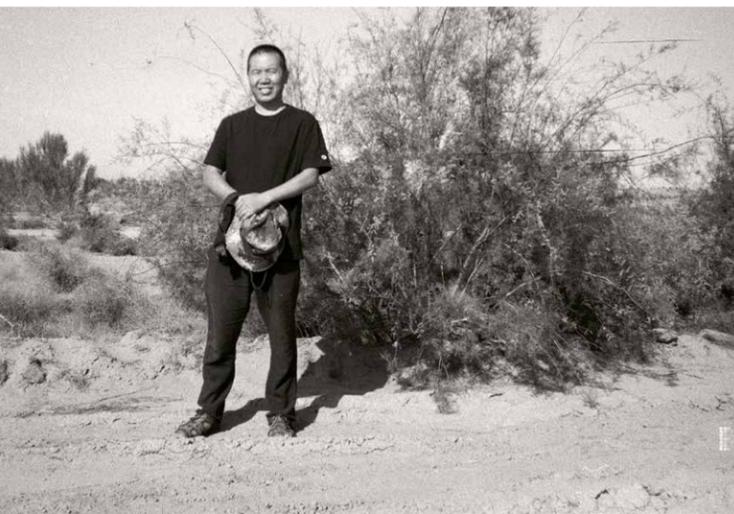
▶ 妈妈带着孩子不远千里来到民勤种梭梭、做草方格沙障 / 王身敦



▶ 马俊河用三台手机进行直播带货 / 苏静



▶ 马俊河查看农场旁的灌溉系统



▶ 荒漠里，马俊河和梭梭 / 苏静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 年民勤本地蜜瓜销售比往常更困难一些，年初下苗的时候农民愁销路不敢多播种，夏天瓜熟时又赶上国内疫情重新紧张，物流受限。

但瓜果不能存放，马俊河只好跟随潮流，开启了自己的“网红”带货之路，变身“种梭梭的马哥”，举着手机在沙漠瓜地里尝试直播卖瓜。有人直接照搬他的文案和拍摄方法，他也不介意，“这说明，我让别人看到了机会。”

这种豁达态度和他的亲身经历有关。1990 年代，马俊河的童年时期，也是民勤荒漠化最快的时候，那时黑瓜子的经济效益远高于一般农作物，农民为了多挣钱，纷纷开荒，把沙枣树林砍了种黑瓜子。之后本地沙化严重，1993 年出现第一次严重沙尘暴，43 人因此丧生，其中学生 33 人，最小的仅 6 岁，倒塌房屋 4320 间。

治了十多年沙，马俊河的最大心得是：“生态问题的本质是社会问题”。更直接一点讲，荒漠化还是“钱”的问题。

他拿回村子种梭梭这事举例：表面上只是租地种梭梭，绿化荒漠。但实际上，做好这件事最重要的是对村内的资源进行优化管理。马俊河回忆，最初国栋村同意让他们无偿用地，合作的条件就包括优先雇佣本村的劳动力，尤其是建档的贫困户们。沟通也要做好，“你得把大家尊重起来”，马俊河一笑。

不然，还在为生计烦恼的农民当然不会考虑“生态环保”或者什么其他的，照样去梭梭林放羊砍柴。“只有让本地人的生活好起来，才能留下民勤绿洲。”

## 苏武新牧

马俊河直播从不开美颜，自小在西北农村长大，他皮肤粗糙黝黑，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很多。五年前，慕名而来的杭州市民就有人说他“像在人生的泥坑中久久滚过的老农”。

但这会儿，以古烽燧做参照物俯瞰梭梭林的他更像一位将领。

明朝民勤人杨大烈曾记载民勤“地处极边，无封邻接壤……六百余里，平沙无垠……旧设烽燧一十二座，脉络相连，捍卫内地”。

马俊河指着不远处的土堆介绍，“那个烽火台叫四方墩，东边有个沙岗墩，穿过那片树过去，还有个烽火台，就是黑水墩。过去，它们连在一起，是长城的外延。没人管的话，这一片成千上万的居民和他们的农田、村庄，将受到西北风侵袭。”

马俊河和团队在四方墩一带规划了生态林一期，规划总面积 3.54 万亩。2016 年至今，已种了 1 万多亩。

“整个三期下来，这片梭梭林将近 20 万亩地。”他算了一下，按现在的造林速度，自己后半辈子基本上是要“交代在这个地方了”。

他在生态林中间竖了块石碑，五六米高，黄底红字，上书“腾格里沙漠最西端”。他希望这里能成为腾格里沙漠的西侧终点，沙漠不再长大，民勤永在。

过去很长时间里，马俊河一直用“沙漠里的鱼”做网名。那时，他觉得自己与周围格格不入，焦虑挣扎。2011 年后，他给自己取了新网名，“苏武新牧”。

### 数据：

2017 年，民勤县夹河镇黄案滩关闭的机井自流成泉，10 万亩芦苇蓬勃丛生。2019 年，民勤政府完成红崖山水库至青土湖连通生态输水工程，全县生态用水量达到 1.48 亿方、增长 8%，青土湖水域面积保持在 26 平方公里。蔡旗断面过水总量突破 4 亿立方米，创 1972 年以来最高记录。



▶ 老乡做草方格沙障、种梭梭、做志愿者现场指导，女性是全部流程主力，功不可没 / 王身敦

## 记者手记

马俊河向几个朋友介绍我是记者之后，大家纷纷聊起民勤和马俊河，有一位喝酒喝到满脸通红的老者，说到尽兴之时，卷起了自己的衣摆，露出肚子，说当年马俊河结婚时，自己和马俊河还没有成为朋友，他请共同朋友带话，让马俊河请他去喝喜酒，他说，“一般人请都不一定去，马俊河没请自己都要去，就是因为认可他这个人，认可他为民勤做的事情。”

令我意外的是，他们认为马俊河的成功，应该归功于他是一个对文化有追求的人，“我们都是对文学世界向往过的，年轻时都是文青”，一位民勤走出去的作家总结他们这群人的共性。

马俊河默默听着，不插话也不制止。整晚，作为聚会发起人，他只是在旁边耐心听着，偶尔递上烤好的羊肉，安静而周到。只到事后才提醒我，对于一些可能引起争议和矛盾的话，最好别写进报道，“没必要和其他人比”。

烧烤结束时，马俊河告诉我，这片沙地就是他最开始种梭梭的地方。梭梭林间的这个铁皮树屋，不过是建筑工地临时板房般的简陋建筑，却被他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梧桐居”。他说，因为铁皮屋建在一棵胡杨树旁，他们本地人也把叫胡杨叫梧桐，树屋所依靠的这棵是整片梭梭林中最大的一棵，其实，总共也就不过三五棵而已，但以前这边都是河滩，胡杨很多。

之后的一天中午，马俊河从饺子店取了个包裹，是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我拍了下封面，发到一个好友群，里面的几位朋友分别在美国南加州和中国的北京、上海，大家一看图，说这本书好。

这一刻，马俊河、我与我远方的朋友毫无区别，都是自诩知识分子的书虫。

马俊河的办公室位于县城中心，从县政府附近一条小巷进去，里面有一个洗脚店的招牌，再从招牌下的楼梯绕进去，二楼，从室内外遗留的音乐培训装饰可知，这里以前是县城孩子学音乐的地方，马俊河低价盘下来后，除了电脑背后贴的“梭梭农庄”字样，没有做任何能显示这里新主人的标识。要不是今年初受疫情影响，需要直播，他可能连这个办公室也不会租。

这些对比画面在脑中碰撞，我不知不觉想到他当初的网名：沙漠中的鱼。

但马俊河绝不是一个孤胆英雄，如同本次世界说报道中记录的“苏武新牧”，他一次次得到了社会的回应，众人行善，聚沙成塔，他也很清楚这一点。在民勤县西边四方墩的生态林中，马俊河让人用绿化工程拉的沙土堆了个大土堆，等将来这一片区的荒漠全治理完，他准备在土堆顶做个凉亭，亭中写下所有参与人和参与单位的名字。至于这个亭子的名字，我大胆猜测，应该和梧桐居能遥相呼应吧。

（节选自手记《寻找马俊河》）

## 读者与社会反馈

马俊河的优秀在于他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带动了一大批人，不仅仅是民勤人，还有其他地方的人们。他的“傻瓜”精神感动着每个人！不管是处于对环境问题的思索还是被这种“傻瓜”精神感动，从刚开始的一个两个，到越来越多志愿者加入，到现在，人们再也不说他“傻”，小马哥已经收获了多方支持，大家都愿意为了这一个目标不懈努力。

——微信读者随心所欲

一个小插曲，上个月看到‘世界说’发布的两篇文章，“我不能无家可归”和“记者手记：寻找马俊河”，十分钦佩，于是发给我爸妈，鼓励他们有空拜访马老师并且认领梭梭树。爸妈前几周去了民勤邀请马老师一起吃饭聊天，聊文学，聊环境，聊生活，并且买下一亩地。

——世界说海外专员 Jessica（悉尼）

我刚买了 100 棵梭梭。是我这月的奖金。/ 我在民勤种下十株梭梭。/ 刚刚替我俩和我们父母各种一颗梭梭树，有机会去民勤县看看，再亲手种几棵。/10 元一棵梭梭的话，我刚种了两颗，希望民勤人民永远有家！/ 身在祖国东南的我在祖国西北有两颗梭梭树。

——微信读者难得糊涂 / 西贝 / 为霜 / 悠悠 / 云

看了马俊河事迹有感而发：匹夫担民难，孤身力量微，只要能坚持，民众愿跟随。心念诞生地，不能无家回，立下愚公志，春色定能归。

——今日头条读者用户 4094243115627

沙漠里的鱼，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绿洲。

——微信读者土豆炖番茄！

数千年前的华夏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新时代的今天，中国依然有人用耕耘和汗水守护家园。真的很感动，也许两三代人之后，广袤的大西北将遍地绿水青山。

——微信读者 Ironside Lee

很感人。怎么能买到他们的农产品呢？

——微信读者 chengzi yan

# 毛达： 检测多款 10 万 + 爆款 口红后，一名环境学博 士决定找电商谈谈

文 / 方澍晨 谢雯雯 编辑 / 谢雯雯 图 / 除另作说明，由受访者提供

“

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他不希望自己孩子以后只能在绘本里看到温顺可爱的“阿呆鸟（信天翁）”。他相信，天空、海洋、土地的环境都是有限的，生存在地球上的人类不能无节制地生产、消耗和污染。

编者按：买到劣质产品，痛斥不良商家，投诉、差评……类似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又是一年剁手季，摩拳擦掌的你是否察觉到缤纷购物页背后的危机四伏？姑娘们的口红、孩子们的小黄鸭，还没上桌的梭子蟹……它们都可能“有毒”——超标的有毒化学物质。

从超一线城市到四五线“下沉市场”，随各大电商平台的渗透，这些“毒”也流遍全国。我们关注民间环保组织“无毒先锋”创始人毛达，看看这位 75 后环境史博士，如何通过撬动电商平台，为中国消费者和更多地球上珍贵的生命“去毒”。

一身白大褂，一头爱因斯坦式灰白卷曲假发，装模作样戴起护目镜，一手拿口红样品，一手拿 X 射线荧光分析仪。“大家好，我是‘无毒先锋’的毛博士……”话没说完，他又笑了场，累计第七次 NG，次次栽在开场白上。

一间借来的化学实验室，桌上排开试管架和从各大电商上买来的销量十万以上的爆款口红。这是民间环保组织“无毒先锋”的创始人兼学术主任毛达，正在拍摄一则短视频。

掌镜的纪录片编导和围观群众纷纷给毛达出主意：开场白，要么义愤填膺，要么充满活力，要么“萌萌哒”，要么恶搞，总之不能是毛达现在这样——完全没有语气起伏。

“行，你让我再想想，”毛达苦笑，闭上了眼睛想台词。“这么紧张？”编导试图安抚，“不是，我真的不知道（开场白）该说啥。”

为了更贴近年轻群体，毛达决定借力时下人气颇高的短视频平台。“人设”也得有趣些才可能吸引

年轻人目光，以上“科学怪人”的装扮，便是他和团队商讨后的创意。

这位生于 75 后的环境史博士，面对新时代的传播工具，却着实犯了难。

“检测结果显示，这款口红的铅含量 12000ppm，超出国家标准 1199 倍；铬含量是 1800ppm，超出国家标准……而这款口红在电商平台中强调自己‘天然’、‘无毒可吃’、‘孕妇可用’。”

“超 1000 倍的毒口红实际上就在吃铅。”

磕磕绊绊过了开场白的坎儿，毛达终于能松一口气，解释重金属化学专有名词难不倒，国家标准也烂熟于心。为了最终不到五分钟的素材，毛达特地从北京大东边奔波到大西边。

刚刚踏入“四十不惑”年纪的他，如今有了新的困惑——如何学会表演。或者说，毛达更迫切想知道的是，如何才能让自己的“验毒”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成为“爆款”。

► 毛达解释电商爆款口红中所含的化学物质危害 / 谢雯雯





► 送检的电商小黄鸭样品



► 毛达在河北一处民间垃圾回收点

## 成为“中国产品验毒师”，死磕“隐形污染”

换下科学怪人装扮，毛达恢复了平常云淡风轻本色。一身素色棉质衣服、踏一双运动鞋，戴着普通近视眼镜，手拿一个饱经沧桑表面凹凸不平的保温杯。

75 后博士却有一颗想做“爆款”的心。毛达希望，通过他的短视频，通过替普通消费者充当“中国产品验毒师”，能有更多人知道“隐形污染”的存在。

毛达说，大家目前热衷谈论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其实谈的是承担污染的环境媒介。有一种污染，已经悄然跨越了媒介。

“一种有毒化学品，可能今天在水里，明天在空气里，后天进入土壤，然后到人们的食物里。”铅、汞、镉、二噁英、邻苯二甲酸酯……有毒化学物质埋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

口红中铅过量将危害智力，危害孕妇肚中胎儿大脑发育。梭子蟹里镉过量，将导致肾结石、骨质疏松和骨骼萎缩。芭比娃娃、小黄鸭玩具中的邻苯二甲酸酯等增塑剂对肝肾有毒，过量会引起儿童性早熟。

国内外也有更多的学者和科学家试图让身边的有毒化学物质的危害更加“显性化”、“货币化”。例如，北京大学环科与工程院刘建国课题组 2019 年 1 月研究指出，2010 年，中国由于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学品（增塑剂）暴露，导致直接社会经济损失约达 572 亿元，以男性不育疾病负担最严重。

但目前，除了少数“镉大米”、“癌症村”、儿童血铅等大规模事件，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近在身边的有毒化学品，更没有成体系的数据记录它们，其中的很多，甚至尚未被国家认证为“有毒”。

面对“隐了形”的化学品污染，毛达却不打算坐视不管。他想做的，是为中国“去毒”。2017 年，毛达创立“无毒先锋”，希望能够让有毒化学品成为环保工作的一个重点领域，从源头上对化学品进行管制。

毕竟，现在市面上的产品测评和“验毒”都只是权宜之计，要求每位消费者都成为“产品验毒师”来规避危害，并不现实。

危害健康的有毒产品，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被生产和售卖。

## 污染随电商一同“下沉”

不过，管也要有策略地管。有毒产品是个庞大的体系，从生产端到消费端链条特别长，其中充斥着资本、法律、社会的博弈。“无毒先锋”需要找到一个支点，来撬动体系的改变。

毛达和团队想到了电商平台。

电商处于连接下游消费者和上游生产、供应商的中间环节，如果能推动电商有意识、有机制地不再接收和售卖有毒产品，上下游都将感受到“信号”。

极光大数据《2018 年电商行业研究报告》显示，电商用户家庭每月在电商上的花费占家庭总支出的 21.9%，中国头部电商中前九名电商的月活用户（MAU）已超亿人大关。16-35 岁人群为电商的主力用户，占比达 85.1%，其中 16 至 25 岁人群占比近四成。

电商已经成为中国家庭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从超一线城市到四五线“下沉市场”，随着各大电商平台渗透全国，隐形污染也跟随流遍全国。年轻人是电商使用主力，也因此最有可能成为受害的人群。

2018 年 8 月，中国首部界定电商平台经营者法律地位、权利、义务与责任的《电子商务法》正式出台。其中，消费者安全保障方面，电商平台对关乎消费者“生命健康”的产品与服务的审核义务，从三审稿时的“连带责任”、到四审稿时的“补充责任”，再到最终变成了折中、模糊的“相应的责任”。

法文字眼的细微修改，背后藏着电商平台、社会公众、法院等各方利益主体间的厮杀博弈。

在法律上的责任界定仍较为谨慎的情况下，“无毒先锋”希望通过日常的科普和倡导，加强电商作为平台经营者的责任承担。

## 艰难推进：电商是敌人吗？

“第一次见面，气氛有些紧张。”毛达回忆起与中国某超大型电商平台公关初次见面的场景，对方似乎怀疑他是竞争对手找来的“打手”，“明明那家平台这种问题也很多，我们为什么不报？”

那次，毛达无意间的检测中发现这家电商上买的销量超 10 万的小黄鸭玩具“有毒”。

后来，毛达和团队又从中国多家主流电商平台上，大批量购买了一些大销量日用产品，交到第三方机构“验毒”，并整合各地市场监管局、消费者委员会的报告。

确实不单单是一家电商的问题。

22 款送检的宝宝洗澡时玩的小黄鸭，73% 检出增塑剂含量超标 110~417 倍。10 款销量 10 万以上的口红中，几乎一半（4 款）产品铅含量超过国家最大允许限制的 4.8 至 1199 倍。他们送去“验毒”的中秋节的月饼塑料托盘、万圣节用的僵尸牙，还有梭子蟹、化妆品等产品，检测结果都“有毒”。

此外，“无毒先锋”经统计发现，三大电商平台上销量排名前 300 款的小黄鸭，只有一半产品有 3C 认证信息发布。在其抽检的 5 款拥有合规 3C 认证的塑胶玩具产品中，作为检查指标之一的增塑剂依旧严重超标。

3C 认证即“强制性产品认证”，要求对涉及人类、动植物健康安全、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的产品进行认证。这一认证制度从 2009 年 9 月已开始实施，原以为能保障消费者健康，却在此时几乎形同虚设。

发现问题严重性，毛达和同事们开始找客服、打监督投诉电话，尝试一切可能渠道联系电商平台，还向毒小黄鸭厂家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结果呢？起初，他们连电商公关的面儿都见不着，从监管部门也没收到理想反馈：商户已提供 3C 认证信息，不予立案。

“无毒先锋”只好根据检测结果，联合中国绿发会发布了一份化学品安全调查报告。因为投放了电商

广告，大部分媒体甚至不愿意报道此事。一家主流媒体主动找到毛达，结果是发稿当天就被撤了稿。

直到几家网络媒体开始以“有毒！”、“危害儿童生殖系统”、“导致儿童性早熟”等醒目、刺眼的标题报道，深圳一家电视台跟进，电商公关才露面，主动联系了毛达。

后续接触的几家电商中的一家派来了品控部门，“他们做得比较好，没把这当成公关事件。”

毛达认为，这远远不应该只是公关部门的事情。电商也并非他们想要打击的“敌人”。

除下架有毒产品、自查等诉求外，现阶段，毛达想做的，是推动电商平台在三年内建立起一套监管体系，真正做到有意识、有机制地向有毒产品说“不”，让毒小黄鸭再也不能“游”进中国孩子的澡盆。

不过，目前的结果看起来并不理想。各大电商给予“无毒先锋”的反馈断断续续，能够回应的也基本停留在“下架”阶段。

► 深圳财经生活频道关于电商“毒小黄鸭”的报道



## “看不惯专家说假话”

很多人不会想到，毛达本科读的是跟环保基本不沾边的工商管理专业。他甚至坦言，研究生转向环境学，基本是机缘巧合加上个人选择。当时，因为“想出国读书”，毛达在发展学和环境学之间，选择了看起来没那么“虚”的后者。

2004 年，澳洲环境学硕士毕业回国的毛达正式投入环保事业。

2007 年前往北师大进修环境史博士期间，他把北京大部分垃圾处理设施，分类回收的、填埋的、焚烧的跑了个遍。

他曾目睹垃圾焚烧厂旁村民在污水和臭气中无法搬家的绝望生存状态，曾用照片和文字记录城市周边的污染乱象。2011 年，他为居住在垃圾焚烧厂边的普通家庭出庭举证——他们刚出生的儿子被诊断为脑瘫。

证明环境损害与受害者健康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向来是环境诉讼案中的难题，法院认为此案中的因果关系举证不足，案件以原告败诉告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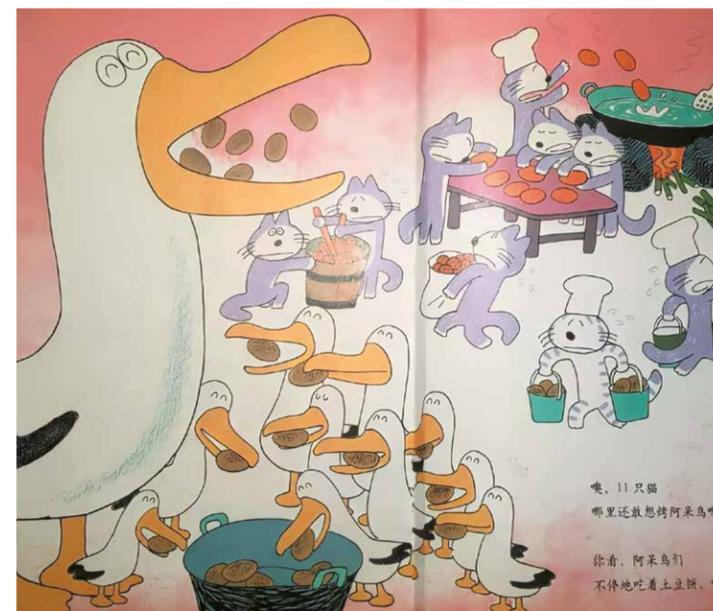
二审败诉后，毛达曾向《京华时报》采访者透露，他并不后悔。“拿自己的知识去触碰现实问题，可能是最好的学术研究，这样才可能逼迫学者进行更深的思考，也挑战着学者的良知和真正的学术突破能力。”

“如果让我说实话，我是最看不惯专家说假话”。同样作为“垃圾专家”的毛达这样直白解释自己坚持的动力。

“（垃圾混合焚烧产生的）二噁英是世界一级致癌物，世界卫生组织都定调了，而且把理由说得很充分，他们非说证据不足！”



► 毛达在“二噁英实验室”



► 毛达与儿子读的《11只猫开饼店》绘本中的“阿呆鸟”

他觉得，人生在世不能只相信“强因果”，很多事情也好，污染也好，不能因为现阶段证明不了因果关系就当不存在、不重要。

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他不希望自己孩子以后只能在绘本里看到温顺可爱的“阿呆鸟（信天翁）”。他相信，天空、海洋、土地的环境都是有限的，生存在地球上的人类不能无节制地生产、消耗和污染。

## 踏上新征程！

2011年，毛达联合伙伴共同发起“零废弃联盟”，搭起一个公益组织、环保人士的合作平台和行动网络，目前集结了超过100个人和团体成员来推动中国的垃圾分类管理、循环经济事业。

2017年，在毛达和他的同道们不懈努力多年以后，国家发布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他很振奋，自己和伙伴们奋斗十余年的垃圾分类管理议题，终于获得了更实质的国家政策支持，也有更多政府、市场资金注入。

“零废弃联盟目前运作比较成熟，我可以暂时往后撤一撤了，但化学品方面很新，还没什么人做。”



► 闭眼想开场白的“毛博士” / 谢雯雯



► 无毒先锋“发现身边毒产品”活动

毛达选择再做一次开拓者。

在早年死磕垃圾处理，与说假话、片面话专家争辩的时候，毛达便关注到了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等高毒污染。他发现，这些有毒化学品，正在以一种更隐蔽、更慢性的方式危害地球生命。

转攻有毒化学品的他，现阶段更多时候是被“无视”的。“无毒先锋”未掀起巨大波澜，也尚无法言说何种显著成就。

毛达定下的所谓核心策略处处碰壁，各大电商平台“商业大战”愈演愈烈，要推动他们花时间、成本自建短时间内无法带来“竞争力”的监管机制并非易事。

想要借助新时代传播工具进行公众倡导的他，也还未能成功参透年轻人的心思。心心念念的“爆款”，还没有到来。

在某流行短视频平台，“无毒先锋”目前的粉丝数只有略显单薄的300余人，最火的一则作品仅获得10条评论。

每年紧贴“双十一”所做的倡导、为大家整理的“雷品清单”，也在双十一前夜疯狂的鼠标点击声和倡导推文寥寥阅读数的反差下，显得有些徒劳和悲壮。

科技裹挟着时代不断向前发展，新事物不断涌现，传播工具、政策风向可能继续变化，本该“四十不惑”的毛达，未来大概率还会因为自己的选择，而经历更多无措和笨拙。

不过，通读环境史，又曾在垃圾议题鏖战中迎来过“曙光”的毛达，早已摩拳擦掌，做好了又一次长期战斗的心理准备。

## 读者与社会反馈

学环境的我绝不认输。

——微信读者老秦家的白小七

在法规完善的国家，这种为他人提供虚假宣传场所的平台是要负连带责任的，代言者也要负上很大的责任，所以很多明星们不敢代言药品等这些自己不确定真实效用和副作用的产品。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必须加强违法监管，别给我说什么监管会减弱创新，阻碍互联网进步，任何进步都不应该是踩踏在广大人民利益之上，不然只是为某些无良者获利的畸形科技怪兽。

——微信读者山抹微云·君

感谢作者，敢于发声。在八月十九号的时候，某宝一女主播售卖假货，销量之大，成本之低，真的是社会的毒瘤。

——微信读者梦

# 张伯驹： 我为地球打官司

文 / 方也 编辑 / 朱逸蕾、谢雯雯 图 / 除另作说明，由受访者提供

“

要发挥更大力量，就要进入法律体系。张伯驹有时觉得，这一切像极了电影《黑客帝国》，现存体制是大系统，社会组织是杀毒软件，用公益诉讼“验伤”，验一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有的验执行效果，没有的就推动。以此让系统升级。

编者按：长大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似乎变了，屋子背后的成长绿地变成垃圾焚烧场，儿时玩耍的小湖被垃圾填满，雾霾笼罩蓝空……除了扼腕叹息，我们能做什么？

今天文章的主人公张伯驹，他不愿只是叹息。作为中国成立最早的全国性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总干事，他以“环境公益诉讼”为法律武器，状告污染企业，替地球的生命夺回权利。他也希望借助诉讼，推动环境保护立法的完善，结合各方力量，保住更多绿水青山。不仅是为了自己和人类后代的家园，那些他珍视的所有地球生命，他一个也不愿放弃。

官司不容易打，每场仗都必须思考战略——要获得赔付、要即刻停止污染、还是要促进法律制度？张伯驹像极了军师，为达到平衡的最佳战局，给天平下砝码：搏命争取，也有舍有弃。



张伯驹在自然之友盖娅自然学校，向记者介绍环保诉讼 / 朱逸蕾

自家律师又被他气急了：“你整天都说‘策略策略’，你姓‘策略’吗？都这么惨了，为什么不能多要求一点、多坚持一下？”急得飙起脏话。

一打起环保官司，张伯驹难免与律师们争得面红耳赤。一些律师每次诉讼都想打完美胜仗，为受害者罗列一系列诉讼请求：污染的企业要停建，要修复，要道歉，要赔偿，还要对方出鉴定费！

“不，诉讼请求砍道歉、砍赔偿，只要停止侵害就行！”在这种时候，有关“策略”那一套此时又被他搬出来——对于一些污染行为还在进行的案例，当务之急是停止危害，如果诉讼请求简单，在现有法律的框架下快速判决的可能性更大。

作为自然之友话事人，张伯驹远不是那种表面上“死磕到底”、快意恩仇的完美主义环保斗士。相反，“策略”、“博弈”常挂在嘴边，为了之后的 1000 個案子铺路，他似乎不急于赢这一个。

当被问到自然之友都进行过哪些环保诉讼，办公室的法律文件密密麻麻，张伯驹从办公室密密麻麻的

法律文件中，抽出四叠厚厚的卷宗，逐一介绍手中这些“法律武器”。

吉林大气污染案、废酸非法倾倒长江支流水污染案、绿孔雀生态破坏案……

自 2011 年成功立下公益环保诉讼第一案起，至 2018 年底，自然之友已提起公益环境公益诉讼 42 起，成功立案 34 起。环境公益诉讼即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公益性诉讼，是指由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其他的法人、自然人或社会团体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

张伯驹所做的，正是代表地球状告违法企业，为受伤的公地及健康可能受损的生命，夺回权利。

社会组织是起诉主体，代表的是“公众利益”。这种方式成本高、周期长。立案要充分准备，胜诉也不易，但这些案件往往在一些法律制定的窗口期，成为立法和司法的重要依据。



▶ 2018 年，云南绿孔雀保护案一审开庭结束后



## 胜算不大的官司，为什么要打？

常州“毒地”案就是典型例子。

事情始于 2015 年 9 月。常州市外国语学校搬入新北区，不久后，不少学生开始出现皮疹、流鼻血，数百名学生被检查出皮炎、血液指标异常。

很快，臭味的来源被发现——与学校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一块荒土。那曾是至少三家化工农药厂所在地，其中一家企业甚至使用该块地长达半世纪。2010 年，农药厂迁出，政府对该片土地进行修复，臭味来源于修复过程中被挖掘出来的大量受污染泥土。

涉及土壤污染的案件向来是个难题。2016 年，困难要比今天大得多。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尚未出台，诉讼无法可依，污染的历史责任也无须担负。此外，土壤污染取证困难且昂贵。这是一场显而易见胜算不大的官司。

自然之友决定介入该案，将涉案的化工企业告上了法庭。

涉及土壤污染的案件向来是个难题。土壤污染取证困难且昂贵，而且，在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尚未出台，诉讼无法可依。这是一场显而易见胜算不大的官司。

之所以介入其中，张伯驹考虑的，是“土壤法”的制定，特别是污染担责主体的界定。简单来说是这样一个问题：企业从前污染了一片土地，现在这片土地的所有权转让后，企业对污染是否就没有法律责任了？

无论判决结果如何，常州案都将为当时正在制定中的法律提供案例参考，无法可依反倒成为改变未来的机遇，“就这几年窗口期，你不通过一些诉讼把这个关键议题推上去，就错过了”，张伯驹不想错过。

现在，他为介入常州案感到欣慰。虽一审败诉，但同期，自然之友还参考常州案的经验，参与了环保等部门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一系列政策制定，为土壤法的立法工作做专项研究，尤其针对上述所说污染者担责一项。

2019 年 1 月 1 日，土壤法正式实施，比对土壤法最终版，自然之友依据常州案等多起公益诉讼实践和研究所提供的多版意见稿，在法律制定上确实起到参考作用。“非常有意思，最终版本有几条变化是很大的，”张伯驹露出满意的笑容。

不过，仅就案件而言，结局并不那么令人满意。案涉地块的污染事实没有查清，地下水污染也未明确。被告企业仅被要求向公众道歉，不需消除污染，也

不需承担环境修复费用。此时，联合原告绿发会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再审申请书，自然之友却决定放弃提起再审。

争议不可避免，张伯驹并不打算替自己争辩，他坦然说道：“我们已经决定背一些不认可的骂名了。”判决“企业对污染历史担责”、“为《土壤法》提供模版”的核心目标已经达成，穷追猛打没有意义。毕竟，只有六七名内部律师的自然之友还有很多场“仗”要打。

常州毒地案中的“妥协”并非个例。诉讼多年，张伯驹作出过多次让步。他曾为震慑某个化工行业而咬住判决、放弃单个污染企业的惩罚性赔偿，也曾为创设罚金创新管理办法而放弃判决，还有些时候，他为保存自然之友的体力，选择见好就收。“哪有那么多赢的事？”

对张伯驹而言，诉讼是与时间的赛跑。他在乎的是——“为什么做这个案子？对具体环境问题可能有什么贡献？对政策制定、立法有什么影响？对未来司法、行业有什么影响？”

借着常州毒地案，自然之友又开启一场新诉讼。他们发现，尽管三家化工企业对“毒地”负有历史污染责任，但常州外国语学校学生受害的直接原因，其实是负责修复这块土地的公司。黑牡丹集团在承接政府修复土地的合同后，为节省成本，黑牡丹集团在修复过程中没有依法依规做好防护隔离，有毒气体顺着风飘进了常州外国语学校。

这说明了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有时，污染问题反而是环保项目本身造成的。

而且，相比大气和水，政府更愿意花大钱购买企业的服务尽快修复土地，因为土地修复后作为地产开发项目，非常有利可图。

“PPP（公私合营）加土壤法，未来几万亿的土地修复市场”。张伯驹认为，市场规范和监管应该在市场起来前建立。

于是，这次，自然之友将黑牡丹集团也告上法庭，以此让违法成本显性化，“让这个行业意图违法的污染企业看到，有人盯着你”，张伯驹说。



▶ 福建南平毁林案：2015 年 5 月 15 日，诉讼由自然之友和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作为共同原告提起，案件在福建南平中院开庭审理

## 从出道时的“自我感动”到策略对战

2006 年刚入行的时候，张伯驹并没有意识到“系统”的重要性。和刚加入公益组织的大部分人一样，他被巨大的使命感笼罩。

最初几年，受难者常常出现在他梦中，他觉得自己的命运与他们紧密相连，他愤恨“政府玩花招，企业拼命想污染”。

初出茅庐的张伯驹将自己比作一匹“骁勇善战”的“野狗”，去抗议、去调研、去谈判，一派他出去，就“咔咔给它搞定”，他伸出手来，做出向前冲的姿态。那是他最热血沸腾的几年——废寝忘食，就算忙到过劳大病，也想为受害者打赢每一场战役。

那是一种带着虚妄的自我感动。直到 2011 年前后，张伯驹参与推动解决了几处垃圾焚烧发电厂问题，迫使他们停建、搬迁远离居民区。但很快，一项新政打碎了他的自我沉醉。

第二年春天，国家发改委发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大幅上调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上网电量的补助标准。利益空间一旦上升，市场资本便纷纷涌入。

张伯驹开始醒悟。此刻，他将面前的白纸卷成圆筒，当作一枚 28 ~ 300mm 的变焦镜头，眼睛凑了上去，细细解释。

过去，他一直用 300mm 的远摄镜头看世界，看到很多特写和细节；而将镜头拉回 28mm，这才发现，他打赢的区区几场战役，不过是广袤地球上微不足道的一角。地平线上，几百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正密密麻麻地而起。

自我怀疑由此产生，“当你已经知道了背后那



张伯驹在长江支流矿业重金属污染现场



张伯驹在长白山-南坡的林区中

些景象，你就想，你能不能在真正的博弈、真正的公共政策和大的决策过程中发挥力量？”

要发挥更大力量，就要进入法律体系。张伯驹有时觉得，这一切像极了电影《黑客帝国》，现存体制是大系统，社会组织是杀毒软件，用公益诉讼“验伤”，验一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有的验执行效果，没有的就推动。以此让系统升级。

## 真正的系统升级！

十多年过去，自然之友团队成长起来，和他们“过招”的企业、法院、立法机构也都系统性地成长了。

张伯驹回忆道：“十多年前，我们志愿者举报一个厂子污染，前脚举报，后脚厂子的保安、领导就来找我了，为什么？”他很激动，声音上扬，迫不及待地自问自答，“那时连举报人的信息保密都保障不了！”

现在，举报者不但信息保密，还能获得奖赏，“这就是制度的改变，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机制化的保障，公众的行动空间就大了。”

不过，在 2015 年之前，自然之友连介入“系统”的资格都还没有。那时，在环境公益诉讼上，社会组织是“黑户”，没有法律承认的“诉讼主体资格”。自然之友创会会长梁从诫于 2005 年就在全国两会倡议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两年后，江苏、贵州、云南才相继出现“环保法庭”。

因此，2015 年的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再次成为自然之友发起的标志性一案。

南平案于 2015 年 1 月立案，是新《环保法》实施后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但在张伯驹眼中，更重要的是，南平案在新《环保法》下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成为“尺子”，影响了“诉讼主体”相关条款及其适用范围的制定。

2015 年 1 月 6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司法解释》）。那天，张伯驹与同事挤在小小的办公室里观看直播。期间，南平案被提及两次，一次用于举例说明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一次被用来说明异地提起诉讼的可行性。此案成为了全国法律系统都要学习的典型案例。

这使张伯驹相信，在《司法解释》的最后博弈中，南平案是关键变量。过去，社会组织和司法系统很少有交集，南平案法庭上，自然之友不得不用一个多小时来证明自己“有起诉资格”。现在，多次立案、胜诉的经验，加上《司法解释》的保障，自然之友几乎不再需要花时间证明这一点了。

例子不胜枚举，“验伤”继续进行。他们曾为保护北京一块无名湿地而发现湿地名录的缺失，打算为更多小湿地命名，帮助它们进入名录。

又比如，在全国首例野生动物保护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云南绿孔雀案”中，他们发现，在北美可用于证明“未成之灾”的建模形式和机构，国内十分缺乏，这使得诉带有预防性的生态案件困难巨大。

对多数社会组织而言，环境公益诉讼是耗费时间、投入成本高的一战。新《环保法》实施至今，由社会组织提起的环保诉讼数量并未明显增加。2015 年一共 53 起，2016 年，这一数字是 68。2017 年，数量还有所下降。

但自然之友不打算一味自己行动，而是扶持更多社会组织成为原告，“法治对于未来中国的环境保护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即使自然之友自己不能诉了，我们也必须保留社会组织发展公益诉讼业务的能力”，张伯驹很笃定。

偶尔，听到工作人员抱怨被告律师“难搞”，他还暗自高兴。因为“难搞”说明有更多好律师介入，也就是说，有更好的律师也开始钻研环境问题了。

## "惊奇之心"与黑暗中的行走

“可能没有无缘无故的喜欢”，张伯驹从小在北京香山脚下的植物园长大，初高中随学校生物组，研究植物、鸟、蝴蝶、蛇，什么都学什么都玩，这些生命一直伴随着他。

入行之后，张伯驹并非没有动摇过。2012年，他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攻读“大中华地区的政府与政治社会科学”硕士，此后留任研究助理。他一度坚信自己不会回来。

直到一天，他去香港新界八仙岭爬山，脑海中突然出现一副画面：未来某一天，他在做学术访谈，对面是相熟的内地环保人，他问及对方的工作策略和所受压力，对方望着他笑，敷衍地回答。“因为这很耽误对面行动者的时间，他会想，‘我还得赶快出去做调研’。”

这一幕如此生动地出现在张伯驹脑海中，瞬间打醒了他，他想回内地，重新成为行动者。

在去香港读书前，张伯驹觉得现实如同一口大黑箱，好山好水进去，出来的却是污浊的水、土地和空气。在他与企业、政府深度打交道后，他发现“坏人”都是被构想出来的，“没几个是坏到让我想打他的，

但为什么最后做出的决策，是这样不利于环境公共利益的呢？”他更迫切地想知道黑箱子里到底有什么。

如今，他不再是旁观者，他挑起自然之友总干事的重担，进入黑箱子，成为了博弈的一方，与不同力量角力。这种黑暗中的角力像极了喜爱的在黑暗中行走。

他曾被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的《惊奇之心》中的一段话“击中”过：

“倘若我对仙女有影响力，我会恳求她赐予世界上每个孩子惊奇之心，而且终其一生都无法被摧毁，能够永远有效地对抗以后岁月中的倦怠和幻灭，摆脱一切虚伪的表象，不至于远离我们内心的力量源泉。”

那些属于黑夜的行走便是他的“惊奇时刻”。采访的多数时候，张伯驹都表现出极强的理性与逻辑，每当话题被打断，总是能沿着偏离的轨道将话题顺回来，这一如他历来的做事风格：目标明确、战略性强。

但此刻，张伯驹的眼睛望向远方，陷入回忆，说着说着，眼泪沿着两颊往下掉。他仿佛回到长白山原始森林的夏夜，大片红松阔叶林遮住了天空，他沿废弃栈道独自往里走。

刚开始，他能看见路，听见周围村庄、公路的声音。渐渐地，微弱光线消失了，风声、人声渐远，周围的蚊子声与黑暗一同笼罩他，他继续走。

这段路，张伯驹走过多遍。第一次走了不到50米，第二次60米，第三次100米，现在，他能走300米。每次都“屁滚尿流”地跑出来，但下一次还是要去。

那是真实的自然，带给他真实的恐惧与敬畏，留在心底，不断与别的动力叠加，成为他内心的力量源泉。



张伯驹在长白山·望天鹅瀑布下

## 读者与社会反馈

真是做到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发挥最大能量。不单单着重于局部单个案件胜利，而是系统性干预以及参与影响到规则的制定。

——微信读者 PPQQ

“张伯驹开始醒悟。此刻，他将面前的白纸卷成圆筒，当作一枚28~300mm的变焦镜头，眼睛凑了上去，细细解释。过去，他一直用300mm的远摄镜头看世界，看到很多特写和细节；而将镜头拉回28mm，这才发现，他打赢的区区几场战役，不过是广袤地球上微不足道的一角。地平线上，几百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正密密麻麻拔地而起。”这一段，特别有体会，全局观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能力，缺乏它，行事就效率低下。但是，拥有全局观的，常常就是少数人，因此不被理解、被误会是家常便饭。意志力要足够，才能接纳这些。

——微信读者当代君

真是太不容易了，感动！少一点键盘侠多一点行动者，对这篇土地才是爱得深沉。

——微信读者木子 ling

我想给他们的组织捐钱，虽然只是一杯水 / 申请加入自然之友做志愿者，用实际行保护家园。

——微信读者初黛 / Camille

敬佩环保诉讼的英雄们！赞同、佩服张伯驹的环保诉讼策略，适可而止的放弃是理性的，明智的，面对巨大的黑箱子，想彻底打赢一场环保赔偿的官司，耗费的时间人力金钱成本以及可能报复的风险，将重点放在停止污染和法律系统的完善上，以有限的人力驱动更大的力量去产生更好更全面的效果。崇高的理念的力量是巨大的，想起电影《永不妥协》里艾琳协助受污染损害的居民主张权益得到赔偿，面对家庭婚姻的困难和调查取证及各种纷扰，坚定信念不屈服不妥协的精神，印象深刻。

——今日头条读者匆匆过客 999999

我是环境工程毕业，也参加过司考，也关注过自然之友，也曾想做环境公益诉讼，但是我最后为了生计苟且于世放弃专业放弃理想。我很佩服他们的执着和努力！

——今日头条读者三流专利代理人

# 张伯驹： 改变一部关于「野味」 的法律，有多难

文 / 李何 编辑 / 谢雯雯 图 / 除另作说明，由受访者提供

“

一方面人对于‘野味’的好奇心和欲望已经在不断消退，过去可能有过的那些集体记忆正在消逝，目前物质比较丰富，蛋白质摄取也有足够来源，年轻一代猎奇心态的注意力已经转移，这些因素都导致市场的刚性增量非常欠缺。

编者按：国内疫情渐渐平息，复产复工复学正在有序行进中。从疫情初期社交网络上对于“吃蝙蝠的憨批”的口诛笔伐开始，“野味”问题再次浮出水面，2016年刚经历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也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再次被提上议程，修法建议远超“禁食”范畴。初期的激愤退潮后，产业利益、贫困户生计等问题也走进大众视线。修法的界限和程度成为热议话题。

从 SARS 到 COVID-19，我们应该反思什么？野保法修法，要改变的是什么？我们采访“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听听长期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和野保法修法的他，如何看待这些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

如果不是新冠病毒的突然爆发，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即使是城市夏夜也很常见、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几乎毫无存在感的这种动物——蝙蝠，恰恰处于国家法律的一个真空地带。

现行《野保法》中规定，“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总量占据已发现哺乳动物近五分之一的蝙蝠类不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之内，“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三有”动物另有国家级名录规定，蝙蝠同样不在其列。

和它一样位于“法外之地”的还有一千余种动物：中国有自然栖息的所有陆生野生动物当中，有多达 1077 种目前不受法律保护。

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前，这些事实曾长期被公众自动忽略：人类对来自自然界的病原体其实知之甚少。蝙蝠类是百余种病毒的自然宿主，其中近半有人畜共患可能。其他野生哺乳动物同样可能成为病原体的中间宿主，这份已知名单已有很长，而未知领域仍普遍存在，新冠不过是其中杀伤力并不算突出的最新一个。

2020 年，有人被“颠覆三观”，有人发誓改变饮食习惯，2月24日，全国人大“全面禁食野生动物”决议出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研究室主任臧铁伟在答新华社记者问时少有地使用了一个感叹句。

“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他说。

## 新的禁令

但对于已在同一件事上投入了十余年时间的另一群人来说，当前的态势并非那么值得激动。

“大家的情绪一定是会退潮的，过去两个月的群情激愤不可能变成常态。”在电话另一头，“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说，“这很正常，可能过几个月就忘记了这些情绪，可能觉得哦那我偶尔吃一次也没什么，于是又回归原状，都是正常的，可以预料得到。”

多年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及野保法修订推动，张伯驹在谈及这些的时候语调平静，“2003 年的非典疫情都没有真正冲击到果子狸养殖业，虽然当时扑杀了一批，也停摆了一段时间，但疫情过去，该怎么吃还怎么吃。”

“自然之友”与野保法修订工作的渊源可以追溯到 2003 年 5 月，在当时突然爆发的非典疫情下，时任自然之友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早早提出修法提案，呼吁在野保法中加入禁猎禁食野生动物条款。

“为防止各类原附着于野生动物躯体的已知或未知病毒、细菌和寄生虫通过人与野生动物的直接接触传给人类，”梁老在提案开头写道，“同时也为保持自然界原有生态平衡，防止因生态失衡引发物种变异，从而产生目前还无法逆料





▶ 夏洒江畔的绿孔雀 / “自然之友”微博

的、对人类生存可能造成巨大影响的后果，建议尽早对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行修订。”

彼时距离管轶团队在果子狸身上分离出高度同源的冠状病毒还有五天，SARS 病毒究竟来自何处仍止步于猜想，但被梁老写入提案中的这段话直到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那年五月，非典疫情正在高峰，国家林业局和国家工商总局紧急下发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暂停一切猎捕、出售、收购、运输、进出口野生动物等活动。这份修法提案引起舆论注意后，也曾带来过“吃食野生动物这种广东传统的饮食习惯在深圳市将变成违法行为”的乐观预测（2003.5.14，《深圳商报》）。

然而事情并未如预期一样发展。同年 7 月 13 日以后，一度肆虐全球的 SARS 病毒突然之间销声匿迹，”非典“之痛很快随着人们正常生活的恢复而淡去，同样恢复的还有对野生动物的猎捕、收购和养殖产业，而修法提案与种种呼吁，则在束之高阁后为人遗忘。

2019 年 11 月，新华网江西频道发表题为《野生动物养殖能否成富民“朝阳产业”？——万安果子狸养殖助力林农致富的启示》的调查文章，其中提及，**全国野生动物产业共有 2200 余家单位，仅养殖行业从业人员就超过五万，总年产值约为 94 亿元。**

而历史已在无人察觉的时刻重走旧路，在庞大的野生动物产业中一个小小的，名为“华南海鲜市场”的角落，另一种神秘病毒正悄然蔓延开来。十七年后，已习惯了网络表达的我们在通讯软件和社交媒体上出产了无穷无尽的表情包与打油诗，用来抒发对于那个“吃蝙蝠的人”的愤怒，其中的绝大多数参与者对于十七年前“非典”的记忆早已模糊不清。

**“十七年前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的破坏的反思没能在立法层面固定下来，没能成为社会安全线，这是很可惜的。”**张伯驹说，“到了今年，社会公众和决策者的意识都在进步，而我们的社会蒙受了更大的损失，这或许能够成为一次更关键的契机。”

“如果我吃了一个玻璃球，导致肚子疼，是应该说不要吃不该吃的东西，还是不要吃玻璃球？”总结过去几年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张伯驹用了一个比喻，**“法律就是要把普遍性和通用性拉出来，要在制度层面有规制。”**

而未知病毒带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或许就是不要过度依赖往日的经验去评估未知事物的危险性，正视人类能力仍然有限的现实。“非人类驯化的动物有太多未知和风险，要把这些有效控制住才行。”张伯驹说。

## 野保法在保护谁

2020 年，我们在全球性灾难来临之际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本次几乎所有提交给全国人大的修法建议方案都提及，要将“生态安全”“公众健康”加入野保法的立法目标。

但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修法建议都仍将“改写‘利用’法，建立‘保护’法”置于修订工作的首要位置。

这是 2016 年上一次大规模修法遗留下来的未竟之业。那一次，投入到修法工作中的规模和阵容可谓空前，但最终的结果却并不如人意：2016 年版《野生动物保护法》尽管也在开篇写入了“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却**仍把野生动物视为一种“资源”，就其落地功能而言，依然是一部“利用”法。**

“2016 年我们期望很高，”问及此事，张伯驹承认，“但最终没能成功，修法过程在不断后退，和立法机构能够实现对话的公益组织和动保组织仍然很少，太少了。”

在推动修订的这一侧，对于修法方向已有基本共识：第一个任务，是要将“有规定的物种保护，没有规定的物种就可以任意利用”的旧思路推翻，变成“有

规定的物种有限度利用，没有规定的物种一体保护”；第二个任务，则是将保护的内容不仅扩大到全部非规定野生动物个体上，还要将野生动物栖息地也纳入进来。

这些努力的根本目标在于维护生物多样性——**需要保护的不仅是某一个珍稀物种，也不只是某一些“外表可爱的”野生动物，而是要保住多年无限度开发以后，在许多地方已经摇摇欲坠的生态系统，是要改变以稀有程度和利用价值来衡量野生动物价值的思路，以维护生物多样性为目的，承认各种野生动物在生态系统中应有的位置。**

但对于公众来说，“保护生物多样性”一类宏大目标显得太过虚无缥缈，2016 年的修法工作最终几乎退回起点，环保圈外的大部分普通人甚至没有留意到这个消息。

而破坏还在继续。那些令人痛心的新闻，如今已经司空见惯到人们不再去愤怒和质疑：毒杀几千只候鸟只为牟利，走私十余吨野生动物毛皮被海关查获，失去了天敌后农作物病虫害爆发，为了灭虫又施用了超量农药……2017 年，云南红河干流夏洒江一个水电站项目上马开工，极危物种绿孔雀、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陈氏苏铁”的最大一块完整栖息地、一处已经极为罕有的局部生态系统，将被淹没。

而在公众察觉不到的地方，自然有它反击的逻辑。

2020 年开年，随着疫情把所有人扣留在原地，许多人才第一次得知我国农作物已几乎只能依靠人工养殖的蜜蜂授粉，如果花期内养蜂人不能及时赶到，作物就面临大幅减产甚至绝收——由于滥用农药杀虫剂和野外栖息地的持续破坏，野蜂种群已经太少太少。

另一种昆虫同样成为社交网络的热议目标：谁能想到过去两年来中东和非洲的几场异常大雨，会在两年后酿成肆虐两个大洲的蝗灾？

野生动物遭到猎杀、栖息地不断被侵占的另一面，则是原本存在于自然界的多种病原体开始在人类聚居地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扩散机会。

人类暴露于疫病的风险不断升高，而追踪其来源却并非如很多人想象中那样轻而易举：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官方网站上，包括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和寨卡病毒在内的各种已经多次拉响过全球警报的知名病毒，迄今仍然是“自然宿主不明，可能包括……”

即使科技水平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人类依然无法预知，如果触动生态链中的某一个环节，会不会在某个地方造成灾难。

“无论你想不想承认，人和动物确实是拴在同一根线上的蚂蚱。”“自然之友”的合作伙伴之一、致力于一线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的“猫盟”在最近的一篇推文中写道。

作为先行者，这些认知对他们已是老生常谈，但多年来仍苦于难以争取到公众的足够支持：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估人类自身的利益所在。

以人类为唯一利益出发点选择“消费”自然，往往指向人类无法承担的后果。

## 产业怎么办？

在修法动向成为微博热搜常客的同时，相关争论也达到空前程度。自全国人大二月“最严禁食令”下达以来，多家媒体关注了禁令之下原有养殖户的生活境遇，进一步将修法的正当性推向了风口浪尖。

网红“华农兄弟”和他们养殖的竹鼠，在这一波争议中成了双方论战的代表题目：他们此前两年里在各视频平台上发布过的“竹鼠被吃的一百个理由”旧作，在今年前两个月的疫情高峰时段里一度被人刷满了辱骂评论，但三月以来有关他们遭遇的报道陆续出台，在社交媒体上又引起了一波“极端环保分子不顾贫困户死活”的激烈指责。

“这算是率兽食人吗？”一位“大V”在其中一篇报道文章的评论里问，他有 55 万粉丝。另一条评论则写道：“必须撤销人大常委会 2 月 24 日决定”，他的微博认证显示其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把事情极端化无助于解决问题，对于意见的任何一方都是一样的。”张伯驹说。在他看来，推动立法的过程，也就是各方利益充分参与博弈、在对话中寻找共识的过程，而对于如他一样的修法推动者来说，利益群体和相关产业是一个必须正视、也值得充分讨论的问题。

从华农兄弟的竹鼠说开去，网友们的关注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原本合法的生意突然被叫停，相关产业从业者的利益如何保证，损失谁来承担，会不会导致一部分养殖户因此返贫；“一刀切”式禁止食用和消费野生动物，会不会造成意想不到的更大问题；过去常因落实程度不尽如人意而遭遇诟病的野保法，在新修后就能不一样了吗？



埃博拉病毒的传播 / 美国疾控中心

而在修法推动者的角度，“当前存在产业和从业者”与“该产业有权利继续发展下去”更像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相关产业从期待上应当是一个夕阳产业，从市场来说也难以成为一个朝阳产业。”张伯驹解释，“一方面人对于‘野味’的好奇心和欲望已经在不断消退，过去可能有过的那些集体记忆正在消逝，目前物质比较丰富，蛋白质摄取也有足够来源，年轻一代猎奇心态的注意力已经转移，这些因素都导致市场的刚性增量非常欠缺。”

过去的经验表明，转产既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林业部的工作内容曾是安排全国木材开采，这一“砍树”行业在九十年代后已全面转变为“种树”。由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当年的林业工人可以转产，现在的利益产业也可以。

但转产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在修法的大方向之外，执行细节上的合理变通是这些修法推动者们同样关心的问题：事实上，叫停相关产业涉及到的不止有“从业者怎么办”，更为直接的是“养殖动物怎么办”：就地解散行不通，庞大的养殖数量导致它们一旦进入野外，很快将带来新的生态灾难；而全部扑杀，是任何人都不愿看到的场面。

“这是考验政策制定者和执法者智慧的时候。”张伯驹表示，目前各方讨论中的解决方案主要包括设定更长转型期和建立养殖利用“白名单”制度，为法律最终落地搭建一定的灵活度，但具体操作仍需进一步完善。亟需改变的是当前“不禁止就可利用”的法律环境，而已经存在的那些产业链，现实决定了它们更适合慢慢来。

今年 3 月 12 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在发布会上表示，野生动物养殖在农村并非支柱产业，“总的来讲，不会对脱贫攻坚产生太大的影响。”

当然，人少不是被牺牲掉的理由，人多也不能成为“占理”的原因。如何平衡产业利益与公共利益，是这些已努力十余年的公益机构仍在面对的课题。4 月开始，“自然之友”与其他伙伴合作，在微博上推出了一系列微访谈活动，关注度远超想象，其中最热的话题，无不与开发和保护的界限问题相关。

“公众一定要参与到这些讨论和行动中来，能够改变很多。”张伯驹说，“最有可能决定产业命运的不是法律也不是政策，而是消费者的意愿。”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在这里或许依然适用。

▶ “自然之友”在微博发起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法话题讨论 / 自然之友公众号



## 仍在前行

几乎所有自然保护参与者都有属于自己的执念与启蒙时刻，对于张伯驹，那是夏夜在长白山原始森林中孤身向前的一段路程：起初仍有来自村庄和公路的光与声，渐渐地都被抛在身后，逐渐降临的黑暗与恐惧越来越甚，迫使他折返，却也吸引着他一次次尝试。

如同一种命运的隐喻，这条路并不平坦，一旦开始，却让人欲罢不能。

早年，刚刚进入“自然之友”的张伯驹曾致力于与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污染行为“作斗争”，但成功推动两三座焚烧厂停建之余，他看到的却是利益链条推动下成百上千座发电厂正在拔地而起，伴随的是污染排放和对环境健康的持续影响。

必须从参与立法和监督执法入手，张伯驹和同伴们因此踏上了推动环境立法的漫长道路。

在这个春天，他为之奔走数年的“绿孔雀案”终于初战告捷，自然之友努力了近二十年的野保法修订，也正在迎来又一次窗口期，张伯驹仍抱持着谨慎的乐观态度：尽管推动改变依然艰难，但过去十年，公众对环境和自然的认知与态度，都已经真真切切地改变了很多。

他常常向人回忆起自己参与 2016 年野保法修法时，发生在修法讨论会上的一幕，那一次，包括自然之友一名代表在内的“保护派”只有三人在场，而坐在对面的却足足有十几家机构的代表，分别来自商业利用野生动物产业链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

利益群体是现实的，是具体的，其存在也合理合法，有它们各自具体而微的诉求和主张。

只是，当代表产业利益的人积极参与到立法环节，公共利益的代表们，尤其不应退缩。

► 张伯驹在金沙江进行生态影响考察



## 读者与社会反馈

今年的新冠病毒的宿主是野生动物。疫情发展到现在，大家都痛恨贩卖和吃野生动物的人，许多人都呼吁修改野生动物法。

野生动物是生物链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让我们的生态更平衡。很多野生动物是许多病毒的宿主，许多传染病都可能来自野生动物。所以，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其实也是在保护我们人类。这场由野生动物引起的疫情，人们已经和它抗战很多天了，我相信我们快胜利了，让我们一起等好消息吧！

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让我们和大自然的一切和平共处。希望这次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能彻底切断非法交易链，如能永久关闭和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则是国之幸！

——微信读者顺势而为

中国西南地区有千千万万“华农兄弟”，2016 年调查就有一千六百多万从业者，2016 年之后竹鼠肉蛇等特种养殖动物作为扶贫项目更被政府大力宣传支持，农民相信政府相信政策投资养殖，一刀切禁止不仅是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更会直接打击农民继续投身农业的积极性，对政府公信力受到影响，扶贫干部在农村开展工作会更艰难，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野生动物”怎么定义？“野味”怎么定义？能够完全人工繁育养殖并且已经形成产业的特种经济动物是否还是“野生动物”？相关是否能够制定出一套监管检疫制度？就算是猪牛羊鸡鸭等养殖长久的“家畜”都会爆发传染病，难道一刀切掉特种经济动物养殖就能杜绝此类传染病的发生吗？作为养殖户，我现在很绝望，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但是无人能给我解答。

——微信读者辣鸡辣鸡小辣鸡

不管源头在哪里，吃野生动物这个事真的要真正立法执行。要不是这次疫情，我真的就以为只有广东吃野味。这种陋习还存在于很多地方。真切希望国家这次能重视。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只是体现在 GDP 上。

——微博读者波士顿之魂 34

在印度小镇的时候能够稳定获取的肉只有鸡，偶尔有羊，各家散养的因为没有产业，中国能吃的肉够多了，吃野生动物可能是娱乐方式匮乏时代遗留的一种猎奇？产业不应该是革除陋习的障碍。

——微博读者 so\_九野

“公众一定要参与到这些讨论和行动中来，能够改变很多。”张伯驹说，“最有可能决定产业命运的不是法律也不是政策，而是消费者的意愿。”

——微博读者 SootheMePuppies

# 璇芷： 断了污染企业财路，她 让受害者不再跪着哭泣

文 / 黄英男 编辑 / 张希蓓 图 / 除另作说明，由受访者提供

“

在璇芷看来，如果说绿家园核心是“育人”和赋能于普通民众，绿行者则更像一个民众与金融机构的“接口”，以金融机构所熟悉的“数据”、“风险评估”为对话语言，不断向金融机构播放来自环境与社会的声音，推动资本向绿，推动企业更好地承担环境责任。

编者按：如果要为即将过去的 2019 年选几个关键词，“环境”一定是最大热门之一。过去二十年，“环境污染”在人们心目中从“发展的必然代价”逐渐转变为“必须考虑并规避的严重风险”，观念转变的背后，既有时代与生活水平发展带来的认知变化，也有诸多环保工作者多年来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

我们关注的就是这样一位环境保护领域的先行者与开创者。投入环保事业十二年来，璇芷的目标从培养懂环境、能发声的本土“家乡守护者”，逐渐转向与金融机构合作，从源头截断污染企业的融资渠道。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始终不变的是初心：让保护家乡、保护环境的人可以站起来。

前几年，在网上发如何帮助企业做环境整改的信息总会引来攻击和辱骂——比起“改进”，人们更愿意相信这是在帮助污染企业弄虚作假。

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过去人们一提环境污染就很激进，现在好多了，我们不想把企业一棒子打死，而是帮助他们整改。”福建省绿行者环境保护公益中心总干事璇芷总结。

投入环保领域 12 年后，这位曾经极度在乎形象的前电视台记者，已经习惯于 T 恤衫牛仔裤的“混搭”，只有那份干练敏锐的气质始终不改，在我面前的，仍是那个 21 岁就开始构思自己墓志铭内容的女孩。

## 你这个骗子！

1986 年，中国第一首公益流行歌曲《让世界充满爱》一夜间红遍大江南北，街头巷尾，男女老少张口都会唱：但愿会有那么一天，大海把沙漠染蓝，和平的福音传遍，以微笑面对祖先。

这一年，璇芷出生在福建省宁德市，她的命运，也应了那句歌词，与公益有了宿命般的关联。

2003 年，还在福州大学物理信息工程读大二的璇芷进入福建省电视台，成为新闻频道一名实习记者。几乎每天，她扛着摄像机走街串巷、上山下乡，哪里有线索就奔向哪里。

在乡下，只要采访车一停下来，远近的村民就不断涌来，牵着牛、抬着粪，反映各种问题。有些问题容易解决，无非是张家的鸡去李家下了蛋，这个蛋归谁；两家的牛不小心‘合作’生了个小牛，小牛归谁。这些新闻有趣有意思，也好解决，但另一部分，就让人头痛了。

21 世纪初，各类工业企业大批在沿海出现，水量充沛、生产成本低廉的福建农村成为众多企业瞄准的建厂地，同时，地方政府需要经济发展、整个社会环保意识不强等原因，也都为这些企业提供了野蛮生长的空间。



▶ 璇芷



▶ 刚毕业时在福建电视台做记者的璇芷

期环评公参名单	联系电话	住址	有无此人	是否本村人	是否参与问
	8859 9776	白马村	✓	X	
	8859 085	白马村	✓	X	
	8950 645	白马村	X	X	
	8950 011	白马村	X	X	
	8859 899	白马村	X	X	
	8859 020	白马村	X	X	
	5059 3142	白马村	✓	X	
	3601 030	白马村	✓	X	
	307	被代表的村民			
	8759 768	白马村	✓	X	

▶ CCTV-13 “新闻周刊” 节目报道福建“被代表的村民”



▶ 环境守护者培训会

而后知后觉的村民们，往往只能在深受污染之害以后才开始“告状”。璇芷经常接到村民投诉：我们地里的庄稼长不出来了，我们鱼塘里的鱼苗都死了，我们的水臭了，空气太臭家里已经开不了窗子了……

2006 年的一个秋天，璇芷接到“线人”电话：有村民要提供水污染事件线索。在电视台一个经常跟“线人”见面的铁栅栏边，璇芷见到二十几个面容苍老的农民，见到璇芷，一只只手伸过栅栏，拿着各种材料。

“我们不识字，听说要材料，花钱让商铺里的人按我们说的打的字。”璇芷接过一个村民的材料，在一段表意不清的文字下面，看到一片歪歪扭扭的签名，有的签名上有红手印。

“为什么有的名字没按手印？”璇芷随口问。

对面的人要回那张纸，另一些人几乎同时把手指放在嘴里咬破，纸在众人手中一一传过，一个个新手印按上，血迹殷红。

璇芷震撼，答：“好！我帮你们！”

听到这话，对面一个村民突然跪了下来，然后，两个，三个，四个，所有人都跪了下来，因为隔着栅栏，璇芷没办法扶起他们，吓得只能挥手跳开。

由于村民提供的信息混乱无序，回到台里，璇芷自己展开调查，她每天都会接到村民很多个电话，唯一的问题就是事件到底能不能上电视。调查不断深入，璇芷还是没能给出确定的消息，村民的耐心在慢慢消失。

由于事件客观证据不充分，璇芷在一周多的调研后最终判断这个线索无法报道，在电话中告知结果后，璇芷听到电话那边村民的怒吼：

你这个骗子！

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璇芷问自己。

### “想找一条让自己义无反顾的路”

从 2003 年实习到 2006 年正式成为福建省电视台记者，璇芷手上接到无数起环境污染线索，其中，能搞清楚原委得到解决的，不足十之一二。

精力充沛的璇芷在 qq 上建了一个群，群友是媒体同行或者工作中认识的各类有社会资源的人士，帮助病童、助学、助残，每次工作中遇到需要帮助又没办法报道的线索，都被璇芷扔到群里，刚开始，大家特别热情，每扔一个线索，大家就几百几千地捐。

一次，璇芷和朋友拿着捐款去看一个白血病病童，进入病房，让璇芷震惊的是，四周到处都是小小的病床，每一张床上都躺着一个白血病孩子。为什么这么多孩子得白血病？跟环境污染有没有关系？璇芷问孩子们的家人，只得到一些模糊的答案。

同时，随着求助信息越来越多，群里的回应也缓了下来，“从捐几千到几百，到几十，再后来，消息扔那里，几乎没人回应了。”

从实习时起，因为接到的环境投诉多，璇芷一直在

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以下简称绿家园）当志愿者。几年下来，不仅结识了大批专家学者，也逐渐理解了环境领域的各种知识和术语。

她发现，对于专业内容，“从零开始”并没有想象中难，有时她也会想：如果村民能懂环境知识，事情就不会发展到无法逆转，甚至彼此对抗的状态。

当传统医疗救助渠道越来越力不从心，焦虑的璇芷似乎发现了一条新路：“我恐怕不能救治病人，但环境问题，我应该可以做一些事。”

适逢电视台那几年正进行集团改制，很多电视人辞职成立工作室。

“那时我经常想：活着的价值是什么，人这一辈子很短暂，我活到七、八十岁总要死的，我死后墓志铭要怎么写呢？”

2007 年中，尽管没明确最后的职业选择，璇芷还是辞职了。“我想找一条能让自己义无反顾的、有价值的道路。”

## 从受害人到守护者， 让跪着的人站起来

辞职后，璇芷跟朋友合伙成立了一个传播公司，靠工作几年积累的人脉和专业能力，公司业务开展得很顺利，但对于璇芷来说，它只是一个谋生工具。

尽管还没想好职业规划，但辞职后的她，直接以志愿者身份一头扎进了绿家园，终于有机会去探索当初思考过的新路径，“家乡守护者计划”由此而生：在村里建环境自救站，培训村民掌握环境知识，教会他们如何进行环境监测和监督，以及如何跟各方沟通，最终，让村民自己成为家乡的守护者。

2008年10月，绿家园的第一个环境自救站在福州市马尾区长安村成立。

长安村位于闽江入海口附近，村子附近几家工厂每天会排放带着恶臭味的气体，村民家一年有八个月时间不能开窗，生活苦不堪言。

璇芷每周带着环保专家和业内人士来给村民做培训，村民知道培训内容跟自身利益相关，参与热情很高，而附近的污染企业，每次听说绿家园要来培训都会停产。

一年后，在“成长起来的村民们”的监督举报中，村里的污染企业陆续停产、搬迁。三年后，长安村环境自救站开始自我运营，村民不但自己组织开展环保活动、建立环境监督小分队，还到附近村子去宣传，附近村看到长安村污染事件的解决，也纷纷效仿。

2017年，璇芷入选培养公益领域领导型人才的“银杏伙伴计划”，银杏基金会一位顾问评价璇芷：**她让跪着的人站了起来。**



▶ 成为“家乡守护者”的林岚

## 从不再“被代表”的村民

林岚是2010年培养起来的家乡守护者，由于家乡村庄附近几个工厂的发展，林岚口中“像电影画面那么美”的家乡环境被严重破坏：土地被废渣覆盖、黑而臭的污水直接排进池塘，几根烟囱冒着时而黑、时而黄、时而粉色的浓烟。“我妈说，每天窗台上都会有一层粉色的土。”

村民由不安到采取行动，推动当地环保机构召开环评听证会。得知此事的时候，离听证会只剩一周的时间，林岚急了：“我们谁都不知道环境听证会是什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经人介绍，林岚来到绿家园找到璇芷。

经过璇芷一对一的培训，一周后，林岚作为唯一的女性和几位村干部一起成为环评听证会上的村民代表。

“开始很紧张，但等说到具体的环境问题时，因为我做了功课，就越来越冷静了。”在第二次听证会上，

林岚甚至当面挑战一位参与撰写环评报告的知名环境专家，气得对方指责林岚提问太“弱智”。“我们村民的确不懂这些，如果都懂了，我们也可以像您一样写环评报告了。”手举环评报告，林岚从容说。

经过林岚和村民们的调查了解，工厂在建厂之前提供的环评报告，是一份伪造村民意见的假报告。白岩松以《被代表的村民》为名，对这起污染事件进行了报导。

截至2019年底，“家乡守护者”总人数已超过2000人。绿家园从过去由学者、专家、政府官员自上而下的环保行动机构，逐渐变成扎根大地，由乡村家乡守护者自下而上形成的环境防护网。

“很多守护者比我还专业，五六十岁的农村大爷，给他一本环评报告，人家翻开就能给你讲，还能给你划重点。”璇芷很骄傲。



▶ “家乡守护者”在福建南平对一处排污口进行检测 / “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公号



▶ 长安村的环境自救站在2018年迎来开设十周年 / “绿家园”官方微博

## 环保“玩法”升级

“合伙人说一年都见不到我两次，我自己也觉得有亏欠，生意找上门了我都没时间去谈，没精力也没兴趣管公司了。”2010年，璇芷从效益依旧不错的公司退出，全职在绿家园做项目主管。

“像我们这种普通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爱好，她的爱好就是工作。”璇芷的丈夫这样评价她。

工作对于璇芷来说确如爱好，热衷于解决问题的她，如同玩游戏遇到升级挑战，只有不断打赢下一环，才能获得成就感。

“家乡守护者”项目启动后，迅速在福建全省建立起专业的村民志愿者队伍，深受村民欢迎，也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村民监督企业”仍然属于在环境污染链下游解决问题，如何从源头做起，让企业更好地承担环境保护责任，落实环境风险控制，确保生产经营活动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璇芷动起了脑筋。

2008年的一次会议中，璇芷第一次听说了“赤道原则”的概念。采用“赤道原则”的银行，会在其贷款、投资项目评估时，更明确地将项目的社会、环境影响和风险纳入考核范围。

璇芷发现，其时，中国的金融机构在提供贷款时，更多的还是考察企业本身的业务是否有发展能力，防止出现无法还贷的风险，而并没有考虑到环境影响因素，这就造成很多污染企业可以仅凭市场业绩表现获得持续发展或扩张的资金支持，造成更多更大规模的环境问题，如何推动资本向绿？这是她想做的事。

2012年，璇芷被理事会任命为机构总干事，也在这一年，她开始尝试在中国推进“绿色信贷”项目：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拒绝给有重大污染问题的企业提供贷款，迫使有环境风险的企业进行整改。

说服团队和合作伙伴共同改变工作组织方式，全力投入新的方向，这一过程并不容易，但璇芷终究做到了。项目团队从“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和各省市区的“重点监控企业名单”下手，对这些企业逐一进行信息收集、整理、清洗、分析，然后整理出福建省内的污染企业名单。

企业名单只是第一步，最关键的还是说服金融机构接受新的风险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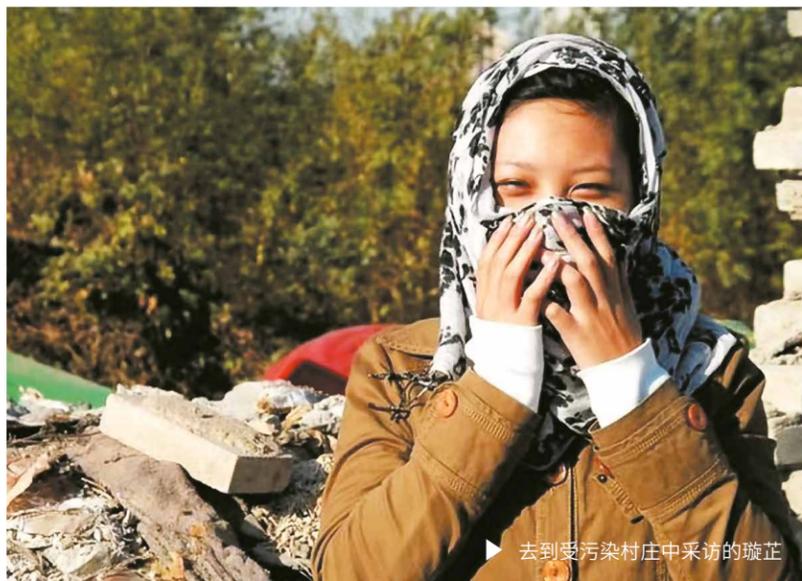
“有些回邮件表示知道这个事情了，但我们做不了，有些说我会转达，但你再问转达到哪个部门，对方就会告诉你这是商业机密。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更多的是没有任何回复。”璇芷说。

最终，通过上门沟通，总部在福州的兴业银行接过了绿家园抛来的橄榄枝。2012年底，双方启动“绿色信贷”合作，由绿家园向兴业银行提供企业信用名单，银行参考名单上的环境风险级别来决定哪些企业可以获得贷款、哪些不能。

“绿色信贷”如一记重拳，让有环境问题的企业难以发展和扩张。甚至有企业曾因为贷不到款，法人带着办公室主任闯进绿家园，坐下不走并扬言要跳楼。

“我们可以叫楼下保安把他弄走，但我们想教育改变他，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就一直在讲你为什么污染，你是怎么污染的，结果对方一直说我们胡说。”璇芷说。

“后来只能我们工作，他们在那坐着，下班时，我们说，我们走了啊，你要不要走？他说我明天再来，第二天也没来。”璇芷笑。



去受污染村庄中采访的璇芷



福建一处污染工厂旁，空气弥漫腐臭气，当地居民12个月里8个月不开窗



“绿行者”的企业环境和社会风险评级结果推荐使用原则

## 推动资本“向绿”

为集中精力投入“绿色信贷”实践，2014年10月，璇芷从相对较成熟的环境守护者培养项目中离开，往环境保护的上游环节继续探索，希望撬动更多的金融机构和企业践行社会和环境责任。离开绿家园的她，创建了一家全新的机构——福建省绿行者环境保护公益中心（下称绿行者）。

如何进行田野调查、与企业 and 老百姓对话？带着这些多年一线调研培养出来的能力，璇芷为绿行者定下了一个更具野心的方向：除在线上公开环境信息的收集外，绿行者还继承“守护者”一线调研的“基因”，从福建奔赴全国，与当地机构合作调研、收集数据，再对线上线下、官方与民间的所有信息与反馈，进行聚合和深度分析，最终产出金融机构能快速应用的公共产品。

截至2019年，从政府公开的信息及环保局反馈等官方渠道，绿行者的平台已聚合整理全国超过40万家企业的环境表现，并结合5万家企业环境信息与超过1500次线下调研结果，将其分类评为绿、白、黄、红、黑五级，最终形成《企业环境风险预警名单》。

利用这些名单，环保机构可以有针对性的定位到需要关注的企业，政府可以参考企业环境信用评级名单，公众可以了解企业环境表现情况并加强监督，金融机构可以作为风险参考，企业则可提高有针对性的管控工作。

在璇芷看来，如果说绿家园核心是“育人”和赋能于普通民众，绿行者则更像一个民众与金融机构的“接口”，以金融机构所熟悉的“数据”、“风险评估”为对话语言，不断向金融机构播放来自环境与社会的声音，推动资本向绿，推动企业更好地承担环境责任。

## 墓志铭上到底写什么？

绿行者的伙伴评价璇芷：她真的太厉害了，从不允许自己停下来。

得知自己怀第一个孩子时，璇芷刚结束了一个 48 小时没休息的乡下调研，一个人回到办公室，突然而来的剧烈的腹痛让她倒在了地上，挣扎着给丈夫打电话求救。送进医院，检查结果是：怀孕了。回家休息的第二天，璇芷开始出血，连续出血一周后住进医院，一住一个月。

“我当然害怕，很怕孩子保不住，住院时我平躺在床上动都不敢动，非要下地时，我就扶着墙一寸寸的挪。”即使这样，璇芷一天没耽误工作，她把同事们叫到医院坐在她床边一起办公。

“直到保胎成功又上班，我才告诉同事我是因为怀孕住的院，我不想让他们有压力。”

生完老大刚被推出产房，手机响，璇芷冲丈夫说：“拿来！接！”

生老二时，璇芷干脆提前按照最早可生产日期预定了剖腹产，生产前一周还在出差。生完孩子一个多月，又出现在办公室。

还好，努力有了回报。璇芷觉得，跟刚开始做环保相比，整个社会对于“环境保护”的认知和“玩法”都在不断升级。过去一提到环境污染和保护，大家不免激进，而现在，随着支持政策的出台、污染信息公开的加强，她进行了 12 年的事业，正往更理性、系统的层面进化。

现在，璇芷不时还会遭遇一些企业的敌视、一些金融机构的冷眼，这些机构更多是遭遇实际风险后，才开始重视来自环境与社会的声音。但手握更多“武器”的她，比当初那个扛着摄像机、一心想着如何曝光污染企业的女孩，多了一份笃定。“我们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一棒子打死企业，而是希望大家可以看清问题，一起坐下来研究如何整改，如何安全规范地发展。”

“做事业这个过程很孤独，就像攀爬一座又一座的险峰，你旁侧无路，后是悬崖，你没得选，唯有继续往前。”

面对我“墓志铭打算写什么”的问题，璇芷说，“墓志铭怎么写，我现在也没想好，活着我想轰轰烈烈地做事，死后，就轻于鸿毛吧。”

## 读者与社会反馈

一种科学有效、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维权模式，赞！

——今日头条读者阳台小花农

我觉得璇芷提供了一条解决社会矛盾的思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投身于改造社会造福人民的事业中来，推动社会健康发展，人民健康生活。

——B 站读者总结经验砥砺前行

肃然起敬，她做事思路的变化让我有一些领悟，也非常感谢像她一样的人。正是因为这些可爱的人，让社会变得更好。

——B 站读者晒晒太阳补钙

她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我们！唉，惭愧！

——B 站读者拼了命赌一次

支持下，环保不是绝对的，是一种可持续发展。

——今日头条读者再见波波老师

# 汪剑超： 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 垃圾分类

文 / 李何 编辑 / 谢雯雯 图 / 除另作说明，由奥北环保提供

“

与五年前最初投身垃圾处理行业时不同的是，2017 年的汪剑超已经完全理解了行业生态：分类仍然要做，但要用最低的成本去做，奥北要做的是在绿色地球的经验基础上，摸索模式的进一步迭代升级。

不管你对垃圾分类是什么看法，前有 19 年率先出发的上海，现有北京，中央政策既定的全国 46 城都将加速步入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时代。上海志愿者阿姨一句广为流传的“依是什么垃圾”是否将成为未来各大城市居民的共同遭遇？个人垃圾分类行为，在社会舆论热潮退去后又是否还会持续？

过去十年，“垃圾围城”的严峻现实和应运而生的垃圾分类政策，催促一批又一批玩家入场，探索着互联网+垃圾分类的可持续路径，汪剑超便是其中的一位。在许多玩家已黯然退场的现状下，进入垃圾分类行业八年的他已“放弃讨好用户”，却仍想要“站着把钱赚了”。他是如何想，又是如何实践的？

中国的垃圾分类史，比我们大多数人以为的要长。

即使不从 1957 年北京日报那篇头版文章《垃圾要分类收集》和少数试点算起，当代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垃圾分类实践也至少开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从城市拾荒大军“收废品”的吆喝声，到这个春天解封的北京、武汉和更多城市，都将先后迎来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这一“大事”，正视垃圾问题，为垃圾寻找“出路”的尝试，已经迈进它的第五个十年。

可即使如此，垃圾问题仍然是问题，中国城市仍在以惊人的速度制造和堆积垃圾，过去几十年，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而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不了了之。

问题出在哪里？面对垃圾，我们究竟有没有除蹬着三轮车的收废品大爷、与看守垃圾桶的居委会阿姨之外的“现代”解决方案？



汪剑超

“当下的垃圾分类行业，正在放水排水一起开。”2019 年 10 月底，“奥北环保”创始人汪剑超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其时上海一度轰轰烈烈的垃圾分类话题已逐渐淡出了舆论视野，垃圾分类，再一次有如命运轮回一般，进入了它的关注低谷时段。

“一方面，是各地政府力推垃圾分类，投入了大量经费和人力物力……另一方面，却是因为解决方案不科学，这些投入无法沉淀下来，白白流走了。”回顾垃圾分类各地经验，汪剑超这样总结，“当真是围城，城里的想出不出来，城外的想进不去。”

## 围城

家长将积攒的纸板、矿泉水瓶等“破烂”卖给拾荒者，后者持一把饱经风霜的秤杆称重后，再从口袋抽出一沓毛票返钱，这样的场景，已经成为中国城市整整一代人不可磨灭的家庭记忆。

这些拾荒者也成为中国垃圾行业最初的从业者，尽管在当时他们并无这样的职业自觉：那些被扔掉的东西里，有一部分仍能卖出价钱，虽然其间利润微薄，但他们的生活成本也同样微薄，不少人靠着收“废品”在城市站住脚跟。

在行业发展的最初二十年，这种朴素的盈利逻辑一直主导着中国垃圾行业。

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模式并未逐步走向成熟，而是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一方面，随着城市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正变得越来越“肥”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这些原有的城市边缘人口正在越来越多地被新兴行业吸纳，要找到往日拾荒所需要的堆放场地，在近年快速发展的城市中也越来越难。



▶ 奥北环保在北京双井的投放点位



▶ 双井投放点外的社区公共文化空间

2010年，一位名叫王久良的摄影师将北京遭遇的“垃圾围城”之痛，拍摄成了一部纪录片《垃圾围城》。通过对城郊几百座垃圾场的走访与调查，王久良用真实影像呈现了垃圾包围北京的严重态势，触目惊心的画面背后，则是长久以来为人忽略的现实：每一座中国城市，都在不同程度面临垃圾围城的挑战。围绕填埋场、焚烧厂等垃圾处理设施产生的“邻避效应”事件，也牵动着居民和城市治理者的神经。

中国垃圾到底应该怎么办？镜头难有答案，但画面触动了屏幕外的千千万万人，其中也包括当时人在北京的西安青年汪剑超。

## 蓝海

那一年，汪剑超的身份是微软中国的研发工程师。对于一个一路名校计算机系毕业的年轻人，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职业选择。

由于工作关系，汪剑超不断在中美两国之间往返，微软总部餐厅巨细靡遗的餐后垃圾分类环节，比其他文化差异更早地让他感觉到了冲击：**对照旧金山与北京之间越来越模糊的生活水平差异，汪剑超越来越确定中国垃圾产业正亟需一次彻底的迭代升级。**

一年多以后，借着成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绿色地球”抛来的橄榄枝，汪剑超决定离开熟悉的IT行业。

在当时，移动互联网给普通人生活带来的变化还完全没有渗透到垃圾处理产业当中，汪剑超不是唯一一个意识到这其中潜藏巨大机遇的人。2010年3月，杭州推出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处理体系，尝试使用社区分类垃圾桶推行垃圾减量，作为中国互联网少数中心城市之一，杭州此举在之后的几年里带动了一批互联网+垃圾回收的创业风潮。

与其他行业的“互联网+”思路类似，进入分类回收行业的互联网企业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互联网带来的大数据和更便捷的to C可能性，行业旧有的单价低、利润薄等特质被认为可以通过足够吞吐量来弥补，客观存在的严峻问题以及其背后的庞大需求则成为市场前景的代名词。

当然，同样不可忽略的还有若隐若现的政策风口——从2010年的杭州开始，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政府对于解决垃圾问题不断提高的重视程度。

2013-2016年，一批新生互联网回收企业相继注册成立，开始在这片想象中的“蓝海”试水。2016年9月，《“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开始公开征集意见，据新京报报道，2016-

2019的三年多时间里，仅杭州就有几十家企业涉足互联网回收。

而在西南经济中心成都，汪剑超接手的“绿色地球”分类回收项目同样始于政府资金推动和移动互联网模式的结合，凭借高度信息化的回收方案，绿色地球从众多垃圾分类方案中脱颖而出，赢得了住建部的赞誉，也赢得了包括锦江区和成都市城管委在内的生活垃圾分类服务项目订单。到2016年底，绿色地球已成功服务成都市全城560多个小区、20多万用户，回收垃圾超过1万吨。

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对于包括汪剑超在内的互联网人来说，分类回收这片“蓝海”，永远比想象中更深。

## 试错

从APP预约上门回收，到智能回收箱、回收桶的设置，互联网服务改变了垃圾回收业的用户体验，但设想中的大数据并未带来大规模利润。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开始认知行业现实：这一行客单价极低而获客成

本居高不下，垃圾回收行业微薄的利润空间，并不会因为如今面对的是互联网人而发生什么改变，基本居高不下，垃圾回收行业微薄的利润空间，并不会因为如今面对的是互联网人而发生什么改变，甚至还在被突然爆发的业内竞争进一步摊薄，而在当时，政策利好的落地速度远低于这些创业者的预期。

2017年开始，此前一拥而上的互联网回收企业逐步“退烧”，许多投放到试点小区的智能回收设备没能赚回成本便遭闲置，居民参与热情越来越低，而无论是智能设备生产，还是后期运营和维护，乃至意在提高普通人分类意识的线下宣讲活动（汪剑超称之为“地推”），都意味着可观的前期投入。

政府采购资金成了大部分从业者眼中的香饽饽：如果不依靠政府财政的投入，少则数十万，多则近千万的运营以及设备成本根本无法解决，即使在业务上线以后，企业盈利也唯有在接到政府订单以后——而不是依靠垃圾回收产业——才有可能。

**互联网+垃圾回收行业因此越来越像是政府的乙方，用创投圈流行的话来说，“讲故事”在很多时候已经超越业务本身，成了企业的工作重心。**



▶ 被搬出回收房等待装运的满袋可回收垃圾，其中不少织物、泡沫板 / 世界说



► 成都广汉稚城三幼，孩子们在搬运回收袋

尽管自家回收效果尚算令人满意，但汪剑超和几位同事仍在几乎同一时间察觉了同样的问题，“到后来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体系你要再按照这样的方式做下去的话，一定是（规模）越大，窟窿就越大。”汪剑超回忆。

绿色地球是全国第一批尝试“用户制”垃圾分类的企业。依靠最初获得的政府资金，公司在获得运营权的小区安装回收箱并派专人定时回收。由于工作量大，整套工作主要依靠兼职员工帮忙完成，以每位兼职员工一天补贴一百元左右计算，近 600 个小区每周的人力成本就达到 6 万元。为保证效果安排的每个周末的现场宣讲，则意味着公司帐上更大的亏空。

在如此之高的开销面前，政府“输血”成了企业唯一的生命线，但没有人能保证地方政府愿意永远为这项业务买单，汪剑超担忧：“你不知道哪一天忽

然政府不给你钱了，或者说忽然出来一个比你跟政府关系更好的，就把你的拿走了。”

2017-2018 年，两家业内曾领一时风骚的头部企业相继宣布进入破产清算，再度印证创投圈内“凉凉”的评论：“互联网掘金垃圾分类，最多算是这场自上而下的生活革命的插曲。”

但身在风浪中的汪剑超给出了另一个回答：如果模式不可持续，那就趁早摆脱它。

“套路玩不下去的时候，最终其实还是回到商业本质。”回顾当初的选择，汪剑超总结。在这个向来务实的年轻人眼中，所谓“商业本质”是一个最朴素的追问：“你有没有解决问题，有没有提高效率，有没有让世界变更美好？”

输血不会持续太久，他想要的是企业自己“造血”。

## 生存

2017 年初，汪剑超离开了已经颇具规模的绿色地球。与自己未来的合伙人杨勇印共同创办了新公司“奥北环保”，新的办公地点选在成都高新区一个众创空间里，主营业务依然是垃圾分类。

与五年前最初投身垃圾处理行业时不同的是，2017 年的汪剑超已经完全理解了行业生态：分类仍然要做，但要用最低的成本去做，奥北要做的是在绿色地球的经验基础上，摸索模式的进一步迭代升级。

面对着利润微薄，收购价下个世纪也不可能上涨的这些“废品”，公司活下去的唯一方式就是将成本控制在收入额以内。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商业法则，在此之前却少有人坦荡面对——几年实践下来，传统上“三轮车+回收站”的原始模式正在逐渐证明其商业合理性，这一认知多少让此前抱有改革行业面貌愿望的年轻人感到尴尬。

但汪剑超不信这个邪。重新上路的奥北环保，第一个目标就是把运营做轻。“我们没法再承担很多人去小区现场收了，”他回忆，起初奥北并没有非常清晰的模式构想，“我们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其实我们不需要很多人去做地推，我们可以用互联网的方式来做这个事。”

互联网思维，远非开发一个小程序那么简单。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探索以后，汪剑超逐渐确定了以奥北回收袋为核心的无人化管理新模式：使用带二维码的大型回收袋，分类工作由用户自行在家完成，并堆放到指定的回收站内，对用户的奖励和返现则在工作人员清运工作结束以后，通过小程序线上实现。

这样的操作模式下，两三个人即可覆盖相当大数量的用户——绝大多数站点的清运工作频率仅为一周一次，回收站的运营和回收袋的发放则通过智能设备自动完成，必须有工作人员在现场的场景大大减少。

而一个回收点位的设备费用为近五千元，包含设备

本身和终身维护费用——这大约是此前垃圾桶模式的六分之一或更少。

比起此前流行的智能分类垃圾桶，奥北的回收袋模式不仅压低了运营成本，也成功控制了公司规模。现在，即使是奥北环保的成都总部办公室内，员工总数也仅有 24 人，他们运维着成都 498 个垃圾投放点，包括 329 个机构点位和 169 个自主投放点位。累计发展个人认证用户 3 万余名，机构用户 403 名。

在汪剑超寄予厚望的北京分部，一年多以来员工只有 3 名——身在新开发市场，他们覆盖了奥北在北京从市场沟通、运营推广、站点铺设、垃圾清运、回收物进一步分拣直到送至回收厂的所有工作内容，而这三位员工甚至还坚持着每周双休和通常不加班。

“生命力是从低成本来的。”从绿色地球时代就跟着汪剑超的一位老员工总结，“我们的成本已经压缩到最低了，现在比纸还薄。”

解决了自己的生存危机以后，汪剑超终于能够直面几年前推动他做出改行决定的那个初始问题：中国城市的这些生活垃圾，究竟应该怎么办？

## 雪球

“你要做正确的事，”汪剑超强调，“做你认定的正确的事，而不是容易的事。”

垃圾分类当然要继续做下去——这是大势所趋，也是易于理解的现实，在仍然极为有限的垃圾处理能力下，全面垃圾分类、尽可能推动垃圾减量，是当前我们能在垃圾“围城”中找到的唯一一条出路。

问题在于究竟怎样将它贯彻下去：政府，居民，物业，企业，社会单位和位于后端的垃圾处理产业链，监督者、志愿者、从业者与普通人，责任与权利如何划分，变革又应当从哪里发起？

这仍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汪剑超和同事们正在努力寻找答案。

在运营角度，奥北确定的第一件“正确的事”是放弃讨好用户——“不是说只有让用户方便了他才能够去做，不应该去求他们……我们只是提供方法，让大家能真的行动起来。”

拒绝成为分类行动的“主角”，奥北的回收袋需要用户首先花费 10 元认购，之后在家完成分类并确保进入回收袋的物品干净干燥无异味，才能将回收袋投递至指定地点。即使完成了所有这一切，用户依然可能因为分类错误而遭遇小小“惩罚”，同时也会接收环境贡献、回收量排名等正向激励。

如此设计的背后，是奥北“正向循环”理念：将分类责任“归还”给垃圾直接生产者，并不断强化其分类责任意识与技能。在幼儿园、小学等单位 and 机构，在居民社区，奥北都在实践着这一理念。

这也与后来正式出台的政策形成了呼应：在 2019 年的上海和 2020 年的北京新《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都首次将个人生活垃圾分类由倡导性上升为义务性

▶ 一位用户在奥北北京地区回收点 / 世界说



条款，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被规定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同时引入了惩罚机制。

垃圾分类回收要成功，绝不能是某一方的大包大揽，而更应该是一个“共创”的过程。政府、社区、居民、解决方案提供方都得付出，都应收获。

在企业发展角度，奥北也在积极拓宽“可回收物”的边界——尽管在能够主动迈向新技术研发之前，诸多互联网回收企业还只能一同挤在可回收物这条窄道上，但汪剑超从一开始就定下了与众不同的调子：有些垃圾从回收角度几乎无利润可言，奥北依然向它们敞开大门，比如泡沫板、织物、玻璃瓶。

有些东西回收价值虽低，焚烧时环境危害却大，汪剑超希望阻止它们流向焚烧厂。

对于目前暂时力所不能及的有害、厨余和其他垃圾，汪剑超也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今年，奥北环保已经在北京和成都打通了后端专业处理有害垃圾的渠道，“我们可以作为中间方与企业对接，然后把分散的前端用户们产生的有害垃圾，定向交给这些企业，同时建立起端到端的追溯和统计。”

奥北的厨余和其他垃圾分类收集方案也将在今年落地。尝试仍很初步，汪剑超不急于求成。“支持有害垃圾回收处理的市场机制还不成形”，也就是说，还有一系列有关“钱”的问题等待厘清，“需要边做边摸索”。

回顾创业八年，他喜欢将推动变化的过程比作滚雪球“你要把一个雪球滚出来，从山底往上推，就会越推越累，需求越大，你就越费劲。”但是，“如果是从山顶上往下滚，它就越滚越快，而且越滚越大。”

“你要做的是找到那样的一个山顶，找到路径把它滚下去。”

## 读者与社会反馈

现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商业仍在满足、甚至利用人性的弱点，以此为利润来源。垃圾回收看来是一项毫无光彩而且挑战人性弱点的商业，但它极有意义。如何在互联网商业里延续传统商业的基本逻辑 - 实现成本和利润的平衡，同时又发挥互联网本身便捷和高效的特性？新一代创业者的努力正在变得越来越道德、友好、良善。

——今日头条读者二次发育的英语

@汪剑超，你分析的很透彻，思考的结果也对，以前开车违章很多，现在为何变少了？路口有警察驾驶员很自觉，说明有畏惧感。行为的改变不仅仅是“红绿灯+摄像头+驾照”的体系完成，而是严厉的考核扣分机制。垃圾分类势必要经过这个过程才能从根本上以科技改变生活，智能改变习惯。

——微信读者长江十号

垃圾回收应商业化运营。比如在欧盟中，喝完的各种饮料瓶，送回超市的分类投放机后，机器会付你相应的欧元。等于是返还饮料瓶的押金。垃圾制造者有利，中间的汇聚商人有利，最后的处理企业有利，这样才能长久。

——今日头条读者永远的一兵

解决垃圾最根本的方法是改变饮食习惯，中国的饮食习惯天然就是制造大量垃圾。你再看看外卖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就算正确分类也没用，你没法处理。

——今日头条读者用户 639527786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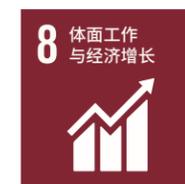
没你说的那么简单，用我在北京几十年的经历告诉你两个案例，二十年前我住的那个小区，最靠门口的车位被一个家族式垃圾从业者霸占，带有黑社会性质，这家有三个身高体壮的儿子，同时很有套路，经常看见他请物业和街道人员吃饭，估计里面都有利益瓜葛吧，反正外面收垃圾的没人敢进来，进来就打，垄断了这条街，我曾经在网上叫人来收废旧电器，但人家不敢过来，被打过，要我自己送到另一条街上；我现在这个小区也一样，收垃圾的直接进院了，还占了两个车位，不过这家没那么暴力，反正小区里只有他一家，别的家保安不让入内，所以啊，垃圾回收 APP 化，我不看好，你要一家一家去打点关系，成本又高又累。

——今日头条读者豆腐老爹

# 03 可持续社区

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镇，社区是人们日常生活工作、聚集交往的重要场所，为人们提供粮食、能源、住房、运输等基本需求及更多服务，并为人们创造机会。

然而，业已拥挤不堪、包容性不足的城市，和劳动力流失、日益破败的乡村社区，都愈发难以为人们的发展提供良性空间。建设包容、安全、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区，将帮助人们脱离贫困与饥饿，保障人们有序、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并为人们创造更多的空间与机会进行联结与合作，实现更远的目标。



# 林炉生：

## 离京返乡六年，他在做「回乡见闻」中不敢想象的事

文 / 李何 编辑 / 谢雯雯 图 / 除另作说明，由受访者提供

“

去年，林炉生曾在介绍内龙村发展情况的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需要的是内力、外力与政府力的协同合一，而内龙村，无疑正是村庄内生力量得到充分发掘的典型例子。

编者按：乡村发展，能否等同于乡村经济发展？近年来，这个问题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关注。城市化大势所趋的背后，乡村正在流失的远远不仅是劳动力与人口数量，每一年的春节返乡时刻，都是种种“回乡见闻”的刷屏时刻。乡村该往何处去？一转身离开的家乡，是否注定成为我们回不去的远方？

有人偏不信邪。这是一个另类的返乡故事。2013年，林炉生决定离开北京，离开高校，回到自己的家乡——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内龙村。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也改变了家乡的命运。

“人心一旦有了改变，就不会再回去了。”内龙村副书记林志福说。

“我们想要的也不多，人心有了改变，就很好了。”内龙村村民，志愿者骨干林茶梅说。

### 被改变的村庄

今天，内龙村是青山环抱中一个典型的闽南古村落，青枣、杨桃和蜜柚遍村栽种，紫荆花与三角梅沿路盛开，来自山上的溪水穿过村庄，通过引水渠流经村里最大的建筑、老式圆土楼“陶淑楼”门前，又向着下游山谷奔去。只有百余户的小村鸡犬相闻，夜不闭户，天气好的时候，老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宗祠前的戏台旁晒太阳，总有好奇的孩子会笑着与外来的陌生面孔打招呼——他们每一个都很会说“谢谢”。

但仅仅四年前，内龙村还是城市化大潮背后一个凋敝暗淡的影子。土楼年久失修，渐渐坍塌，村中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赚了钱的那些回来带走了全家人，剩下的则是无法离开老人、孩子和操持全部农活家务的妇女……

变化起于2015年底的一天，陌生汽车在村里进进出出，带来了来自远方的建筑师，来帮忙的大学生，与一批批建筑材料。他们围着废弃的土楼打转，并不在意近旁指指点点的村民。

从修缮土楼坍塌的外墙开始，这些陌生人修整土楼、清理河渠、拓宽道路、打扫村庄内外……

围观他们，很快超过赌博娱乐，成了内龙村村民的主要消遣。

工程进行了近半年，学生们走了，建筑师走了，留下修缮好的土楼。始建于两个多世纪之前的陶淑楼居于村庄正中央，与中轴线另一端的宗祠和戏台彼此呼应，仿佛一只凝视着村庄的古老眼睛。



▶ 林炉生



▶ 今日内龙村

但真正的变化，或许是从这一刻才刚刚开始。

几个此前并不起眼的村中妇女自愿组成了一个义工小组，开始挨家挨户地收卫生费，起初收上来的钱不够雇人清扫，她们就自己动手，打扫村中一塌糊涂的道路与河渠。

她们是村中的媳妇，女儿，也是母亲——大学生们重修土楼的那几个月，她们都曾抱着孩子远远地观望过。

空置的原村小学教室里，开办了停学七年的幼儿班。在此之前，内龙村的孩子们要送到几公里外的外龙村才能上幼儿园，不少孩子的童年因此只能被关在家里看电视——他们的父母往往不在身边，“早上八点钟送去，十点就又要接回来，爷爷奶奶哪里做得到。”

曾经无人问津的土楼，也办起了“陶淑书院”与小小图书馆，一批又一批的外来志愿者成了这里的老师，带来村民们闻所未闻的种种学问——他们来自厦门、台湾、上海、甚至美国、英国和非洲，许多人不会讲闽南话，还有些连中文也听不懂，但不同的语言没有妨碍内龙村的孩子们在他们离开时哭红了眼睛。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个曾经走出家乡，又选择回到家乡的人，他的名字叫林炉生。

## 带来改变的人

1982年，林炉生出生在陶淑楼一间向阳的房间里，也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内龙村整个村庄几乎都姓林，土楼内外，家家沾亲带故。幼年的炉生在土楼舅舅家的屋子里长到九岁，才跟着父母搬到土楼外的新居。

十一年后，这个土楼里走出来的孩子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

在同辈的弟妹眼中，比起成绩，炉生给他们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他的决心与行动力——从少年时起，身材并不高大的炉生就是伙伴群中的孩子王，而学习成绩不过是他诸多事迹中并不特殊的一桩，“就是决定要做什么，就很快做成了。”

或许是同样的性格特质在发挥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一条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极不寻常的道路：在北京师范大学后勤物业部的“正常”工作只

坚持了不到一年，他就与另外几个同伴一起，拿着不多的积蓄全职做了公益。

十四年后回顾起当初的决定，林炉生的回答平淡而隐含傲气，一如他这个人给旁观者的印象：“就是想要做点事，人活着，应该要有内心的追求，”他顿了顿，“功名利禄，世俗成就，这些顺其自然就好。”

最初他关注到的是北京城内的打工者子女，与同伴共同创立的机构“农民之子”，发展几年后也很快赢得了荣誉与认可，但对林炉生来说，这却是一次让他开始察觉到自己能力限度的尝试：孩子们的家长随时准备着为了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而离开，他们对于所生活的打工社区没有认同感，社区工作做得再好，也难以影响家长的决定。

林炉生发现自己很难消化和排解这种无力感。“（方向选择）可能还是和个人的经历有关，我不是适合做这件事的人。”

另一次尝试选择了北京郊区密云县的一处山村，林

炉生在这里创办了“燕山学堂”，希望能够为打工者子女群体提供自然教育。山村的宁静生活让他眷恋，却也似乎提醒着他，还不能过早地享受一己的宁静。

2013年，已过而立之年的林炉生再一次重新思考了自己的方向，并萌生了回乡的念头。来自家乡福建的公益组织“正荣公益基金会”的邀请只是契机之一，更重要的或许是某种来自家乡的召唤：离家在外的十几年，他一直想着有朝一日能为家乡做点事。

“在外做公益这么多年，可自己家乡却是一片破败……”林炉生摇摇头，这是他无法拒绝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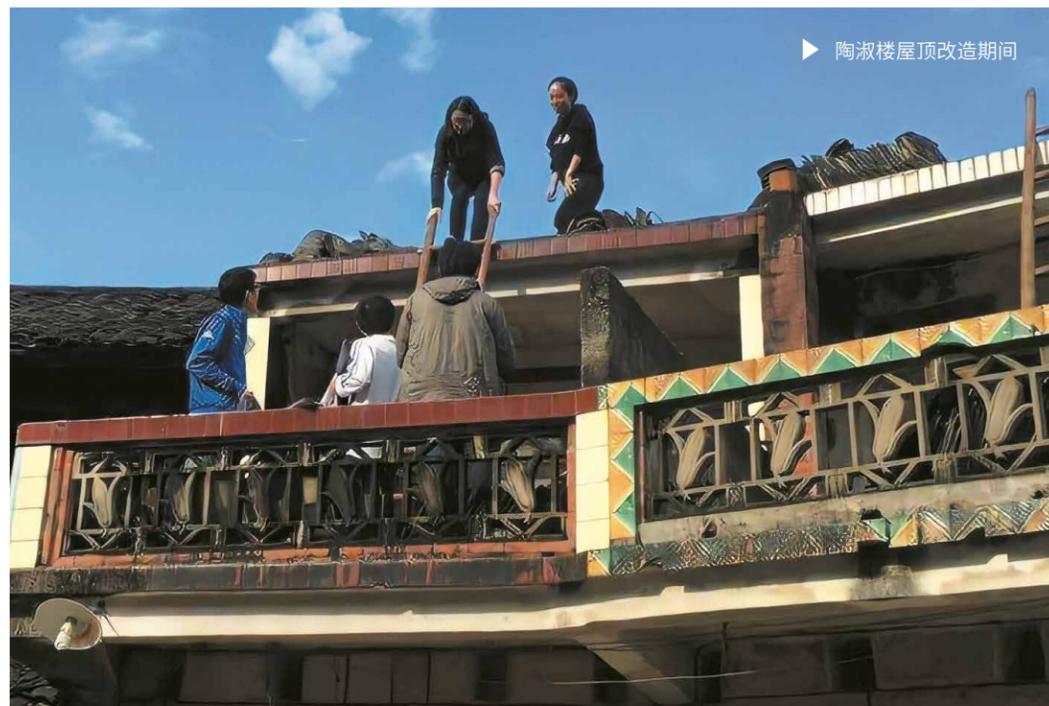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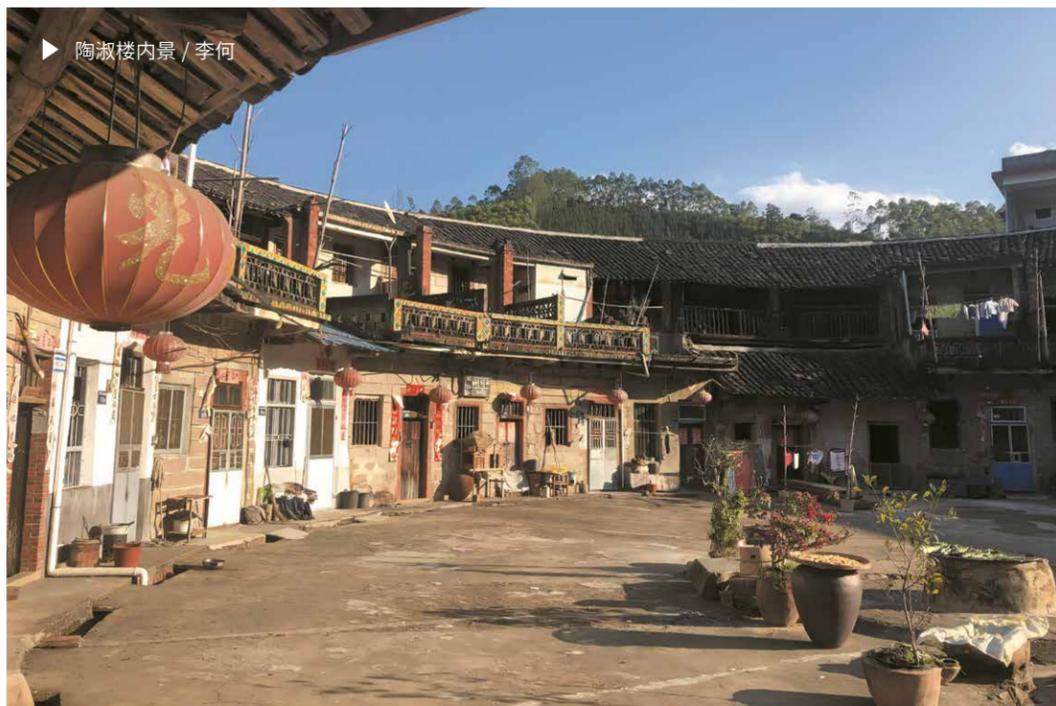
从求学之路到公益探索，数年间荡给林炉生带来的是村里老乡们无法想象的眼界与资源，而当他决定回到家乡，自己儿时的旧居陶淑楼就成了他返乡的切入点。

林炉生咨询了几个专业朋友，得出了“改造土楼完全可能”的结论，“好厝边”项目由此而生。为了陶淑楼，清华大学的建筑师来了，上海雷励中国的青少年志愿者来了，目睹他们不计回报的付出，村民对改造工程从最初的不理解到态度逐渐正面，进行到后来，几位村中的老人组成了一个村民志愿小组，成为支持陶淑楼修缮的最初本地力量。

但在林炉生的设想里，“好厝边”并非一个建筑修复项目，而是一个社区营造项目——在闽南语里，“厝”的意思是家，“厝边”既是邻居，也是社区。

2016年初夏，修缮后的陶淑楼开办了第一期夏令营活动，请到了澳门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的师生来做义工老师。许多村中的孩子从未接触过外人，起初只敢在妈妈怀里抱着听课，几天后也与义工老师们玩到了一处。

等到这一期义教活动圆满结束，林炉生在村中贴出了招募志愿者的通知。





► 2016 年第一期夏令营义教活动，义工老师与内龙村的孩子们在一起

几个本村妇女结伴来了，这是娇凤、茶梅与志燕。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志愿者’，我表弟在外面打工，我就打电话问他，哎志愿者是干嘛的？”回忆往事，茶梅圆圆的脸上有笑意，“他说，就是白干活，没工资拿的。”

“我们一想，好嘛，那就志愿者嘛，反正能帮村里一点。”五名后来被称为“五朵金花”的妇女志愿者就此走到了一起。

土楼修好了，本地志愿者团队也有了，清扫运动推动了起来，夏令营、图书馆与幼儿班也纷纷启动，看上去万事俱备。

但如果事情真的这么简单，那就好了。

## 乡村社区，兴之以“术”

“我那个时候很讨厌他，我就哭，说你把我拖下水了，然后你又不管我们了。”

说起两年前的那场危机，娇凤摇摇头，有些不好意思。那是“陶淑幼儿班”办起的第二年，由于孩子少，家长们交来的学费不足以解决经费问题，第一个学期，是林炉生联系来的公益项目为幼儿班的老师支付了工资——每月 1500 元，可到了第二个学期开始时，林炉生告诉她们，这条路行不通。

“公益捐款不可能持续。”林炉生说，“第一次我能开口，第二次第三次，我不能再去跟人家说，我们又没有钱了你再捐。”

同样的困境也出现在清扫运动里，没有了最初来自众筹和乐捐的启动资金，每户 10 元 / 月的卫生费要雇人打扫几乎没有可能，几个志愿者只能再次自己

出去收垃圾。脏和累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最大的障碍是没有人理解。

“他们就说，你们又不是村干部，村干部都不管，你们管什么闲事。”娇凤摇着头笑，“我公公婆婆也说，家里都不管，出去管那些……”

几个志愿者为此去找林炉生商量，但收到的回答却是：“我也管不了，你们看着办吧，如果资金的问题解决不了，那就算了。”

志愿者们接受不了这个答案。

“怎么能放弃呢，我们忙了那么久，很心疼的，而且是我们敲门跟人家说要搞，现在又不搞了，我的面子往哪里放？”

压力太大，几个志愿者边哭边商量，依然没办法决心放弃，“如果实在做不下去了，那我们几个就把它扛起来”。

五个人召集家长开会，说服家长们把幼儿班的学费从 500 涨到 700 元，又把两位老师的工资下调到 1400 元。

还有一块资金缺口怎么办？从前被陌生人看两眼都想跑掉的娇凤做出了自己也没想到的举动，她跑去村委会一坐就是一整天，又拦着乡镇下来的领导不让走，告诉村干部“你不给我解决，明天我还要来”。

被磨得没了办法，村干部终于同意为幼儿班提供一笔资金，又承诺会资助清扫运动，但志愿者们担心这样的口头承诺不可靠，为了防止拖欠工资，她们分担了后三个月的卫生清扫工作。“就是想着，三个月后如果有工资，那最好，如果没有，反正是我们几个嘛，就不要了。”茶梅说。

“无怨无悔。”娇凤补充。

这样坚持了三个月后，林炉生才告诉她们，这只是他有意为之的一场考验。“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了，还是会帮的嘛，不可能看着它死掉嘛。”林炉生说。那部分欠发的工资也由他补上了。

“虽然很气他，但我也觉得我成长了。”娇凤说，从小在村里长大，对内龙村的感情是推动她做这一切的原动力，但在这之前，她从未想过自己可以如此勇敢。



► 妇女志愿者在上游村庄打扫卫生 / 好厝边公众号



► “五朵金花” / 好厝边公众号



► 2018年，陶淑楼门前，义工老师和内龙村的孩子们在一起



► 2017年初，陶淑书院投入运行



► 娇凤的模仿加工“车间”/李何

“对村庄有感情的。有人问我，要是挣到了钱要不要搬到县城里去，我不想去，那边都是陌生的，我说我要是挣到了钱，我就在村子里盖个大别墅。”娇凤说着，大笑起来，“但是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会是现在这样，我以为志愿者就是出力，很简单的，就只管出力就好了，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去做，没有想到（最后都要我们管）。”

今天的娇凤是村里所有志愿工作的“一把手”，负责接待所有来往访客、组织陶淑幼儿班与国学班、领导村中的腰鼓队和广场舞，还在村中开办了“魔方加工厂”，帮助村里的老人和妇女就业。很难想象，每天忙碌于这些工作的她甚至并不识字，最初也完全不会讲普通话。

“现在微信用得多了，简单的可以（读懂），比较难的不太行。”娇凤说。她的微信通讯录里躺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一串串名字。

而与她朝夕相处的乡亲如今真成了她的亲人，去年，她的公公婆婆相继病倒，娇凤忙于照顾老人，正赶上地里木薯成熟。不得已，她向亲熟的邻居求助，

没想到全村男女老幼都赶了过去，帮她收好木薯，搬回家里，削皮，晾干……

“我心里都是甜的。”提到这件事，娇凤说，“村庄的变化真的很大。”

娇凤没有意识到，今天的她同样也在复制林炉生曾经使用过的策略——内龙村的卫生已经不是问题，2019年春天，娇凤和几个志愿者骨干带着清扫工具去了邻村。

“刚开始都不理解的，有人骂你为什么管闲事，有人说你们肯定收了钱。”她回忆，已经不再困扰于这样的反应，“去了几次，就开始有人拿着笤帚和你一起扫，有小孩子跑出来帮你捡垃圾，还有人塞水果什么的给你。”

“他们村的老人家问我，你们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娇凤笑眯眯地讲，“我就说，不来了！”

## 乡村社区，求之以“道”

而在林炉生眼中，所有的追求与变化，最终都应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一个改变心灵的过程。

“甘地对我影响很大，”林炉生说，他的微信头像是一张圣雄甘地白衣盘坐的照片，时常让人升起另一端是位慈蔼长者的错觉，“其中的一点是他讲求内省。除了要向外去解决社会问题，也要向内去自我探寻，去寻找真理。生命的意义在于寻找和体验真理……甘地做了那些事，他其实并不是对政治有多么大的兴趣，他只是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不能对其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

同样的描述或许也适用于林炉生自己，而他的自我探寻路径又深刻影响了内龙村。

比起常规的乡村振兴项目，“好厝边”显得更保守，也更重视精神层面——它希望能够让孤独的老人有陪伴，学龄的孩子有教导，乃至重建曾在城市化大潮中被严重冲击和损毁的乡土人情社区，而提振

乡村经济数据、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更常见的目标，则退到了相对靠后的位置。

身在福建，又守着一栋始建于清代的土楼，林炉生并不希望家乡像一些附近村庄一样，走依靠政府拨款发展特色产业，或发掘人文资源开展旅游业的旧路。“有些事情不是有钱就可以，问题不是拿到钱，而是怎么用好。”

他举了村庄清扫运动的例子，“你每个月花一笔钱，他们会觉得，哦那这个就该是你去扫，就该是你去做。茶梅她们最开始就被以为是拿了工资，因为没有人雇你的话你为什么来做这个。”林炉生说，“就有人往地上扔个什么，然后喊她们，‘哎这里来扫一下’。”

这不是林炉生想要的东西。

同样警示他的还有来自全世界的无数例子：公益组

织出资推动的村庄发展项目多半会在资金中断以后随之停摆；许多村民挣到钱以后的第一反应是举家搬迁；市场化大潮中富裕起来的村庄，村民间因经济利益冲突而爆发的矛盾也随处可见，更何况依靠外部资金注入和一时的市场新鲜感，对于大多数村庄的发展而言始终不是长久之计。

林炉生想要的是来自内部的改变。从“好厝边”启动开始，林炉生始终在尝试以身作则地带动更多人，他相信总会有人被他人的付出感动，进而改变自己。

虽然看似理想主义，但这条不同寻常的自我探寻之路的确已经改变了内龙村：短短四年，维护村庄环境已经成为村民共识，加入志愿者工作的村民越来越多。两位从志愿者队伍中走出来的村民，在今年进入了村两委班子，原本只读到初中就被迫辍学的茶梅，如今已经自考到大专……

去年，林炉生曾在介绍内龙村发展情况的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需要的是内力、外力与政府力的协同合一，而内龙村，无疑正是村庄内生力量得到充分发掘的典型例子。

## 尾声

仍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内龙村的发展已进入深水区，更多的变化需要的是政策、机制、更广义上的社会氛围等等多方面的突破，体现在实际运转中，就是各方面需要的资源依然难以取得。

娇凤还在为钱发愁，村两委曾经承诺的扶植资金少而又少，还经常遭遇“折扣”。“这几年也往里面贴补了不少，没办法嘛，所以要想办法挣一点钱。”她的魔方加工工作负责把一百多个零件手工组装成成品魔方，做一个能赚到几毛钱。

而林炉生关注的，更多是这其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身在政府体制外的“返乡人才”难有空间与本地基层干部实现密切协作，与此同时，政府下拨的扶植资金有时又缺乏必要的弹性。

“政府理解的群众需求，和老百姓的真实需求有时候不太一样。”林炉生说，“但老百姓不理解这些，他们不知道这些钱是指定了用途的，就觉得为什么政府部门有钱乱花。”许多基层矛盾由此而生。

所有上级政府资源集中在村两委的现状，则导致一方面本地村民参与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外来助力也无从着手：“如果村两委不给力，那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遇到这个问题的人应该不止我一个。”

2019年，从志愿者队伍里走出来的村民林志福在竞选中当选了内龙村党支部副书记，这或许是新的改变的开始，但路的终点有什么仍未可知。

林炉生直言，他还难以设想内龙村几年后的样子，或许原地踏步，也或许焕然一新。

但可以确定的是，下一个春天将有更多的村庄迎来它们的变化契机，土楼修缮正在走向其他村镇，陶淑书院的运作模式将落地隔壁的下洞村，娇凤和她的伙伴们也盘算着更远处的乡村清扫运动……

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说过：“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尽管不能概括为通常意义上的“教育”，但或许，这也正是内龙村，以及其他邻近村镇上，那些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

## 记者手记

在内龙村的经验是让人切身意识到“特权”的时刻，意识到让他们成为“他们”而我成为此刻的执笔者东西，并不是所谓的天赋和才能，而仅仅是出生在完全不同的条件和环境之下。

有许多散落的瞬间我在离开内龙村以后仍会时时想起，在内龙村我目睹娇凤为了迁就我而熟练地在闽南语和普通话之间切换，而我只能凭借零星语词和神情动作猜测其他人之间的对话内容。事后知道，娇凤没上过学，一辈子没有走出过云霄县，她的普通话是为了“好厝边”带来的志愿者才学会的。

有一次闲谈里茶梅告诉我，她曾经一天做完过一千多个魔方组装，同样的活计我也尝试过，两个半小时成品只有 22 个。茶梅比我小两岁，在初二那年辍了学，因为“好厝边”，她在最近几年自考修完了大专，而她的大女儿已经 11 岁。

对于生活在完全不同世界里的人，沟通与理解往往是奢侈品，但内龙村向我展示了作为“人”的本来面貌与无限可能，也让我开始学着认知和面对剥离种种特权之后的自我。“好厝边”看上去是一个乡村建设项目，甚至是一个古建修复项目，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不是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带着外来资源建设家乡的故事，它是人与人的连结，剥离了其他种种，将信任交还给“人”本身。

## 读者与社会反馈

好样的小伙！

——今日头条读者多宝 71736

现在好多农村都只剩下一老一小空心化的问题，真的比较严重。

——微博读者飞羽花鱼

脚踏实地，不求功名，只想为自己的家乡做出更有意义，让父老乡亲满意的事情。他是一位值得大家尊重的有为青年。

——腾讯新闻客户端读者哄哄

# 石嫣： 下乡十一年的女博士， 和那批离开城市的年轻人

文 / 方澍晨 李何 编辑 / 谢雯雯 图 / 除另作说明，由受访者提供

“

石嫣要探索的，不仅是生态农业的产量与销路，也是“让农民成为一个令人骄傲的职业”之路。

编者按：十一年前，博士毕业离开人大后，80后青年石嫣在北京北郊农村里安了家，出身城市的她从此吃在农村、住在农村、工作在农村。她种着不施化肥、农药的有机蔬菜，经营着直接联系消费者的有机农场，过着健康而充实的“耕读”生活。

她逐渐发现，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希望回归乡野，有的厌倦了都市中的套路生活，不想继续成为“房奴”，有的想念农家乐时“有菜味”的蔬菜，还有的想要回到农村老家贡献一份力量……

我们关注石嫣和她的小伙伴们。遍布全中国，被称为“新农人”的他们赤足立于耕种的黄土地之上，奔波于农场、市集、研讨会和高校之间。他们连成一片，正在共同探索农业改革和乡村振兴之路。

“向你们专业人士请教一下，现在媒体和传播的大趋势是什么呢？”在北京北郊的“分享收获”生态农场，石嫣一边往一个手作馒头上抹有机蓝莓酱，一边问我。

传播是她最近苦恼的问题：身兼农人与卖家两种角色，她敏感地察觉到最近大家对于文后附上购买链接的方式热情已不似从前。她什么都愿意去看、去试。她迫切想知道，究竟怎么做才能让更多消费者了解这些安全、有机的好产品，了解食物生产背后农人、土地的故事，打动更多人的心。

城市出身的石嫣现在是一名吃在乡村、住在乡村的全职农人——她喜欢把自己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称为“新农人”，“新”字背后藏着她堪称耀眼的学术背景：人大博士，清华博士后，“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的得意门生。

此刻，石嫣坐在自己农场的“棚友食堂”里，摸了摸桌下来回穿梭的大白狗。我知道她一定有故事要讲——这是她经营京郊生态农场的第十一年。

## 对话土地：产量不等于农药化肥

十年前，石嫣和她的有机农业实验曾被说成是“想把中国人都饿死”。

说这话的不是网上的键盘侠，而是石嫣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一位心直口快的老教授。而当时的石嫣还只是个博士生，刚刚加入人称“温三农”的温铁军在京郊凤凰岭脚下创建的有机农业实验田“小毛驴市民菜园”。

当时，中国的有机产业在市场与学界都走到了一个较为尴尬的境地：已有的有机农场大多数在几年运营后陷入亏损，超市里的“有机”货架乏人问津。

农民无利可图，生产方式还被质疑是在放弃现代农业技术，“逆时代发展”而动：由于信奉“传统”，有机农场的产量有限，多种因素共同导致价格居高不下。以这些“有机食品”的标价，普通家庭偶尔尝个鲜或许有可能，作为日常食材却只有少数人愿意买单。



▶ 石嫣清晨在村里租的院子门前 / “分享收获农场”公众号

但石嫣不认为这些前期挫折能够证明什么，恰恰相反，她看到的是已经被推向悬崖边缘的农业生产——过去几十年里，我国高化肥、高农药维持的农业产量不但可能长期持续，还可能在最终崩溃前，首先摧毁更广泛意义上的生态系统，危害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水环境，和最终吃下食物的人类自己。

“水土污染里最大的一个来源其实是农业污染。这点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石嫣说。2010年，政府三部委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因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畜禽养殖业废弃物排放造成的污染，已成为中国面源污染的第一大污染源，远超工业源、生活源污染。



▶ 一位农民正往田中喷杀虫剂 / pxhere



▶ “分享收获”农场进门有一块“农，为天下之本”的牌子 / 农场公众号

“实际上，影响农业产量的绝对不只是农药和化肥。”把农药化肥视作解决产量问题的主要方案，是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更何况，超量化肥、农药带来的巨额污染治理成本，还没被算进纳税人的账里。

除了对产量的片面认知，造成隐患的还有不断拉长的整个食物链条——仓储、运输、加工、包装等多重流通环节，造成了大量食物浪费。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全世界的食物在到达餐桌前，就有近三分之一已被浪费。

石嫣决定用实践去证明，依靠无农药无化肥的生产方式，和更直接的市场流通，农业能够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城里居民能吃上健康、有机的食物，乡村里的农民能靠农业活下去，大自然不再被高污染农业排放破坏。

博士毕业，她创建了“分享收获”有机农场，尝试跳过普通超市等强势中间商，建立农民和消费者之间更直接的联系，使双方的信息、定价更加透明和直接。

一开始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利。地里的的问题不断出现：连续下雨，种在露天的西红柿和黄瓜很容易生病。后来租了大棚，小心翼翼控制温度和通风，但因为没有及时打开大棚的封口，曾经一中午烧死过一棚西红柿。还有合作农户面对猖獗害虫忍不住用了一次农药，石嫣只好要求把那一块地的菜全部拔掉……

农场周边的村民们目睹全过程，有些村民笑称石嫣是“傻博士”，“明明偷偷用点农药也没人知道”。

石嫣没气馁，继续一步步地摸索着土地与农作物的习性。防虫害的诀窍是保证健康的土壤和良好的管理，配合投放自然天敌与合理轮作，恢复生物多样性。保土质需要的是更多的使用有机肥和堆肥，增强土壤中微生物与小动物的“热带雨林”活性。大棚内部像实验室一样控制光照、湿度与温度——让



▶ 四位年轻的“新农人”在分享收获有机水稻基地 / 农场公众号

自然循环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处在最合适、最舒服的位置。

石嫣和伙伴们用数据与经验积累，尝试重建被化肥农药粗暴打断、取代的天然过程，在自然规律与人类行为中寻找可持续的平衡点。

土地与庄稼回报了她。“从我们自身的经验来看，不用农药化肥，在转换期，粮食作物产量比常规降低大约 10-20%。瓜果类蔬菜与非有机的产量差异不是特别大。”今天，她的农场全年自产蔬果超过了 100 种，因为不使用除草剂，田里还有荠菜、蒲公英等野菜可食用。

“（农场）土壤的有机质检测从 2013 年的 1.5%，增到去年的 4%，土更松软，土壤中的生命又出现了，一铁锹下去能挖到蚯蚓。”石嫣被太阳晒成蜜色的脸上，有多年对话土地带来的笃定与自信。

产量有保证后，找到并保住消费者成为另一大挑战。农场开办初期，石嫣坚持跑三个小时路程自己把菜送上门，为的就是能和客户见上一面，跟他们聊两句有机食物生产背后的小故事。

到今天，石嫣的有机农产品市场销路已开：农场的稳定订户已达到四位数，许多会员跟着她吃菜八年以上。每一个季度开始时进账的那笔资金，都成为下面三个月农场正常运转的基础。

“消费者用消费保障了生产者的生计，而生产者用生产保护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两者本就应该应该是互助互惠的关系。”说到这里，石嫣满脸骄傲。

## 对话农人：在农村不等于“没出息”

产量与销路，只是石嫣和她的有机农业实验的第一步，也许也是相对简单的一步。

2017 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二十出头的新员工被爸妈从农场直接带走了。在那之前，他和爸妈在北京市内的一个建筑工地打工，爸妈趁周末来顺义看过农场后，还是希望自己儿子在城里工作。

“2017 年以前，这种主动被动走的太多了。”石嫣淡淡说。就算只是在城里的工地上班，也让许多人觉得比干农业有希望。石嫣收到过好多员工的家长

反对，都是类似的话——“我当了一辈子农民了，送你出去上大学，就为了不让你当农民。”

石嫣对于那些突然的离开十分理解，她自己也曾经历过类似的踟蹰茫然。

十八岁上大学以前，石嫣与农村几乎没有直接接触。她在河北保定城里出生长大，上大学选择了隶属商学院的农业经济发展专业。当时的她，一心想着要深造，未来或是讲台，或是研究所办公室，她没有想过黄土地与蔬菜大棚。

即使在后来去到中国人民大学，多年专研农业和农村发展后，石嫣依然对自己的选择很矛盾，心里没底。

同期，她的同学们大部分去了科研院所、银行等地方。

“说白了，（那时）还是觉得作为职业，农民不如其他的。未来的发展、到底能不能走下去，不知道。”

走过将近 10 年，石嫣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自己的人生选择，都越来越自信。她自己特别喜欢在农场的“耕读”状态：白天有时巡巡地，帮忙干点农活，和同事们开会探讨如何提升客户体验，晚上回到附近家中，读书、做研究、写作。

她又讲起那些把自家孩子带走的家长，“因为大家理解的就是你呆在农村，无论干什么都是农民，都认为你在种地，因为他们不知道农村还有那么多事可干！”

石嫣要探索的，不仅是生态农业的产量与销路，也是“让农民成为一个令人骄傲的职业”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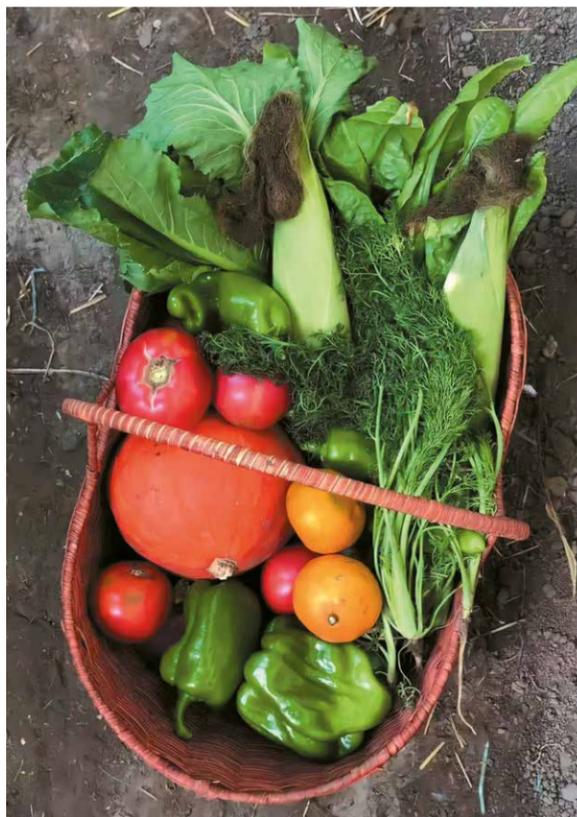
“分享收获”农场中，今年刚满 30 岁的市场部员工许印，笑出一口大白牙，热情地接待一批又一批农场的访客。今年是他从事农业的第二年，加入农场前，他在深圳做手机配件销售，脑筋活络，能说会道，善于与人沟通。

“城市套路太深”，出身贵州农村的他笑着回答离开深圳的原因，此外，在深圳的那几年，他越来越少吃一些肉类，因为“不敢”——新闻中时不时会报道类似于“打了激素的鸡”这样的新闻。

在分享收获农场，像许印这样的刚刚投身农业的年轻员工不少。他们各司其职，组成一整套需要统筹、规划与管理的项目机制：从有机生产产品推广到客户关系维护，从食物社区运营到面向孩子的土地和食物教育。

他们既是回归乡村的农业从业者，也是农场的“项目经理”。

“分享收获”农场也吸引了各地慕名而来的有机农业从业者，他们被称作“新农人”。石嫣认为，这是一群认同有机生产、生活方式，经历城市生活后，仍然愿意去到乡村，从事农业的人们。



► “新农人”培训班在分享收获农场的大棚中学习

但正如最初的石嫣一样，投身农业并不容易。“越来越多地发现很多人在走弯路。”传统知识分子心理“作祟”，石嫣想帮更多这样的年轻人。由此，石嫣开起了“新农人培训班”，每年培训五湖四海的新农人超过 200 人次，迎来短期参观学习群体几千人。

谈及这些年轻人，石嫣显得很骄傲。“乡村振兴其实最重要的是人，年轻人愿意回来，这代表很多东西。”

然而，这也是她的担忧所在。尽管石嫣和其他一批先驱者摸索出了一些农业和农人发展的新路径，这仍无法解决乡村中薄弱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服务，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城乡差距客观存在，仍显落后的乡村治理水平更凸显这些短板。

未来子女教育、个人与家里老人的医疗需求如何满足？社会不认可农民，在农村的职业发展前景如何？和这些长远忧虑比较起来，收入问题反倒没有那么重要。

向我们热情介绍农场成绩的许印，说到这里也顿了顿，尽管他也有回老家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态农场的打算，但“未来小孩上学还是要考虑的”。

## 对话社会：有机不等于保证甜

11 月，一批产自湖南的蜜桔在“分享收获”电商平台上线，石嫣特别提醒，商品推广时不宜只宣传、强调甜度——由于全省干旱，今年的蜜桔在口感上明显没有那么甜。

她不愿辜负消费者们来之不易的信任，但也希望消费者能够理解“有机食品”并不等同于“好吃”。“难道就因为今年不甜我们就不支持这位农民了吗？他干不下去，我们消费者也就没有再吃到这个蜜桔的可能了。”石嫣向群里一位“投诉”蜜桔不够甜的会员分享自己的感受。

“我们的使命是重建人与土地的连接。”这需要“新农人”们探索自身、探索与土地和自然的关系，同时不断挖掘与外部社会的对话可能。与农业同行、消费者、学者、政策制定者，石嫣总是冲在对话的第一线。

她更多地“走出去”，也“迎进来”：除每年全国数百场公开讲座和各种国际会议，石嫣还尝试开辟校园菜地与都市商圈中的屋顶菜园，开展食农教育，让孩子和白领们也能有机会亲近土地。



► 石嫣带着到访“分享收获”农场的孩子一边玩、一边学

和那批来自湖南的蜜桔一样，小兴安岭的野生每日坚果、阿拉善的沙漠蜜瓜、新疆长日照自然生长的板栗南瓜……如果能够通过参与式保障体系的考察和检测，这些产自各地的有机产品就可以放在“分享收获”电商平台上出售。

所有商品都带有“有机种植”“公平贸易”标签，附上产地来源、生产方式描述与农人故事，除了为农人们寻找销路，也提供给屏幕另一头的消费者更多接触、理解有机农业的机会。

与此同时，石嫣还组织个体有机农人连成一片。2018年，她通过竞选成为国际社区支持农业联盟的联合主席，在她和“分享收获”的示范和带动下，全国采用“社会生态农业”模式的有机农场、农夫市集、消费者合作组织等已有1000多家，约20万户家庭因此改变了消费方式，20多万亩土地免受化肥、农药、除草剂的危害。

与此同时，“分享收获”也在承接来自政府机关、研究机构的农业课题，为政策制定提供建议。2017年，

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要建立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连接”，看似简单的一句话背后，是温铁军等学者的研究、石嫣等一批农人的实践、与无数农业同行者们数年探索得到的经验与教训。

“政策的开口涉及土地、乡村治理等很多议题，不是立即就能打开的，”石嫣对于自己正在进行的农业、乡村振兴探索，有着足够的清醒认知和耐心。

“对于现在的很多新农人来说，我们可能处于历史使命的一个初期阶段吧。”石嫣这样说道，她想起去年9月份，自己又见到并有幸采访“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袁老对着她，也对着采访镜头强调：“年轻人都不搞农业，今后是个大问题。”

刚结束在广东肇庆举办的第十一届社会生态农业（CSA）大会行程，忙得有些“脚不着地”的石嫣发了一条朋友圈，感叹：“回到农场被冷风一吹就踏实多了”。见到几乎一周没见的农场年轻员工们，亲切唤她“掌柜”，她又一次感受到，希望就在她身旁。

## 读者与社会反馈

人应该像植物一样长在土地里，踏踏实实的。

——微信读者 Lbeaicial

我在大概9年前读高中，看《读者》的时候就听说过她了。这么多年了，还在坚持农业这一块，好难得。

——B站读者陈陈陈菜头和葱头

农村基础设施普遍跟不上的情况下，年轻人去城市发展也不只是因为瞧不起农业，单单就是个人生活质量的选择。农业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流失的情况在不同农业模式的国家都已经出现了，日本农业人口平均年龄已到60以上，美国也已经开始关注吸引年轻人从事农业。这些国家农村城市差距还不算那么大、农业还能盈利的情况下，依然出现农业人口流失，我们如果不能缩小城乡生活条件的差距、不能保证农业盈利，又怎么能期望年轻人回到农业？农村医疗教育差的情况，文中略有提到。只是也许现在与种植模式的改变相比，农村生活条件才是更难改变的事情吧。

——微信读者喵三强

我是种水果柑橘的果农，正在试验通过补上肥料、不打农药来种植柑橘，使喜爱美味柑橘的朋友尝的放心、吃的健康。可是就像女博士刚开始那样，柑橘果子被虫爬过、有疤痕，果子不干净、不美观，没上肥料产量少，但我一定要像女博士那样坚持下去，种出有机生态柑橘。

——微信读者彩虹之雲

没法有机了。土壤已被污染。我也好想回家种地。

——今日头条读者木木风 111

# 李冰： 为了那些身在上海 却难求温饱的人

文 / 竹小淳 编辑 / 张希蓓 图 / 除另作说明, 由受访者提供

“

目前, 除了继续之前的正常运营, 绿洲公益还在寻求一些新的合作可能, 比如将食物包派往更需要帮助的其他贫困地区, 与企业合作打包食物活动, 以及最近正在策划与农场合作的丑食分享。

编者按: 你是否听说过向困难人群免费发放食物的“食物银行”? 这次疫情期间, 食物银行在许多国家都登上了媒体头版, 从美国到瑞士, 失业潮重压下需要免费食物的人群变得空前庞大, 作为一种社会支持手段的食物银行的意义, 也因此空前凸显出来。

李冰是中国首家食物银行的创办者。从上海的老旧小区开始, 李冰与她的“绿洲公益”七年来致力于同一件事: 将那些“多余”的食物送到需要它们的人们手中。每个月的食物包、每一天的免费蔬果与散落街角的共享冰箱, 在施与受之间, 它们不止是食物, 也是一种连结、一种支持, 一点点总会如期而至的安全感。

葛家楣第一次走进祁桂荣家中时, 后者的丈夫已经几乎没有了行动的气力。2018年, 上海浦东的这一对退休夫妻双双检查出癌症, 随后又共同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 吸引了一批本地媒体的关注。

当时 59 岁的退休工人、“绿洲公益”食物银行行长葛家楣从电视台的画面中瞥见了熟悉的门洞。顺着镜头中拍到的门牌号, 葛家楣当周便带领着自己的团队敲开了祁桂荣的家门。

在当时, “绿洲公益”已开展了 5 年“爱心食物包”活动, 只要征得对方同意, 便每月为需要食物的家庭提供价值 120 元的食物包。除了最基础的油米以外, 还包括各家企业捐赠的其他食物, 以帮助一些家庭节省开支, 用于医疗等更需要的地方。

祁桂荣对于他们的到访颇感意外——虽然已经接受了政府和社区的帮助, 绿洲公益是第一个“找上门来”的公益组织。葛家楣回忆, 当时祁桂荣床榻上的丈夫虽然精神不好, 但仍“很高兴”, “没有想到除了政府和社区之外, 还会有其他人来帮助我们。”

浦东塘桥街道食物银行的捐助名单上, 就这样又多了一户。

## 生在上海却难求温饱的人

除了祁桂荣, 绿洲公益的捐助名单上还有原因各有不同, 但困境十分相似的数百个家庭。

2018年, 2400 万户常住上海人口人均 GDP 为 13.5 万元, 达到发达经济体标准。但与此同时, 约 17 万户低保家庭仍在依靠每人每月 1160 元的低保收入生活, 其中大部分是“看个病都要一千块不止”的老人。在绿洲的捐赠名单上, 受捐助者的遭遇被以简短文字一一注明: 征地农民、纳保 (因未曾缴纳过社会保障金而无法享受低保待遇的居民)、重残无业、以及“失独家庭”——曾有刚上高一的学生志愿者很认真地问过葛家楣, 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病痛、意外伤残、亲人早逝, 绿洲的绝大多数受助者遭遇过迎面而来的厄运, 或至今仍在漩涡中挣扎求生。食物包最早的受益人之一朱叔是一位癌症患者, 确诊不久又遭遇失业, 妻子也在这一系列打击下离去。依靠着食物包, 朱叔当时初二的儿子今年已完成学业, 即将开始工作, 但朱叔的健康状况却在此时骤然恶化。“眼看孩子大专要毕业工作了, 心里的事要放下了, 身体一下子就不好了。”



▶ 2019年9月, 食物银行在金浦派发余量食物



► 绿洲公益“食物银行”/机构官网

另一位上海阿姨曾有过做老师的丈夫和幸福美满的家庭，但天有不测风云，丈夫四十多岁便早早去世，儿子又因心脏疾病丧失了工作能力。阿姨本人在插队回沪后一直在弄堂中帮忙接听电话，十几年没有缴纳过社保，离开工作后很快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儿子自尊心很强，不愿意让周遭了解到家庭的困窘，更不愿意寻求帮助。“他们是买不起很好的食物的，甚至可以说买不起食物。”最终，阿姨偷偷给绿洲打来了求助电话。

失独家庭的情况则尤为揪心，其中一户的儿子成年不久就不知所踪，“小孩到外国去，想挣钞票，死在外面了。哪里死、怎么死的都不晓得，也没赔到钱，二十多岁年纪，就死在外面了。”被留下的父母如今已经白发苍苍。

“现在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人们对贫困也认知得越来越深刻，”绿洲公益创始人李冰感叹。十几年前，不少人对于生活在城市、尤其是在上海，却仍需要食物救济的人感到不解，认为他们或懒或贪。“现在大家越来越理解到了，他们只是真的无法拥有。”

## 让更多食物被更好地食用

作为中国唯一被世界食物银行认证的分支机构，爱心食物包背后的绿洲公益数年来践行着一个听起来非常直白的理念：让更多食物被更好地食用。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显示，全球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食物在上桌前就已被丢弃，造成巨大资源浪费和垃圾处理压力。而与此同时，超九分之一的人口每晚爬上床时仍旧腹中空空。

“一方面有很多食物被浪费，一方面很多人吃不饱饭，把本来会被浪费的食物给到原本吃不上的人手中，就是我们做的事情，”理科生出身的李冰用手在空中简单地比划了一个环。

食物银行的概念诞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目的是将“多余”的食物收集起来，再分发给有需要的人，一面减少食物浪费，一面为困境中的个人提供必要援助。过去半个多世纪，类似的社会援助机构在全球多地逐步发育成熟，并形成了全球食物银

行网络（The Global Food Banking Network）这一国际联盟组织，对各地实践给予指导和支持。

除了帮助遭遇困境的个人和家庭解决口粮问题，过程中以食物为载体和纽带所体现出的社会支持也是当代食物银行发展的关键理念之一。

绿洲食物银行是同一模式在中国大陆的本土化尝试。目前，它主要接受企业捐助，多为临近保质期或卖相有瑕疵、难以卖出好价钱的食物。绿洲公益的年报中对这些收集来的食物用了“抢救”二字：截止2018年底，食物银行抢救了462吨即将被浪费的食物，分发给了43万人次。

与此同时，上海每天要销毁1200吨有机垃圾，其中大多数是食物。

“并不是所有过了销售日期的食物都一定要被扔掉。”李冰说。在环保主义盛行的欧洲，有不少关于食物食用与保质期限的指导，食物银行也为大众所普遍接受，但在中国，这样的尝试才刚刚起步。

在塘桥街道分发点背后的仓库中，除了粮油米面，货架上还整整齐齐地码着进口风干果脯、金枪鱼罐头、以及日式零食。原则上，绿洲鼓励企业捐赠的是临期食物，而临期还未销售出的包装食品往往多种多样，所以食物包里的品类也颇为混搭。

截至2020年初，绿洲有长期合作关系的200余家捐助企业中大部分是外资企业，2018年春节，绿洲公益成为世界食物银行认证分支机构之一，此后找上门来的企业变得越来越多。“刚开始做那阵子一年大约能收到20吨左右的食物，现在有200多吨了。”但这仍不足国际食物银行平均受赠食物体量的五分之一。

## “企业害怕”

是什么阻碍了食物银行在中国的本土化？“很多捐赠者并不希望告知外界他们有做这样的捐赠行为，”李冰和葛家楣都在采访中提到，“企业害怕。”

大部分普通人并不了解什么叫做临期食物，而捐赠食物的企业可能会面临公众指责。“我们接触下来的这些企业都非常害怕，很大一部分，他们怕出错。”

2020年1月的食物包发放清单上列了9个品类：“大米5公斤，油1.8升，挂面800克，披萨味酥脆饼干200克，烧烤味酥脆饼干200克，红米1公斤，凤尾鱼罐头184克，奶盖蛋糕300克，红咖喱酱50克。”粮油是用收到的捐助款自己买的，其他物品每个月都会有区别，依企业捐助的情况而定。

约定每月送出的价值120元的食物包，其实际价值往往达到两百上下，为了最大可能规避风险，企业通常选择的都是保质期较长，容易长期存放的品类。



也有企业提出替代方案：匿名捐赠，他们希望公益机构可以建立一个中心，把所捐赠的食物重新包装、去品牌化、不再让人知道食物来自于什么企业。李冰理解企业的顾虑，但这对于资金人力都不充足的民间公益机构来说并不现实。

除了社区的低收入居民外，绿洲食物银行也对接一些外来务工子弟学校和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为孩子们提供食品和教具。

比起居民，学校的标准需要更为严格——曾有一次，企业捐赠来一批原价 19 元每升的进口牛奶，当时距离标示日期还有一周时间。然而，牛奶的储藏要求精细，被列入“潜在危险食物”分类，必须经过巴氏消毒、然后冷藏或冷冻在特定温度下。谨慎的校方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这批价值不菲的物资。“如果出了事情，担不了责任的。”

事实上，绿洲对于企业捐赠者早有详细的审批流程，除食品安全外，操作卫生、员工健康、运输贮藏过程也都是关键指标，已能够有效控制住风险，只是企业的困境存在于另一个层面。在这方面，提高公众认知度、加大法律层面对企业捐赠行为的鼓励支持措施，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希望所在。



上海塘桥街道的绿洲公益“食物银行”仓库 / 竹小淳

## 投身于“小确幸”的人

光阴如水长流。联系企业捐赠、核对日期和品质、整理食物、发放给受助者……这些事情不大，要日复一日地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在国内“首家食物银行”的名声背后，已经很少有人意识到绿洲公益其实是一家环境保护机构，还是上海第一家经民政局批准并正式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

从环境保护到看起来更像“扶贫”的食物银行，绿洲公益的“出人意料”或许来自于创始人李冰本人的影响：这个性格沉静、为人波澜不惊的上海女孩在考研时决定放弃自己在华东师范大学的生物化学专业，改读了看上去几乎毫无联系的动物保护，而促成改变的契机极为偶然，只是大四那一年认识的一群关注藏羚羊命运的年轻人，在无意间让李冰决心投身于此。

研究生毕业以后，李冰进入一家关注动物保护的国际公益组织，专注于东北虎保护研究。此后几年，家庭原因使得李冰选择离开，又全职投身于自己创立的绿洲公益。

“一开始绿洲公益关注的是环保领域，这也和我之前做东北虎保护算是一脉相承。我们做过小水域的生态治理、做过田地小农场有机化、也做过低碳城市，但是做到后面就会面临一些不知道如何突破的困境。”李冰回忆，“13 年底至 14 年，我们听说了一种形式在香港得到认可，也算是大陆的蓝海，就开始在长寿路社区做一个惜食分享的项目，开始收集和分发食物。后来受到邀请去美国参加了正式的培训，意识到分享食物也可以做得很专业。”

“其实我们一直的理念都是从环保出发。”李冰说，“我们不是专门的扶贫机构，只是在环保的基础上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不是更好么？”

在李冰看来，食物银行帮助了很多需要帮助到的人，这就够了。“每天来领一份食物可能就是他们生活



2017 年某天，位于浦东的社区食物冰箱外排起长龙

中的小确幸，是生活里推动他每天开开心心的一件事情。甚至可能他在很困难的时候、快要走上绝境的时候，这一点点帮助可能就改变了他人的人生轨迹。”一点点日常的、持续的关爱感，可能会成为不少人生活中的一个“盼头”。

“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李冰这样形容自己，“只要有人可以捐，有人愿意拿，这个事情就可以持续地做下去。”

2019 年，在原有的爱心食物包基础上，绿洲公益又在上海的社区中推行了每日蔬果分发。

在塘桥社区，这些分发的果蔬主要来源于附近的一家德国超市，每日停业后，超市会将销售截止日为当天的果蔬整理运送至食物银行。次日清晨，社区中登记过的低收入家庭可以来指定地点领取，剩余的则会在中午派发给附近的环卫工人，每人每日可以领取一份蔬菜、一份水果，有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工友可代为领取，而困在楼梯房里行动不便的老人或者残障人士，则由楼道或居委的工作人员帮忙。

无论是食物银行、还是每日给需要的人群发放水果蔬菜、或是街边的共享冰箱，似乎都很难写出让人热血沸腾的故事。在这条路上，一个致力于给贫困的孩子们提供自习场地的印度年轻人的事迹多年来激励着李冰。与大肆渲染包装贫困儿童“艺术天赋”或“创伤经历”的组织不同，这个自习场地的创立者的初衷，仅仅是让孩子们“看见”这种可能。

李冰想做的也是如此，“无论如何，希望他们每天领取的这份蔬菜水果，能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小确幸。”

直到 2020 年过年前，葛家楣的手机仍旧不时收到来自祁桂荣的信息。“有时候真的觉得活不下去了，”祁桂荣这样写道。葛家楣很了解，这是病情又反复了。两年前，在绿洲公益介入的几个月后，祁桂荣的丈夫便去世了，留下她一个人继续与癌症抗争。

“她是一个很开朗，很爱说的人。做治疗也就是自己背个包就去了，”葛家楣说。在发来那条信息之后一个月，祁桂荣也告别了人世。

## 疫情中的“危”与“机”

2020年，由于疫情与随之而来的经济冲击，原本并不引人注意的食物银行在全球各地都登上了媒体版面，一面是骤增的失业人群突然涌向食物银行的申领窗口，另一面则是香港、加拿大和美国多家食物银行因捐赠不足、供应链断裂而陷入困境，也有不少食物银行因疫情防控的原因被迫关闭。

危机之中，美欧多地出现企业主将自己的营业场地出让给食物银行进行分发和储存物资的新闻，维护食物银行，在许多国家正在成为人们维护自己坠落时最后一道“安全网”的共同努力。

因为食物包早在年前就已发放到了受助者手中，疫情没有对绿洲公益的活动造成太大影响。在战疫最为焦灼的时候，也有不少企业联系李冰，希望可以向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捐赠食品物资，“食物成吨成吨地来，”李冰说。但当地社区管制、加上物流运输不便、以及后期物资紧张局面得到缓解，绿洲的尝试未能成功。

2月初开始，绿洲恢复了日常的蔬菜发放，食物包的供应也恢复了正常。“事实上，疫情后期开始，我们收到的食物和资金援助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往年同期水准。一方面疫情期间有一些食物库存的积压，另一方面，这次疫情也许也让更多人意识到了社会责任的重要。”

目前，除了继续之前的正常运营，绿洲公益还在寻求一些新的合作可能，比如将食物包派往更需要帮助的其他贫困地区，与企业合作打包食物活动，以及最近正在策划与农场合作的丑食分享。

分享冰箱活动也在稳步扩展中，今年在上海预期能从二十多个冰箱点扩展到五十个左右，还会在广州花都区开始试点。

也许，还要买辆车——李冰说，她想要做一个移动的食物银行，只是仍然缺人。“现在所有人都在满负荷运作了，人手太紧张。希望可以能找到愿意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



▶ 食物银行行长葛家楣在储存食物的仓库中

## 读者与社会反馈

食物浪费除了餐桌上的挥霍，和企业对捐赠的消极态度也有很大关系。盒马超市每天十点以后集中销毁大量食物，但面对“浪费社会资源”的指责，盒马其实并不会动力做出任何改变。在食品安全这样的敏感问题上，确保万无一失才是上上策，为了可有可无的社会名誉而去捐赠无异于火中取栗。所以想要企业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需要法律层面的松动和改变。

——微信读者 Patrick

想起去年中秋节前盒马倒掉当天制作、未售出的鲜肉月饼，把在那里吃饭的老阿姨给惊着了。在现有的环境下，很多企业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如同惊弓之鸟，其实食品保质期的概念早该更新了。

——微信读者行者无疆

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我住在上海愿意出一份力做志愿者，怎么联系？/ 求发布联系渠道，希望能联系上食物银行！/ 或接受志愿者加入吗？/ 请问如何申请一起去帮忙？

——微信读者 Whale Fall/SC/Clover/Betty

之前，看到西方国家有食物银行，现在，中国也有食物银行了，虽然只有一家，却也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请问，有相关的网站吗？想详细了解一下。

——微信读者 Bepa

支持！一直都觉得人类社会对资源的使用太过了，能少一些浪费，多一些物尽其用，挺好。

——B站读者空松 girl\_敏儿

终于有篇关注国内温饱的文章了。

——虎嗅读者 2B 嗅友

# 和继先 / 邱华绒吾： 当你的语言中没有“病毒”

文 / 李何 编辑 / 谢雯雯 图 / 除另作说明, 由受访者提供

“

“东巴是纳西民族的传统文化掌握者，有着推动民族文化保护传承，转型创新的历史责任。”面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村落振兴和人心聚散等经典难题，他给出了坚定的答案——“回归传统也是一种创新”。

编者按：不知你有没有想到过，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连那些最“发达”的地区都不得不在一夜之间被强行颠覆世界观的时候，那些距离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文明”相对更远的地区，医疗条件与健康观念都相对薄弱的地区，面对新冠病毒的来袭之际，该怎么办？

两位多年投身于家乡建设和守护的少数民族青年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在各自的社区中，帮助不通汉语的族群同胞们度过这个特殊的时期的。来自纳西族的“东巴”和继先与来自四川藏区的“艾滋喇嘛”邱华绒吾，以各自的方式推动了同胞对于疫情的科学认知和严格防控，也在与自己的同胞们一起，准备应对后疫情时代的新挑战。

2020年1月24日夜，和继先一宿没睡。

那晚，作为丽江市玉龙县纳西族村庄吾木村的现任“东巴”的他，与本村村委会主任召开了紧急会议。“东巴”是纳西族传统神职人员，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也是掌管着村子传统习俗活动和节日礼仪的人。

会议以圆满结果收场：村委会主任同意在第二天，也即农历大年初一召集村组干部，进行防疫防控分工部署——即使当时村委并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上级的疫情防控的通知。

和继先却仍觉得心里不踏实。村委主任回家后，已经躺在床上的和继先，最终还是穿好衣服，在深夜一户户敲开了村民的家门登记返乡人员。那几天，吾木村飘着罕见的雪，因为单位春节放假又遇到几十年一遇的大雪封山，连乡镇干部也无法及时回归，做完登记工作，和继先又连夜起草了一份村落防疫工作方案。

吾木村距离丽江城区 120 多公里，全村委会 300 多户居民，1300 余人，“单我们的村民小组就有外来人口、学生和外出务工返乡人员 108 个，来自全国 57 个不同的城市。其中和湖北、武汉有联系的人有 5 个。”

和继先没有处理过类似的局面。在这之前，出身东巴世家的他在做的是自己的“本职”——传承和复兴纳西族传统文化、记述和存留吾木村历史。过去几年，他运营着一个名叫“纳西母语诗歌创作”的公众号，分享自己创作的纳西语小诗。

那是武汉封城的第二天，纳西族新年的前一天。疫情并未真正来到他的村庄，却又深刻影响着整座村庄。回想当时骤然面对未知疫病的心情，这位年轻的东巴仍感到“压力很大”。



邱华绒吾

一个月后的 2 月 24 日，在距离他几百公里外的四川省甘孜州，另一个人同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与和继先不同的是，此前十年里邱华绒吾一直在藏区进行面向公众的艾滋病以及其他疾病的知识普及，甚至得到“艾滋喇嘛”的外号——尽管他既没有得艾滋，也并不是喇嘛。

武汉疫情爆发以来的一个月，他运营的公众号已经接连翻译了数十篇科普文章和一本防疫手册，数十万人因此受益，藏语防疫文章数次突破“十万加”。

但在 2 月 24 日，藏历新年的前一天，困扰着这位藏族小伙的是焦虑感：“看到武汉那边大家都在拼命工作，我在家一天都呆不下去，我就有那种犯罪的感觉。”他决定连夜赶回成都，到疫情更紧张的地方，去看看自己是否还能做更多。



▶ 带着艾草帽防中暑的和继先 / 王身教



▶ 邱华在为藏民进行宣讲

## 一炉天香

摆在和继先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春节的“大祭天”仪式怎么办。

纳西族与汉族春节日期相同，但习俗有别。其中通常安排在大年初五的“大祭天”仪式是整年传统节日习俗活动中最重要的一场，数百年来一直有“纳西以祭天为大”等说法。纳西族传统神话故事当中，正是始祖神灵崇仁利恩受到天启进行的两场祭天仪式，成为了纳西族得以子孙繁衍、族群壮大的开端。

而现在，因为一场远在内地的未知疫情，真的要停办如此重要的祭天活动吗？

过去十几年，和继先与前辈东巴的传统重建工作，几乎是从零开始的。“大祭天”活动从最初仅三四十人自愿参与的小规模聚会，逐步发展到全村七大“崇窝”（家族）争先参与、轮流组织的盛大节庆。在村民们眼中，2020年也不应例外——“每个家族都特别在意春节的祭天活动是否还能继续进

行。特别是轮值祭天组织工作的家族几次找到我，希望我能够继续为他们家族主持好春节祭天活动。”

和继先明白，这些历经多年才逐步得以恢复的文化传统，对于吾木村的凝聚力和村民认同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与此同时，大部分村民并不相信遥远的病毒真会拿自己家乡怎么样，而此时村干部也没有收到上级有关疫情防控的任何通知。

“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村子里的角色……如果到祭天活动的日子政府仍然没有反应，作为一个村庄的东巴怎么去做这个历史性的选择题？”

抉择十分困难，但眼看武汉疫情愈演愈烈，和继先还是与村干部、家族代表协商，决定停办祭天。

要在村中为停办争取到众人的理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止一家村民难以接受这一决定，特别是，各家族都已紧锣密鼓地将祭天物资准备好了。

向村中不少从未出过山的纳西族人解释“什么是新

冠病毒”，也成了一个意外的难题：他们中的相当多人完全不通汉语，而古老的纳西语言中没有“病毒”、“流行病”、“抗体”、“疫苗”等等现代科学和医学的对应名词，也无法通过借词音译，每次说明都不可避免地涉及繁杂而令人眼花的名词解释，给村民的理解更增添了难度。

村中的老人们在这个时候帮上了大忙。在他们的讲述中，清朝末年在吾木村也曾爆发过一次瘟疫，百年以后，当时爆发的究竟是什么疾病已经无从考证，但正是当时村中亲密无间的热心肠，最终酿成大祸——起初只是一位村民染病去世，但处理后事和葬礼过程中全村前去逝者家中帮忙的习俗，导致村中多人被感染。

历史的教训还在老人的口耳之间传递：纳西族过去应对传染病时，居住在山区的村庄会用封桥断联系的方式，进行不同村落间的隔离；坝区的村庄则会用挖沟放水围村庄的办法进行封村隔离。在城里如果有人家感染疫情就不能出门，街坊邻居在深夜把生活的必需品放在被感染家村民的门口附近，保障

这家人的生活资料，共同防止疫情的扩散。这样的传统经验的讲述在村民应对疫情的过程中重新启发了合作，互助和自律精神。

在此前传统重建中得到恢复的家族和族长制，在这一次说服村民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小作用。为了尽可能协调防疫与节庆需求，和继先最终在大年初五那一天，带着其中两个家族的族长和村委会主任，四人代表全村在祭天场烧了一炉天香。

“我们不能因为文化耽搁了防疫，但也不能因为疫情放弃或者否定了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

## 传统与现实的对话

对邱华绒吾来说，在许多其他地区如同洪水猛兽的新冠疫情，给他带来的挑战并不如想象中大。如何调动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力量，帮助推动藏区公众健康教育，是他过去十余年始终在探索的课题。

“藏族对蝙蝠是非常忌讳的。”回忆最初宣传疫情严重性的时候，邱华绒吾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碍，“我小的时候森林里有很多蝙蝠的地方，老人是从来不让我们接近，对蝙蝠的恐惧可以说是与生俱来。所以大家一听（可能）是蝙蝠传染上来的，所有人都能想象得到那一定是非常厉害。”

在藏传佛教中，蝙蝠也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我们叫它‘四像动物’，非人但有人脸，非鸟但有鸟翅，非猫有猫一样的爪子，非狗有狗一样的叫声，杀死一只蝙蝠要承担杀死四种动物的罪过，杀死动物的罪业要在地狱里经历五百次轮回才能消掉，四种动物那就是两千次，你想（这个病）厉不厉害。”

除了对于蝙蝠的恐惧，邱华绒吾还在藏族业已消逝大半的生活传统中为防疫措施找到了不少根据。过去藏族人出门时一直有自带餐具的习惯，从不使用外面的公用餐具，也不会把自己的餐具借给他人使用，这恰与防疫要求不谋而合。

与此同时，经书中有关“佛只会把三毒或者五毒当作敌人，而不会把具有三毒习性的人当作敌人”的记述，也成为藏区民众在面对染病患者时的天然行为准则。

还有不少人试图为其他人提供帮助，或参与捐款。邱华解释，这也与藏民根深蒂固的朴素信念有关：“藏族传统是要想不得病，要保持健康，就要做善事，所以越面临疾病的威胁，就有越多人积极行善。”

事实上，这一次新冠疫情所要求的防疫措施，对于藏区的老人和僧侣等长期浸润在传统藏文化中的人群来说甚至可以说是广受欢迎，尤其是在《野生动物保护法》启动修订工作以后。“这件事是完全符合了老年人和僧侣的意愿，让年轻人去理解传统文化，禁止杀生，也更能够理解以前的生活方式。”



▶ 孩子与东巴文字写出的纳西歌曲 / 王身教



▶ 2020年8月，邱华在藏区进行宣讲

就这样，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古老藏文化与骤然而来的新发疫情的防疫举措之间实现了对话。

相比内地，藏区卫生医疗条件比较薄弱，预防因此显得尤为重要。疫情爆发以后，藏区不同教派的各寺院联合启动了史上最大的一次共同祈祷活动，为国家和人类祈福，他们与来自公共卫生、医院等地的志愿者一起，很快达成了对于疫情严重性和防疫措施的认识。

邱华绒吾与他的公众号团队产出了藏语防疫材料，希望触及更广泛的藏区受众。经过多年经营，他的藏语公众号“藏区防艾服务中心”已有 23 万订阅，是藏区最大的健康教育机构，也是藏语文化圈内数一数二的“大号”。

由于很多牧区民众无法读写藏语文，防疫宣传工作同时还以群内音频、短视频直播、说唱音乐、白格走唱、格萨尔史诗唱诵等特色方式进行。藏区内部方言情况复杂，邱华还动员各地志愿者发展出十二种方言版本的宣讲活动。

“这都是多年健康教育做下来得到的经验，知道老百姓的文化程度和接受能力，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要符合藏族价值观。”邱华绒吾总结，“老百姓只要能听懂，就会非常重视。”

源于藏区各界的共同努力，2月25日开始的藏历新年变得静悄悄，有牧民告诉邱华，今年新年是“心灵上相互祝福和祈祷最多，行为上表示得最少的一年”，从前去亲朋好友家一同过年的习惯基本上销声匿迹，绝大多数人留在自己家中。

当然，过程并非全无波折。疫情期间藏民的看病习惯一度给医院造成过严重困扰：一人得病，陪护者动辄十余人，且喜欢在病房之间相互串门、交流信息。另一方面，各地关卡被普遍应用的额温枪，也给藏民造成了极为强烈的心理冲击，邱华绒吾因此特地制作了几期节目，向老百姓解释“在医院应如何配合医生”。

## 初心和“船”

十几年前选定事业方向的时候，摆在和继先面前的，是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出走而日渐没落的家乡和渐渐不再为人提起的民族传统。而摆在当年的邱华面前的，是藏区民众对于健康知识，特别是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无知与漠视。

对于和继先和邱华绒吾，传统文化分别成为了他们的“初心”，和渡过困难之河的“船”。

“没有人知道艾滋病，老百姓不知道艾滋病是一个吃的东西还是别的”，邱华回忆，尽管当时藏区部分地方艾滋病感染问题已比较严重。一个无知的病毒携带者就会导致新发感染者以几何级数增加。

邱华自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才第一次了解到“艾滋病”的概念，知道了艾滋病在藏区的严峻形势。这使他大为震惊——自己接受了高等教育才知道了“艾滋病”，那藏区其他的同胞呢？他决定让更多人了解“艾滋病”。

开始并不顺利。问题出在他的健康宣传和教育与民族传统的“不兼容”。

囿于病症特性，仅仅是解释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这件事，就常常会在听众中间引起目瞪口呆的反应。对于疾病本身，藏区人民秉持着宗教观念，认为“不做坏事就不会得病”。也有许多人援引宗教经典，相信它是各人命里的“业”，不是现世行为可以改变，或是相信万能的传统藏药足以治疗艾滋……

由于邱华强调各地医生需要对针头等器械进行消毒，这一与传统相抵触的宣讲还让他在一部分人眼中成了“恶见者”，认为他不尊重传统和宗教。还有老百姓将艾滋想象为一种“病魔”，认为时常提起它反而更容易招致灾祸。

在最不受欢迎的时候，邱华甚至不得不采用“狡猾”

的手段：以放电影为名把大家集中到一起，等电影播到高潮，暂停播放，出来宣讲艾滋病防治知识。

结合听众反馈，他不断修改自己的用词和宣讲形式。曾经不太在意传统的邱华绒吾在实践当中逐渐体会到了“传统”的重要，也愈发谨慎自己的措辞：“如果硬搬外来文化，藏族人一定会需要一定时间去接受。”邱华也意识到，必须争取到在民众心目中地位至高无上的高僧大德们的支持，“僧侣们说一句，顶上在家人说一百遍。”

而在吾木村，出身东巴世家、成为“留守青年”的和继先，带着传承的使命，也忘不掉小时候家族一大家子共同奔赴传统活动的样子。

“家乡的人们都坚信……必须要由东巴给亡灵点一盏灯，死者的亡灵才能顺利通过没有太阳和月亮照耀的归途，回到祖先的身边。”和继先这样回忆初任“东巴”的几年，“为了让每一个回归祖居故地的亡灵能够顺利回归，我只能现学现卖地在‘应付’中支撑着一个又一个的山乡祭祀仪式。”

在东巴文化中，仅祭祀仪式就有大大小小几十种。主持一场仪式，意味着学会仪式所需的所有内容：诵经、解经、主持、唱对应的歌曲、跳特定的舞蹈、甚至完成相关的木雕和服饰制作。除此之外，还有全球唯一存活至今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和用东巴文写成的数万卷经书需要不断学习……

这些，构成了一个大山里传统纳西族村落的精神家园，贯穿在日常的生产生活里。

涉而及面如此之广的文化，传承却只依靠数量有限的“东巴”完成。在近半个世纪的传统民俗活动的中断后，许多内容重建起来举步维艰。

一个细节或许最典型地提示了这种“失落”：由于

现代化工业农业的发展，农作物种类悄然减少，和继先在恢复东巴仪式的过程中发现，有一部分指定农作物供品如今已经无处可寻。

伴随着渐趋失传的文化，还有在城镇化大潮下乡村的日益凋零。离开村落去城里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曾经密切的村内互助越来越少，村落正在死亡，下一代的孩子们许多已经不会说纳西语……

在和继先看来，传统文化不应是存在于书本和论文中的死物，传承也不仅关乎民族文化的命运——它关乎民族本身的命运，关乎这个民族中的“人”，对于如纳西族这样的小民族，文化传承将决定民族的存续。

“文化只有在现实的生活中被使用，还能参与到村民的生活生计和村落治理中，才是最好的传承。”他决心投身于哪怕一点点的改变中去，要让村落里的年轻人“出得去，也回得来”。

## 试金石与未来

十几年来，和继先和邱华绒各自守护着一方土地、一个社区。而突然而来的新冠疫情“考验”，在无意之中成为了他们努力成果的一块试金石：是吾木村重新建立起来的人际信任、民族传统和村落认同，帮助起初对病毒毫无认知的村民配合和支持了种种防疫措施，并促使大家在此后共同探索、渡过因为疫情带来的新难关，包括外出务工村民的失业和生计的重新选择等。

而过去七年中邱华几乎从未间断的语音和图文更新，为藏区民众了解和吸收健康知识提供了一扇至关重要的窗口，也因此得以在疫情爆发的第一时间，就将准确明晰的疫情科普，以藏区人民听得懂的方式推送进千家万户。

疫情威胁逐步淡去的两三个月里，他们也在生活恢复正常之余，迎来新的思考与挑战。



和继先在教村里的孩子东巴文字

邱华绒提及，由于减少人员聚集和封路封城措施的影响，藏区防艾服务中心已坚持七年的“防艾万里行”活动今年没有开展，线下的宣讲活动也仅有部分恢复。

尽管也在积极拥抱群内讲座、视频直播乃至微信小程序等新的传播形式，但藏区仍有客观条件限制：仍有不少牧区信号覆盖不佳，电子产品覆盖率也还有限。线上方式无法解决一切问题。

而在吾木村，这个夏天，由和继先与自己的爱人、社会工作师陈正艳合作组织的吾木村东巴文化夏令营、学习营等活动逐渐回归，村落的生活也随着封村封城措施的解除而渐回正轨。

但作为“东巴”，在经历了这次疫情考验后，和继先的思考又比这些“办还是停办”的具体问题走得更远。

“东巴是纳西民族的传统文化掌握者，有着推动民族文化保护传承，转型创新的历史责任。”面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村落振兴和人心聚散等经典难题，他给出了坚定的答案——“回归传统也是一种创新”。

## 读者与社会反馈

很有趣的一篇文章，受制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许多先人的“智慧”与告诫都是这样传承下来的（许多现在看起来很迷信，因为我们已经能给它更好的解释）。即使他们当时很难说清楚原因，甚至有时将确实会威胁生命安全的实物幻化成更宽泛的、指向不明的恐惧；但是本意是好的，这样也确实会确保更多后代的存活（生物的本能）。

——B 站读者 K-awa

这有些习惯倒还是挺不错的。众所周知，摩西之所以禁食不洁的肉类，是为了预防旋毛虫病。

——微信读者阿拉伯的劳伦斯

“古老藏文化与骤然而来的新发疫情的防疫举措之间实现了对话”。“突然而来的新冠疫情“考验”，在无意之中成为了他们努力成果的一块试金石”。他致力于防艾事业，并为之付出极大辛劳。没有功利，没有私欲，有的是无尽的努力。

——微信读者佐君

扎西德勒，我想慈悲的佛菩萨一定会加持藏地，加持纳西族。我想我们一定可以延续我们的传统。

——微信读者宫翊哲

# 04 健康福祉

健康权是一项包容广泛的基本人权，是人类有尊严地生活的基本保证，人人有权享有公平可及的最高健康标准。保障健康生活并促进各年龄段所有人的福祉，对于建设安定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至关重要。

儿童、老年人、重症临终患者、残障人士 ..... 社会创业家们首先把目光聚焦在这些最亟需帮助的群体上，努力保障个体的健康权与福祉，同时也在系统性层面，不断探索公共医疗服务的可持续方案，推动公共卫生和医疗政策改革与进步，推动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

3 良好  
健康与福祉



# 王艳蕊： 注定不停失去的晚年中， 她选择为老人留下尊严

文 / 李何 编辑 / 谢雯雯 图 / 除另作说明，由受访者提供

“

但在从业十四年后的今天，回看自己为之投入无数精力金钱的养老事业，王艳蕊提起的是那个经典寓言：雨后的沙滩上，一个小男孩把浅坑中搁浅的小鱼一条一条扔回大海，路过的每个人都告诉他，他不可能在浅坑干涸之前拯救所有小鱼。小男孩回答说：“能救一条也有意义。”

编者按：有人说，衰老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越来越多地失去那些曾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朋友，工作，社会联系，听觉、注意力和行动能力……正如人无法免于衰老，当生命之路行至接近终点，大部分人也同样无法免于难以自我照料、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晚年。

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和度过这段时间？对于那些真正需要“养”的老人，家人和子女是否还是唯一的“最优解”？王艳蕊十四年来一直在探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她和她所创办的乐龄养老希望通过她们的工作，让普通人在这条失去之路上仍然能够保有尊严。



▶ 今年春节时，王艳蕊给在院老人送生肖鼠

“你们终于开门了！”这是疫情高峰过去之后，终于随着北京市初步解封而重开的北京石景山区乐龄养老服务中心，与它的创始人王艳蕊，几天里听到最多的话。

2020年的冬春之交，乐龄的老人和工作人员都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一部分老人在过年前几天被家人接回家去团聚，本想住上两三天就送回来，没想到正碰上新冠疫情爆发，就这样滞留在了自己家。在院内的老人与值守的工作人员同样面临巨大挑战，由于疫情防控原因，家属探视被完全禁止，院内所有人不能出门，这一封就是三个多月。

解除封锁的通知一下，滞留在外的老人马上开始返回，哪怕仍需经过核酸检测和隔离十四天才能进入中心，这些苛刻条件也没有拦住他们返回的决心。

“家属都要崩溃了，家里不知道怎么照顾老人，也没有能力照顾，没有人。”王艳蕊解释，“不止家属，也有老人在家觉得住得不合适，也想回来，但之前谁也没办法（回来），他们就天天来问。”

也有在院老人的家属在乐龄公众号文章下留言：“这些日子，可把你们辛苦坏了……不是一个谢谢就能让我们心安的。”

这是2020年的5月底，“儿子活埋老母亲”与蓄意谋杀老人的“毒保姆”两则社会新闻在几天内接连刷屏，但在养老行业沉浮多年的王艳蕊看来，骇人故事背后，现实中的养老困局远非媒体公布出来的这么简单。

## 两个问题

“你想过为什么一般保姆不愿意照顾老人吗？”谈及两起恶性事件，王艳蕊摇摇头，“照顾老年人，尤其是卧床的老年病人，这样的保姆很难找，大部分人都愿意做，保姆虐待老年人的事件确实存在，老年人或者是家属虐待保姆的例子我们听过更多，说到底，这个行业目前生态是极不健康的。”

住家保姆面对的问题来自方方面面，有老人和家属的坏脾气，有部分失智老人的无端控诉，有夜间休



乐龄工作人员在开展培训

息时间无法保证，甚至还有更普遍而隐蔽的理由：因为吃不饱，因为老人的饮食通常量少且清淡，而雇主家庭不会为付出了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住家保姆单独做饭。

在业内看来，要解决保姆职业困境，让保姆的处境和行为都变得“可见”的方法并不复杂，但少人问津：建立家政公司合同制，一方面保护住家保姆的职业诉求，为她们提供社保和劳动关系保障，代她们与雇主家庭沟通；另一方面约束保姆行为，通过反馈机制排除“毒保姆”。

在不少其他行业都已发展成熟的这套职业法则，却在护理老年人的住家保姆身上失了灵。“大部分人不愿意额外出这部分钱，相反，真做起来的家政公司经常遭遇跳单，家属绕过公司直接联系保姆，觉得这样便宜实惠。”

监管和协调角色由此缺位，如此恶性循环的结果则是总有关系中较弱的一方成为这种不健康生态的牺牲品，有些时候是保姆，也有些时候是无法反抗保姆的老人。

“请保姆”就这样变成了一件需要承担巨大风险的事。而在许多人想象中，由足够孝顺的子女孙辈在老人晚年需要照顾时全权负责，始终是养老问题的“最优解”：既排除了老人被欺负、被虐待的可能性，也势必比“外人”更贴心和周到，还能在照料老人时给予充足的情感支持。

说到这里，王艳蕊抛出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把找人照顾，和不孝顺，划上等号呢？”

## 现实困局

“养老”这件事，其实远非很多年轻人想象中的那样平和温馨：陪老人说说话，散散步，帮忙买生活用品，在老人身体不适的时候陪他/她去医院，或在重病住院阶段去医院看望和陪护。

在现实中，早在最终宣告情况危急之前很久，家里的老人可能就已经难以自己行走，可能失去语言和表达能力，可能失明失聪，可能逐渐失去思维和意识，变得无法交流，可能陷入幻觉乃至做出一些家人无法理解的举动。

“失能失智”，我们一般这样称呼这个老年群体。他们需要的不再是“陪伴”，而是实实在在的“照料”，需要有人帮助完成大小便，帮助洗澡擦身，需要喂饭或者流食，需要有人 24 小时关注情况变化，制止危险举动——就像照料一个新生儿那样。

甚至比照料新生儿更难。

乐龄接待过这样一个家庭：家中两位高龄老人均为重度失能失智，老父亲失明且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母亲则常年瘫痪在床，除了雇佣了一个住家保姆之外，还需要四个子女以月为单位轮流在父母家陪护，但实际上，四个子女本身也都已经过了退休年龄。

找到乐龄的是这家的大女儿，轮到她值守的那个月刚好赶上她自己的女儿怀孕分娩，住家保姆照顾一位瘫痪老人的生活起居已经工作饱和，而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父亲一刻离不开人。当“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危机，被拖入近乎没有止境的时间索取，几乎无法避免顾此失彼的结局。

她因此选择了向乐龄求助。

起初她为父亲尝试的是日托形式——早上她出

发去女儿家前把老父亲送到乐龄站点，晚上再接回，尽管家到站点只有大约一百米距离，这种方式还是很快被证明行不通：移动过程中的困难还都在其次，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极其依赖熟悉的环境，而对于这些近期记忆几乎为零的老人来说，每天两次往返其实意味着一整天都在陌生环境中度过，而患者会因此格外焦虑不安，对于失明老人，这种影响尤其强烈。

“我能把他暂时放在你们那儿吗？”那位阿姨这样问王艳蕊，“晚上也不接了。”

这是乐龄尝试老人入住模式的开始，王艳蕊将护理员们的排班从原本的统一白班修改为 24 小时倒班制——这位阿尔茨海默症老人只是庞大失能失智群体中的一个，实际护理起来，几乎每一位老人的情况都有不同：有失智老人没有办法睡整觉，有行动不便的老人临时需要起夜上厕所，卧床老人需要定期帮忙翻身，因为容易坠床而应用约束保护措施的老人则出于防范意外的考虑，需要定期巡视。

在老人护理这件事上，照料者从来没有真正的休息时间。

而这样的晚年并不特属于某个“特殊群体”：它已经是许多家庭当下的现实，还将是更多人的未来。绝大多数人都会在晚年、或是在临终前经历这样一段生活不能自理的时间，时长或许是几个月，也有可能是几年甚至十几年。

没有家庭能够承受如此强度的长期照护工作，因为这意味着至少牺牲家里其中几个人的全部生活，包括睡眠，在个别极端情况下甚至也包括照料者自己的健康。

与照护困局同样现实的还有家庭财政负担：目前市场价而言，照料一个失能老人的保姆薪水至少在 7000 元以上，如果有专业技能，上万也很常见，即使在北京，这也不是一般人的退休金可以轻易负担得起的费用。

面对养老，我们往往过度强调诚心与爱，却闭口不谈种种难以突破的现实困局。



乐龄的护理员们在站点接受高级护理员培训 / “乐龄社区养老”公众号

##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更容易被人忽略的是，除了海量时间和精力之外，照顾老人又是一件处处需要专业技能的事。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挪动老人——把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从床或者轮椅上挪下来，这听上去并非难事，现实中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却很有可能发生意外：弄伤老人，或者弄伤自己。

“我们护理员培训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床上的挪动，从床上挪到轮椅上，或者从轮椅上挪到床上，那么首先你应该从什么位置下手去抱老人，不提前做这些培训，有可能你一拽，老人就骨折了，脱臼了，或者你自己发力不对，把腰闪了，这还都是没有摔的情况。”王艳蕊总结，“其实是真的挺难的。”

挪动只是第一步，照顾一个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意味着每天在固定时间完成的一系列身体清洁，按照健康状况安排的特殊饮食，具体到小时的娱乐和休闲活动，定期翻身以及巡视，考虑到没有人能够独立承担如此繁重的工作，照护中还涉及不同班次之间的工作衔接与记录……

而定期监测身体指标，为每一位老人安排需要按时服用的药物，及时识别危险信号并联系医院或出诊医生，更是每一位护理员的工作日常。

“这些东西，在家基本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家人精力和专业技能都有限。”乐龄接手的老人不乏来时身上有褥疮、或是因防护不周出现撞伤淤青的例子，入院后，这都是能够、并且必须避免的问题。

“我自己来说，如果有一天我父母离不开人了，要人照顾了，我肯定第一时间就会找人。”王艳蕊说，“情感支持和具体的护理工作是两回事，我当然会陪着，但是护理的事情，我做的肯定没有我们护理员好。”

但她也承认，现实并不是可以这样非黑即白划分清楚的事，亲人的照料与专业护理之间应该如何抉择，

仍然受到更多条件的限制，而机构所能做的仅仅是为这些家庭和老人提供多一种选项。

“我也很矛盾，我自己家也有老人。”她的父亲也在近年查出阿尔茨海默症，而母亲仍在倔强地自己照顾着丈夫，“很多事情如果是我们护理员做出来，那肯定是不行的，像跟病人发脾气，骂他吼他，但我妈就会这样，即使我跟她反复解释他是病人，可我妈自己也有很多情绪要发泄。”

从六十五岁正式迈入定义上的“老年”门槛，一直到最终离世，这段极有可能长达数十年的漫长晚年时光当中，老人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接受什么样的照顾，每一个个体和每一个家庭都会有自己的答案。但在当下，更迫切的问题并非老人或家人应当如何选择，而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缺少选择的机会。



▶ 王艳蕊（右）与自己的母亲和女儿在乐龄活动中



▶ 乐龄站点内工作人员和老人一起做活动

## 做雪中送炭的事

“我对公益还是有情怀在。”谈到过去几年的选择与经历，王艳蕊这样总结，读书时选择了法律专业的她没想到未来自己会投身于养老事业，但一路走来，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希望“解决问题”、希望能为其他人做些实事的初心，直到今天仍推动着她。

“我们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而不是那些锦上添花的事情。”王艳蕊总结。

2006年最初创办社区养老公益机构“乐龄合作社”时，王艳蕊和她在社区动员起来的老年志愿者团队同样没有特别注意过深处舆论水面之下的失能失智老人群体，在当时，动员本地社区力量，实现老人群体内部的互帮互助，被认为是解决老年人孤独等问题的先进理念之一。

但真正的刚性需求逐渐浮出水面：不断有老人因为家里保姆“断档”而寻求同为老年人的志愿者团队的帮助，老年护理方面的家政服务存在巨大缺口，尽管热心志愿者愿意提供一些帮助，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乐龄的全职家政护理员很快上岗，不久后争取到了部分社区居委会的场地支持，从上门服务发展到日托，之后又在家属要求的推动下，进一步从日托发展到入住。

“重度失能老人的护理是有极高需求的，有些家庭是临时找不到保姆，有些是刚出院的需要特殊护理的老人，家属担心照顾不好于是寻求专业帮助。”王艳蕊解释。第一个开放入住的站点最初的六张床迅速满员，随后开始加床，王艳蕊也收到了更多社区“能不能开到我们这里”的询问。

摸爬滚打多年，王艳蕊始终坚持要做平价养老，要为普通人、普通家庭解决养老困境，但在此之前，乐龄始终没有解决需求端与服务端之间经济上的巨

大鸿沟：一边是需要职业培训、需要稳定工资和五险一金的全职员工，另一边却是节俭了一辈子，最不舍得往自己身上花钱的老年人群体。

但从接收长期入住老人开始，乐龄虽然仍旧亏本，但终于开始有了稳定收入。“我们要做的是居家、社区和机构一体化的综合服务。”王艳蕊说，“这几年我一直在倡议，那些需要照顾的老人才是真需求。我们要做小型嵌入式的综合养老服务，但更多地偏向于失能失智、高龄、空巢、独居等等群体，那些低龄的活跃老人，我们希望他们能来当志愿者。”志愿者模式，是十四年前“乐龄合作社”的延续。

在找到正确经营模式之后，乐龄渐上正轨，2019年，乐龄接收的托管老人人数达到146人，老年餐服务超过4万次，直接接受服务的老人则达到1046人。如果不是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王艳蕊原本期望乐龄能够在2020年第一次实现收支平衡——但疫情打乱了一切。

“也不是没想过放弃，这次我也跟我们员工说了，要是今年撑不下去那咱们只能解散，我实在没钱还能继续往里贴了。”王艳蕊说着，笑了笑，“但现在还行，走一步看一步吧。”

可是，成立十几年来一直亏本，已经贴钱贴到没钱还能继续投入的程度，为什么还会一次又一次地决定坚持下去？

“有那么多小超市，小饭馆，都亏着，北京几千几万家饭馆，是都在盈利吗？”王艳蕊反问，“别的行业，也没有那么多人说因为现在不挣钱，我就不干了吧？”

沉吟片刻，她的声音低下去，“而且，我喜欢，我也知道这是真正有意义的事。”

## 为了有尊严的生命

在所有国家，养老模式问题如今都在探索阶段，并且前景都日益悲观：老龄人群获得的照料和医疗服务越好，人均寿命越高，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就必然越严重，长此以往，作为产业的养老服务模式似乎只有资金链断裂一种可能。

“这是事实，现在大家都没有答案，我也没有。”王艳蕊说，“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不再去做了。”

过去几年，乐龄在联合多方力量推动“长期介护险”的发展，希望能够通过社会保险的方式帮助支付失能失智老年人的晚年照护费用，这也是一部分养老产业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在多年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当前解决方案：调用类似医保的社会保障系统，让老年人有机会在晚年获得更专业的照料，而不至于为此搭上毕生积蓄。

尽管仍在起步阶段，但类似的社保理念已经开始在小范围内落地。2020 年开始，北京市石景山区——也就是乐龄目前所在的区——将推进失能老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全区覆盖，乐龄的经验，也正在更多地方获得引进和推广。

而对王艳蕊来说，眼前仍是一条有关意义、价值和目标的漫漫长路。在日本照护所实习时，一位高龄失能老人的案例给她印象很深，这位被称为“多米桑”的老奶奶已经 103 岁，无法言语，无法进食，无法行动，也失去了全部亲人，没有人知道她是否还有感觉与思维，但她依然活着。

每一天早上，护理员会把她从床上唤醒，和她说话，把她抱下床，做晨间清洁，然后吃早餐。期间护理员会一直和她讲话。她只能吃流食，用管子推到嘴里，但每一天的流食也会安排好不同的味道。护理员会说：“多米桑，今天我们吃胡萝卜味的早餐哦”——她不会有反应，但这不是让她无尊严地活着的理由。

对她的照料也精确到了每一个细节：帮她清洁过手以后需要涂上护手霜，百岁老人的皮肤如此脆弱，护手霜不可以涂抹，而必须轻拍。每一周，会有另一家专业机构上门来帮她洗澡，她所在的照护所也有能力提供洗浴服务，但出于防范虐待、增强监督的考虑，她的照护计划被分配给了多家机构。

而多米桑已经不再会表达她的感受，也不再可能“好起来”，她的生活依靠着日本社会保险系统维持，这样大的精力和成本投入，值不值得？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个体，作为子女，作为将来即将老去的自己，都终将直面的终极追问：如果无论如何，终点都是一样的，为了过程中的不同而不问回报地付出，值不值得？

这是一个注定不会有统一答案的问题，而对王艳蕊和乐龄来说，考验仍旧接二连三。刚刚过去的这个六月，随着北京疫情的反复，原本已看到一线转机的行业再次遭遇沉重打击，服务中断使得不少机构的资金流状况愈发艰难，一如王艳蕊在 6 月初发布的乐龄 2019 年报序言中写过的句子，“真的是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但在从业十四年后的今天，回看自己为之投入无数精力金钱的养老事业，王艳蕊提起的是那个经典寓言：雨后的沙滩上，一个小男孩把浅坑中搁浅的小鱼一条一条扔回大海，路过的每个人都告诉他，他不可能在浅坑干涸之前拯救所有小鱼。

小男孩回答说：“能救一条也有意义。”

*\* 采访结束后三个月，王艳蕊的父亲终于也住到了她的养老院中。*

## 记者手记

面对王艳蕊的时候我正在空前艰难地直面亲人的生老病死，也因此对于王艳蕊的事业怀有或许更为强烈的理解和共情，在舆论层面，养老现实和大多数老人的晚年境遇并不为人关注，但现实中，从老、到病、再到死，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迅速，那样截然分明。

有一句话或许听起来残酷，但却是真相：在人生的末段失去生活质量和尊严，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注定迎来的命运。

面对形形色色的疾病和不可逆转的衰老，人力所能改变的部分少而又少，或许，选择性忽略和遗忘这一切，甚至是我们大多数普通人会本能遵从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而王艳蕊在尝试直面它。正视这一切，理解自己所能做的终归有限，但仍不因此而放弃努力。

## 读者与社会反馈

是不是可以考虑，譬如前面当志愿者的老人，根据服务质量和时间，自己需要的时候可以减免部分费用，这样降低成本，也能快一点步入良性循环。光靠奉献是坚持不了多久的，一切都应该有回报，包括善意和喜欢。

——微信读者 campsisgirl

最后那个故事是这样结尾的：路过的人告诉男孩，你这样做是徒劳的，根本没有人在乎这些鱼的死活啊... 男孩低头又捡起一条鱼，扔回大海，他说道，但是它在乎！

——微信读者戴菲

如果无论如何，终点都是一样的，为了过程中的不同而不问回报地付出，值不值得？这是一个注定不会有统一答案的问题。也许我们想要的不仅是答案，而是可供选择的现实路径。

——微信读者 Wicky

有时候护工们也很需要被理解和照顾。看到过一些老人对护工拳打脚踢，言语侮辱，或者动手动脚，无理取闹的。但护工面对老人也无法还击。不过后来屡劝不改的老人，那个养老院直接叫子女来把他接走了。保护老人和保护护工一样重要。

——微信读者 kirua

# 王莹：

## “我有权利，被当作一个活着的人对待。”

文 / 竹小淳 编辑 / 谢雯雯 图 / 除另作说明，由受访者提供

### “

临终关怀时常是病人意志、家人意志和社会意志的对抗，很多时候我都听到人说，如果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就好了。

编者按：死亡和临终，是我们极少拿上台面讨论，但又终将会直面的话题。我们是否应该告知家里老人他们真实的病情？是选择激进的方案还是舒缓治疗？当病人意志、家人意志和社会意志互相撕扯，家庭和自我信念受到拷问，我们会怎么选择？

王莹创建了一家“临终关怀”社会组织。十二年来，她和伙伴们参与和见证了超过 8000 个家庭关于临终和死亡的讨论和抉择。这一切的背后，是他们共同的信念：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最后，都拥有不孤独地死去，不被欺骗，保持尊严，和尽量避免痛苦的权利。

毕竟，生命的最后一程，仍然是我们的人生。

依着黄浦江，寸土寸金的上海内环内，塘桥社区颇有些年份了。从六十年代的集镇居民楼，到新区开发时的动迁房，即使是版块内最新的高层建筑，墙体也斑驳了。茂密的行道树下，多的是退休了的本地阿姨和华发丛生的爷叔，热热闹闹。但往小区深处走去，越走越静，越走越缓。楼梯房三楼过道里的公共座椅，信箱里养老院的广告传单，五金店旁的殡葬公司和墓园中介，都在提醒你这是个上了年纪的地界。

捡塑料瓶和硬纸板的大姐从水龙头接来软管，冲洗着翘了边的木柜——“后面五楼的老太太‘走’了，家里人忌讳，我不在意这个，就把东西拿过来了。”

和五公里外的陆家嘴或江对面的新天地不同，在这个社区——如同这世上千千万万平常的社区——里，衰老和死亡是肉眼可见的。而离这个社区里的养老院步行不过三五分钟的浦东公益园，便是王莹和她的团队的日常办公点。

身着黑色连衣裙和厚底高跟鞋，披波浪长卷发，41 岁的王莹时不时用修剪整齐的蓝紫色美甲拨弄着腕

上的手串，一双弯眼总是笑到眯起，似乎在谈论着什么轻松愉悦的事情。

不仔细听谈话内容，很难想象，十二年来，眼前这个上海姑娘，与两千多名志愿者一起见证和参与了八千多次关于死亡的讨论。

### 从汶川到上海

出生于一个普通温暖的四口之家，王莹笑称自己从童年到青年时期都很“乖”。艺术设计专业毕业后，她顺利进入广告行业，几年打拼后做到了客户经理，年收入超过 30 万。生活像一艘行驶在平静湖面的船。

直到 2006 年，王莹被告知，母亲罹患癌症、生存期限可能不超过一年。当时的她“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很深的深渊。”

一直以来，母亲在王莹心中都是传统观念中“贤妻良母”的典型，“很内向、很温和，没什么大主意。”然而，在陪伴治疗的一年多时间中，王莹目睹母亲





▶ 手牵手与伙伴机构联合举办的「死亡艺术节」的“休息一下”体验区



▶ “手牵手”第 24 期志愿者培训中，大家讨论什么是“好的死亡”与“坏的死亡”/“手牵手”公众号

展现出的强大而决断的力量，“觉得重新认识了她（母亲）”。王莹自己也亲历了重症病患家属都可能经历的情绪起伏和抉择拷问。

这份深刻的经历没有吓退她，反而让她心生好奇。母亲病情得到控制后，2007 年，在学医的弟弟的建议下，王莹报名了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培训班，结识了一批新伙伴。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地震爆发。上海市社区心理健康专委会主任刘素珍组建志愿者队伍前往灾区。5 月 28 日，在当时的课程同学、后来的创业伙伴和人生伴侣黄卫平的鼓动下，王莹加入了第二批志愿队伍，赶赴四川德阳灾区。

彼时还没有从业经验的王莹，无法从事心理志愿服务，而是靠着设计的老本行投入了宣传和灾后重建团队。被派往一所乡镇小学的她，用绘画陪伴受灾的孩子们度过了一个不寻常的儿童节。一个小女孩在活动结束后向她跑来，手里捧了一颗鸭蛋：“我知道你们是从上海来的，从那么远的地方和我们在

一起，谢谢你。”在德阳，王莹见证了许多失去和哀伤，也理解了陪伴和信任的意义。

回到上海，王莹的心久久无法平静。什么都好，她和黄卫平都想要做些什么。

在尝试了一段时间面向老人的社会服务后，同伴黄浩提到了成文武教授。时任上海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主任的成教授是上海临终关怀服务项目的先行者，从 2005 年起便在院内试点临终关怀病房。

“当时我们就也是很热血，（和成教授）说你已经做了三年，我们一起来再给你做三年！就这么开始的。”

2008 年年底，王莹与黄卫平联合发起了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简称“手牵手”），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第一家在临终关怀领域进行创新探索、社会动员的社会组织。

三年之后又三年，王莹也没料到，自己竟一做十二年。奔波在家、办公室和医院等场所间，见证衰老和死亡成为了王莹和伙伴们的日常。

## 分床睡、西双版纳和烤串

“通常你听说某个人患上绝症，你对待他的方式就马上会发生变化，就仿佛他马上就要死了，或者已经死了。”王莹说，特别是癌症患者，在确诊后、身体指征断崖式下降前，他们中的不少人还会度过一段并不短的岁月。

“他说这样还不如死了算了，”一位手牵手的伙伴提起自己服务的一名癌症晚期中年男子，患者睡眠状况不佳，妻子担心影响其休息而选择分床睡，这却刺痛了这位男士的内心，“他还没死，他有对情感、陪伴，包括亲密的身体接触的需求。”

实际上，在感知到自己大限不远的时候，当事人的反应常常不会是千篇一律的。有人希望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有人选择拒绝；有人对死亡抱有强烈的恐惧，有人则看起来平静得多；还有人会愤怒，会坚持争取着作为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权利。

把他们当作一个活着的人——“让他们在最后的阶段减少痛苦、保有尊严。”在今年 1 月的一场培训课堂上，王莹面对台下的几十名志愿者学员，反复提到“尊严”二字。

接受理论和案例的系统培训后，志愿者才能进入合作医院的病房展开每周一次的临终关怀服务。这些年来，手牵手团队发展了超过 2000 名志愿者，服务超过 8000 人。志愿者中 95% 为女性，而在社会中，女性也通常被认为是临终人士的主要照料者。

即使受过专业培训，许多第一次进入临终关怀病房的志愿者，往往还是会被眼前的情景冲击，也出现过志愿者受不住崩溃的情况。“我们只是处在（人生）不同的阶段而已，早晚我们也要走到这一步的。”王莹告诉志愿者，“保持自己自然真实的状态，诚实地告诉患者，告诉他自己的紧张、忧虑、或是害怕。”“你这样才是个人。你不是机器，你也要把对方看作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快死的人。”把对方

和自己都当作一样的人，是与病人产生联结、获得信任的第一步。

不少临终病人向志愿者吐露了自己的后悔或遗憾。有的感叹对家人的陪伴太少，总是说要一起旅游却因为忙而一拖再拖；有的懊悔对孩子过于严格，似乎从未表达欣赏和喜爱；有的提及年轻时曾做过的事和未竟的梦想，眼里闪闪烁烁。

如果病人流露了对家人的歉疚或感激，王莹会鼓励他们向亲人表达。因为，死亡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样的表达不但能够帮助病人对于失落、遗憾或者恐惧的表达，同时也将为患者亲人、照料者带来安定。

王莹在服务中看到，不少照料者在承受可能失去亲人之痛的同时，还几乎失去了自己的生活、背负道德和舆论的压力。更有照料者在家人去世后，长时间无法走出愧疚和哀伤。“所以要让家里人明白，



▶ 「死亡咖啡馆」/“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公众号



▶ 病房 / “上海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公众号，花花摄

他们曾经的付出被看到了。这对活着的家属很重要。”帮助活着的人在巨大的悲伤下如常生活，也成了她的目标。

也有临终希望志愿者协助自己完成最后的心愿。王莹回忆起，一位病人在临终前强烈表达了去西双版纳的愿望，因顾虑身体，他的愿望遭到了家人的反对。王莹和团队希望能够帮助病人达成愿望，他们开始一边安抚家属，一边帮病人策划行程、提供专业的行前关怀，甚至联络了途经各地的应急处理部门。然而，在一切准备就绪、启程前的一周，病人溘然长逝。家人对王莹表达了感谢，王莹却还是觉得遗憾。

“通常情况下病人的心愿都是比较小的，”王莹用吃烤串来举例，“他喜欢吃烤串，但是他的身体条件不允许，怎么办？很简单，可以买。”愿望是吃烤串的人，也往往知道自己无法畅快地吃了，但他也许在意的是吃烤串的感觉，或是某个和烤串相关的珍贵回忆。

“烤串只是一个物件，事实上他讲的是一个感受、一个情绪。我们就是来帮助他们找到这个感受。”

“临终关怀时常是病人意志、家人意志和社会意志的对抗，很多时候我都听到人说，如果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就好了。”

于是，从 2015 年开始，除了病床旁的照看陪护、哀痛和丧亲辅导，手牵手团队也更多地转向生死教育，开启死亡咖啡馆、死亡艺术节等活动，为公众创造讨论生命、死亡，分享思考、疑惑和自我价值信念探索的空间。

王莹感叹，“死亡”这个在中国传统中很少被拿上台面的话题，是时候被“前置”了。



王莹与老人



“手牵手”团队在办公室开会

## 挣出的一片空间

上世纪 50 年代，英国护士桑德斯（Cicely Saunders）开始探索，并在 1967 年创办临终关怀机构 St.Christophers' Hospice，旨在为垂危患者在人生旅途的最后旅程中，提供需要的满足和舒适的照顾，为现代临终关怀机构奠定了基础。

“临终关怀”概念在 70 年代后期传入美国，80 年代来到中国。1988 年，天津医学院建立临终关怀研究中心，自此这个词语正式在大陆地区得到应用，后又逐渐延伸至“安宁疗护”。

如今，世界卫生组织把安宁疗护与临终关怀，定义为一种

改善面临威胁生命疾病的患者及其亲人生活质量的方法，提倡“以病人为中心”的照料模式，提供缓解身体疼痛和其他痛苦的服务，主张肯定生命、既不加速也不推迟死亡。

现实比定义更复杂，王莹在起初投身临终关怀实践事业时，并未预料到自己会面临何种挑战。

以志愿者身份在肿瘤医院病房进行服务的前四年，上海市在官方层面并未出台支持临终关怀服务的政策。“那时你想做再多服务，没有医院开（病床），医保什么也都谈不上，人只能去急诊，急诊只能处理一些急性的问题，甚至可能连癌症病人身体疼痛的舒缓都没有办法满足。”

癌症患者晚期至临终前通常会经历强烈的病痛折磨，包括身体疼痛、恶心呕吐、失眠或昏睡、烦躁不安、失禁等。即使并非恶性肿瘤，其他慢性疾病或身体功能退化导致的生命终结，也常会带来类似的痛苦体验。而在很多时候，治疗本身也造成了患者身体与精神上的负担。

想着上海每年 4 万可能因癌症去世的患者，和他们背后的 20 到 30 万家人，王莹憋着一股劲，想要挣出一片空间。她开始找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请他们写提案，也自己爬上网络平台大声呼吁。

2011 年，王莹在公益展台上遇见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并抓住了介绍的机会。“上海经济搞得这么好，但上海人也有苦恼。医生没有（临终关怀）这个概念，没有病床，要继续用很多药、过度治疗的话，其实最后病人是很痛苦的。”时任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也在场，随后组织了相应部门展开调研工作。

2012 年 1 月，上海市开始出台关于临终关怀领域的相应政策，并将此类关怀定名为更易让人接受的“舒缓疗护”。同年，上海市开起 18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舒缓疗护病床试点。

这些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机构都配备了掌握相关知识、技术的医护团队，受上海市卫计委管理和监督。对于希望安度最后时光的末期病人，他们几乎不再使用手术、放化疗、心肺复苏等较为激进的治疗方式，转而选用疼痛管理、症状管理、心灵关怀、家庭支持、娱乐文化支持等方案。

几年之后，临终关怀阶段的支持费用，也逐步纳入上海市居民医保体系。截至 2018 年，上海 76 家医疗机构开展相关服务、200 余家医疗机构注册了临终关怀科，累计拥有超过 900 张机构床位、超过 700 张居家床位，累计服务临终患者 2.87 万人次。

## 前路

据国家癌症中心 2019 年发布的统计数据，2015 年，全国恶性肿瘤发病约 392.9 万人，死亡约 233.8 万人。而在上海，每年因恶性肿瘤死亡人数，占到全年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每 24 小时，便有超过 100 名上海居民因癌症而离开人世。即使在这座临终关怀政策和实践最为领先的城市，病房与病床数量仍旧远远不够，通常只有生命周期不足一个月的病人才有机会入住。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本身待遇偏低、照料临终病人任务繁重，医护人员也相当紧缺。而同时，针对临终者的人文关怀服务，包括洗护、陪伴、倾听、抚慰等目前无法计入报酬。很多时候，照料者的辛劳付出也未得到足够认可。

作为大陆地区第一家专注临终关怀服务的社会组织，已经走过十二个年头的手牵手在整个公益体系内的同路人仍是寥寥。

资金是最大的挑战，但资金短缺的背后还是理念上的抗拒。“我们以前有时候会觉得孤独，为什么没有什么人做这个。有的人就很坦诚地和我们说，说害怕，做不了。”

面向企业的募捐更是难点，相比教育、环保等领域，临终关怀、安宁疗护服务机构并不受到青睐。“企业捐款也还是要讲一个吉祥如意的吧，捐给你们都是死啊死的，不吉利。”王莹笑着解释。目前，手牵手主要依靠个人捐款和基金会维持运转。

2016年，王莹开始在自己的左脸上摸到小肿块，并未在意。两年后，她被确诊为淋巴上皮癌Ⅱ期。“如果活下去，我不希望有有一半脸失去功能；我更不希望死的时候脸上有难看的疤。”明晰了自己的意愿后，王莹选择了姑息治疗。

所幸的是，治疗中最为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这样的共同经历带给我的服务对象很多信任感，我们都是病友嘛。”一边说着，她又爽朗地笑了起来。

创业初期，除了机构没有资金、政策无保障外，家人也并不理解她为什么辞去体面的工作，选择了这条听起来有些“晦气”的路。而到后来自己面临治疗方案选择时，家人已坚定地站在了她这边——她清晰地记得那个转折点，“几年前，我爸的一位同事在电视上看到了我，回头和我爸说，你女儿做的这个事情是积德的事啊！我爸就记下了，回家一想，好像的确是这么回事吧。”

家人的支持与十多年间一线的积累，让她对于这份事业多了一份信心，一份淡然，也多了一份坚定。

如今，尽管资金还是紧张，但上海的政策开口已初步打开，手牵手与同行者和医疗系统也在不停积累经验、刷新认知。

2019年起，手牵手继续与几家上海医院合作，将服务人群从高龄老人，拓展至重症青少年、儿童。上海之外，王莹也在各地尝试培训临终关怀社会倡导志愿者、参与疫情期间的特殊援助和丧亲指导等，在为有需要的群体服务的同时，也希望提高公众对于临终关怀的认知和接纳度。

受疫情影响，“咖啡馆”从线下搬到了线上、现在又恢复了线下活动，“手牵手”一直努力留住这个供人们分享和探索的空间。

十二年的探索和尝试，面临传统和现实的双重挑战，王莹依旧坚信，每一位临终者，都拥有不孤独地死亡的权利，拥有不被欺骗、保持尊严、尽量避免痛苦的权利。每一份手牵手的培训手册上，都印着1976年出版的《癌症护理》的病人权利清单，其中第一条就写道：

“我有权利——被当作一个活着的人对待。”

► 王莹在临终关怀志愿者培训课上



## 读者与社会反馈

为这些临终关怀志愿者点赞。上海又一次走在了全国前面。希望国家除了发展经济以外，还能够在养老、临终关怀等方面出台更多的政策，使得那些拥有善心的志愿者们能体会到政府的支持，不要让他们单打独斗，感觉孤立无援，他们实际上在为政府分担责任！。

——腾讯新闻客户端读者根在山东

特别喜欢这个专辑，每次都被感动到。这些普通人用实际行动在践行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对这个世界的爱。

——微信读者 Bepa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偶然，死亡都是必然，但是每个人都必须明白，好生恶死都是人之常情，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正确面对死亡，本人感觉有尊严的死去挺好的，有质量的活着很好，假如生活没有质量了，痛苦的活着也是没有意义的，感觉缓和医疗真是好。

——今日头条读者用户 18346256983

# 宁宁： 我们最后的岁月是否一定在养老院度过？

文 / 刘希 编辑 / 谢雯雯 图 / 除另作说明，由受访者提供

“

她还是规规矩矩地相信“眼见为实”，把居家养老服务流程打通，拿出实实在在的服务产品，老人和他们的子女能认真考虑是否要购买这些服务。

编者按：在即将过去的 2019 年，你陪伴家里老人的时间是多少天？当下这一代经历过困难年代的老人，大多仍习惯节俭着、隐忍着，当老人孙辈工作越来越忙、老人子女年岁渐长，把老人送去养老院进行照料成了普遍选项之一。可是，打心底里，大部分老人是否真的愿意离开家呢？

我们关注 80 后女孩宁宁，看她如何带着她的 80 后、90 后团队，陪伴、服务那些在生命最后时光里不愿离开家的老人。她决心把“居家养老”服务打磨成商业上可持续的样式，为更多在家养老老人的晚年，送去一丝甘甜，也留下更多从容和尊严。



2018 年 11 月，北京的深秋，北京东城区一家养老驿站通透的大房间里，透光伞、打光灯、摄影道具排开、不同风格背景板布置完毕，咔嚓咔嚓快门声直响，专业摄影师正忙碌着，给爷爷奶奶们拍摄婚纱照、全家福。

“这条裙子是不是肩膀露得有些多？”房间另一头，化妆团队正在给奶奶们化妆、挑服装。奶奶们这时候一半欣喜一半紧张：妆太浓了害怕别人说，太淡了又担心看起来没有精神；一些奶奶对于自己的身材和皮肤还有些“心理负担”，希望挑件布料多些的裙子遮一遮。

“不会不会，阿姨您穿这件儿红的特好看”，爷爷奶奶身边总是跟着几位穿着红色帽衫的年轻人，给老人们出主意、打打气。红色帽衫上印着一个小女孩的头像和几个字，“小棉袄爱老”。

这群年轻人，是王玲力和她带领着的“小棉袄爱老”团队。老人们喜欢唤王玲力叫“宁宁”，小名听上去更亲切。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拍摄婚纱照的活动呢？一开始，想法是由老人们先提出来的。在服务过程中，奶奶们展示过的最古老的结婚证，跟小学“三好学生”的大奖状那么大，好几个奶奶提到，自己结婚几十年遗憾之一就是没拍过婚纱照，“在那个年代没那个条件”。

“女儿是爸妈的小棉袄”，宁宁和她的“小棉袄”团队希望能为高龄老人的晚年带去一点甘甜、一点宠爱。

## 居家养老，无围墙的养老院

75 岁的李奶奶每天清晨起个大早，洗漱完毕后出门买个菜，回家把菜放下就往离家不远的养老服务驿站去，有几位姐妹已经到了，互相寒暄一会，大家便在大房间里开始跳舞、打“八段锦”。

82 岁的张爷爷腿脚已不是很方便，有时约几个好友下下棋，有时就自己呆在家里，想起的时候就打电话约小棉袄的小伙子闫磊来家里和自己聊会儿天，张爷爷高兴地把自己多年的好几大本记账本都拿出来，展示给闫磊看。

家住北京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的高爷爷，觉得身体不太舒服，但孩子都已过花甲年岁，有些还住在顺义和北京外，无法及时回来。身边也没有合适的人选，他想起上次来到家里看自己的“小棉袄”员工张强，给自己留了电话，便打了电话向小棉袄求助。小棉袄马上联系了最近的入户探访员，在 9 分钟内赶到，一起把坐轮椅的高爷爷背下了没电梯的楼，去了医院。

▶ “小棉袄爱老”给老人拍摄婚纱照 / 小棉袄爱老微博



除了这些，宁宁和团队为住在家里高龄老人们提供的服务，还包括约小棉袄社工上门提供照料、陪同外出，也可以通过小棉袄，预约上门修脚、腿部按摩、理发、代取送药、配送老年餐等——可算得上养老服务中的“美团”、“饿了么”，随叫随到。

宁宁希望构筑起“无围墙的养老院”，让希望呆在家里养老的老人们，能够健康、开心、有尊严地度过晚年。

截至目前，宁宁的团队的服务，覆盖北京东城、朝阳近 200 个社区的 4000 余名居家老年人，并为其中 100 多位老人装配了紧急情况一键呼叫按钮设备。

其中，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对东城区高龄独居老人进行安全访视的服务覆盖 2068 人，入户访视 28600 余次；电话问候 63800 余次。对接解决老人需求共计 1397 个。

而团队正在运营的 6 个养老驿站，则是为老人们提

▶ “小棉袄”员工教老人使用手机



供一个下楼后短距离内就能到达的“社区邻里共享客厅”。餐厅、健身房、养护按摩房、专家医疗咨询室，老人可以坐下来喝口茶、向员工学习怎么用手机支付功能，或者是听一场养生知识讲座。

走进小棉袄东城区安化楼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空间设计中随处可见对老年人的细微关怀。走廊旁边有一台专供老人乘用的电梯；窗户边特意加设暖黄色的扶栏，“这样老人会更有安全感”。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厨房中摆放为老年人设计专用轮椅，“老人坐在轮椅上也能方便给孩子包饺子”；浴室里安放助浴椅，“老人就能坐着洗澡”……

“他们（小棉袄）对我照顾特别周到，有他们这些同志在这儿，我们好多东西都解决了，要不我们都不知道找谁去！”，在接受纪录片节目采访的时候，一位 87 岁的奶奶对着镜头，笑眯眯地说。

但奶奶不知道的是，在过去的四年里，为了缝起这件“小棉袄”，宁宁本人和“小棉袄爱老”一直过得很“苦”，在亏损、欠债、营收平衡、再亏损、再欠债中反复循环。

在最困难的时候，宁宁个人要通过跟亲戚朋友借钱，每个月补贴十几万元来维持运营。

有时候，服务在赔钱，接受服务的老人们，还要把人生中积累的负能量，统统“倒”给她和她的伙伴们。

宁宁指了指记者坐着的黄色小沙发，“难受了我就在这里躺会儿”。

毕竟，她还带领着她的团队，有十几号运营人员、8 个全职护理员阿姨，接近 20 位兼职的阿姨的工资等着她发。



▶ 小棉袄”运营的驿站一角

## “衰老是一场可以去争夺领土的战斗”

宁宁从小是姥姥姥爷带大的。姥姥，是宁宁投身养老产业的“初心”。最开始，是 87 岁高龄的姥姥，因腿脚不灵便曾很多年没有下过楼。

后来宁宁给她买了一台轮椅，姥姥对 3000 块的售价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后，竟开开心心地下楼散心、出省旅游去了。去山东探望亲戚后，又来北京看望了外孙女、去了故宫、毛主席纪念堂、天安门……

这使宁宁意识到，即便是传统和隐忍得像自己姥姥一样的老人，帮她打开一扇窗，带给她一些小小的幸福改善，她也会看到这个世界，也会对美好心生向往、对体验心生渴望。

姥姥喜欢去热闹的场合里跟着大家做手指操，宁宁就希望，姥姥住的地方楼下是不是能有个公共空间，带着老头老太太一起做些游戏和活动。但她很快发现，在做类似事情的基本只有卖老年保健品的骗子。

创办小棉袄那年的 9 月，宁宁的姥爷被查出肺癌晚



▶ 小棉袄员工正在陪伴老人做手工



▶ 宁宁在一场小棉袄组织的社区爱老日活动中 / 谢雯雯

期，没有选择入院化疗，只在家里吃中药做保守治疗。宁宁放下手中的事，回家照顾姥爷。

能不能给他在身体疼痛的位置做热敷、洗澡水温要多少合适、该不该吃高蛋白的东西……日常里再琐碎不过的小事，却都在老人生病时变成了难题。宁宁从一开始的惊慌失措，到后来买来了医书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陪姥爷一起试药记下症状……

回忆起陪伴姥爷最后的岁月，宁宁觉得自己是在进行一场拔河。自己能做的只有拼命向自己的一方拉绳，最不理想的情况下也不能松手。“衰老是一个可以去斤斤计较、可以去争夺领土的一场战斗”。

这样的努力争取，并没有办法挽回正在老去的容颜和病入膏肓的躯体，但一点一滴心力的倾注和付出，让老人在某件事情上、某一个小时里相对舒服一些，让他们能更从容、更有尊严地去面对，对他们就有实际意义。

“小棉袄”的业务，也是从带着不愿意离家的老人们在社区里做游戏和手指操开始，逐渐发展到为老

人的生活起居提供帮助，为他们的晚年生活提供陪伴，到为老人的日常健康管理和健康促进提供服务。

然而有美好的心意和愿景，并不意味着就能活下去。

### “未成之局”中的迷茫和清醒

中国养老行业一直流行“9073”的说法——理想情况下，90%的老人采用居家养老方式，在家养老；7%的老人主要采用社区养老，剩下3%为机构养老。政府早已发布指导文件做铺垫，市场资本在观望，入局居家养老的各方人士不少，却很少有谁明确跑出了可持续的模式。

居家养老还是个“未成之局”。

宁宁曾经和一些风险投资机构打过照面。投资人常常客气地反馈说：你这个做得真好。确实挺好——宁宁和小棉袄团队得到了老人们的认可，也经常获得政府和学者的表扬，但到了投资人面前，结果往往是拒绝。

资本对先锋者的情怀大加赞许，但还是保持着冷峻头脑，观望着等待“正确”的入场时机。

“但凡机构的钱进来，他就要看数据，没有人会投入金钱和精力去仅仅实现一个理想，商业上的可持续是必须的”，宁宁找过几轮钱后想明白了。

卖各种产品的人倒找到宁宁，想入股，想当合伙人。宁宁拒绝了，“那人跟我说了一句，‘我保证两年之内绝不跟你的老人卖东西’，当时我就在想，那两年后呢？”

“我还是挺爱惜小棉袄羽毛的”。像就着服务给老人卖东西这事儿，宁宁一直不愿意做，请专家给老人做的健康讲座也不搭载任何营销。

为什么不卖？自己还没花时间和精力去好好筛选那些产品，怎么就能凭着老人对自己的信任卖货呢？

有时候，宁宁也会回想起创办“小棉袄”前，投行上司、同事、前辈劝她的话：“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上来说，老年人就是一个价值逐渐趋向于零的

群体，人类本能是不愿意往老人身上投入的”、“居家养老是一个悖论！”

有时候，她也躺在那个沙发上拷问自己：是不是自己的性格问题，会不会对团队过于挑剔，小棉袄的发展会不会被自己的偏执给“伤”了，“该挣的钱不挣，该借的力不借，最后可能真的会给憋死了”。

不过，宁宁还愿意认输。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居家养老不靠政府强力补贴就做不成，“居家养老是悖论，我认，我认错行吗？”她有些赌气，可她还是觉得，这就是应该做的，她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而且，要以“对”的模式做出来。向老人卖货一买一卖之间就能有30%的毛利，专注做服务更费人力和精力，但毛利只有卖货的一半。

“但凡能这样挣钱，就不会有人去研究模式了，我必须带着一批人把居家养老的模式给磨出来。”

### 未来，为了可持续的模式

如今，宁宁依旧欠着债，居家服务提供上还是在亏损，小棉袄创始团队最亲密的几位“战友”也暂时告别离去。“有伙伴怀孕了，需要轻松点的生活状态，还有几个人也走了，这些人是最在乎的。”少数在资金上支持和帮助过宁宁的朋友，也终于在今年决定不再投入。

她需要为此前自己对算账算钱的“不敏感”，补交不少“学费”。这迫使她成长，她下定决心要退出其中一家养老驿站的运营，减少亏损；也开始认真地测算、测试商业模型，更商业地与第三方专业服务提供商谈合作分成，更认真地面对投入、回报和产出。

眼下，她瞄准了一处社区做试点，想要把居家养老服务的“账”算明白。一个月 1000 块、3000 块、6000 块的“服务包”，分别能让老人在家里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一个社区需要有多少老人愿意买单、服务力量如何组织才能不亏损、实现可持续运营？

“这个服务包里面，健康管理部分包括定期的身体指标检测、营养食谱的制定、按摩康复、专业护理，居家支持包括清洁打扫、修脚理发等等，陪同出行包括……让老人在家里享受到在养老公寓里的全面和专业的照顾！”

她还是规规矩矩地相信“眼见为实”，把居家养老服务流程打通，拿出实实在在的服务产品，老人和他们的子女能认真考虑是否要购买这些服务。

讲到这里，宁宁眼里终于闪过一丝兴奋，前方的路似乎又出现一处亮光。

“如果居家养老的服务模式能成，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不是一定要离开家，住到养老院里不会是唯一的选择，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像宁宁姥姥一样，当下这一代经历过困难年代的老人，普遍习惯节俭，或许一时还难以接受为养老服务买单，下一批老去的人，有更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于是，很多人告诉宁宁，等这批 70 至 90 岁老人去世之后，下一个时期的养老市场就会好了。

“可是你能等吗？”社会变更的车轮在向前碾压，宁宁更愿意相信，社会和时代的进步，是“等”不出来的，也不应该只是“看准时机入场”。

“我就是理想主义，你知道这怎么改吗？改了就真的好吗？”饱受现实煎熬的她，习惯性地一边怀疑着自己，一边又执拗地做着自己。

市场在变化，人也要往前跑，她知道，不管行业如何，自己必须继续向着心中那个养老图景跑。



## 读者与社会反馈

这和《Being Mortal: Medicine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中文译本《最好的告别》）所描述的例子和困局很相似，不知道宁宁是否有读过，或许能从其中找到些许共鸣和答案。

——微信读者 Paula

同是走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人，这一路太难，但是不忍心放弃，一起加油打气。

——微信读者 Emma Eu

加油！其实不光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年轻一点的爸妈辈也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养老院。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尖锐的。有理想有情怀的人来引领这个市场，才能让它从开始就能走得更好和更远。谢谢你的坚持。

——微信读者 Jun

我是 90 后，姥爷和母亲相继去世后我对养老有过很长时间的思考，也跟身边的同学沟通过，虽然是年轻人，但我们都不愿意让自己的长辈或者自己在养老院度过晚年，为养老服务付费是愿意的，也求之不得。但小棉袄商业模式的打磨，营收之间、情感和理智之间，是必须要平衡的，否则组织活不下去，初心熬不了多久的，因为不仅老年人要生活，组织的员工和创始团队都要生活……

——微信读者 Sanny

这个社会缺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微信读者海堂有海

宁宁，你好！看了文章，真的好喜欢你！因我是一位做了十五年公益事业的老人。特别是带头人，首先要知道做公益的人也要吃饭穿衣，随着社会的发展，公益人的生活水平也要提高，否则，你反而成为需要帮助者。关键是你要学会整合社会资源，发展你的事业！

——微信读者雨露（南京博爱 俞素琴）

退休后身体健康，生活能够自理，在哪都能养老，而且就目前整体看七十岁以下只要健康最多只能称为退休生活。养老，既然谈到养字，那一定是需要后人有一定的帮扶才能生活，都是独生子女，如何居家养老？！放下工作养不起老人，放下老人愧为人子。

——今日头条读者 MayLi1901

# 崔澜馨： 重症儿童救助：钱之外， 还缺什么？

文 / 谢雯雯 编辑 / 张希蓓 图 / 除另作说明，由春苗基金会提供

“

专业要求和门外排着长队的患者造成的工作压力，决定了医生不是、也不会是那个能够在此时安抚情绪、舒缓焦虑的人，这期间巨大的交流鸿沟和情感空白，成为医务社工工作的发轫。

编者按：因为一群本有治愈希望，但却限于家庭条件看不起病的孩子，她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有人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随着在重病儿童救助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现实逐渐浮出水面：钱能解决很多问题，但只有钱，仍然远远不够。

十年前，崔澜馨选择了另一种人生，辞去企业的工作创办了春苗基金会。从帮助经济困难家庭完成治疗，到协助患儿家属与医生进行沟通、进行心理支持，再到支持这些患儿家庭在治疗完成后平稳“着陆”，春苗想要的，是为重病阴霾下的患儿和他们的家庭，提供一种更为柔和的医疗体验。

北京阜外医院的新门诊楼大厅里，郭素杰接待了自己即将服务的新家庭。

这是一户特殊的家庭，他们的宝宝刚刚出生不久，但孩子的出生带给他们的并不都是喜悦。孩子还在妈妈肚子里，就被省里医生确诊了复杂先天性心脏病，出生后的预计治疗费用高达十万元，而且手术需要尽快尽早地，到北京的大医院做。

家里靠种苹果营生，全家一年收入也只有 5000 块，10 万实在不是小数。孩子呱呱落地的同时，奶奶开始在村里挨家挨户地借钱，10 块、20 块……带着厚厚的一沓借条，一家人从家乡山西赶到北京，但到了医院要做什么，要找谁，一辈子务农的一家人仍然毫无头绪。

郭素杰是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的一名医务社工。类似这样的家庭，她一年里迎来又送走了 60 多个。

## 更柔软的医疗

医疗系统中，医生专注诊断和治疗，护士专注康复护理，那之外还有患者和家属。“医务社工就像一个缓冲，”春苗基金会的医务社工主管安骥这样总结，“让我们的医疗更柔软一些。”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社工，医务社工专注于解决“医疗相关的社会问题”，包括医生、患者与主要照料者在医疗和康复过程中产生的心理、社会、经济、家庭等问题。除了入院和出院信息资源，医务社工还会辅助患者家庭适应医院环境，帮助对接基金会和捐助渠道，作为情感支持角色陪伴治疗过程。

而新生儿缺陷，特别是其中最为高发的先天性心脏病问题，又是十分特殊的一类：在当代迅速发展的心脏病诊疗技术之下，许多此前被认为无药可医的复杂心血管病如今都有了较高的治愈可能，只是它们往往要求在孩子幼年甚至婴儿期完成手术，虽然全国各地的医疗水平都在快速地提升，但是很多儿



童先天性心脏病的最终诊断和治疗，仍只能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全国医疗资源中心进行。

针对复杂先心，春苗接到的个案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外地赴京求医的家庭。许多家庭有钱和资源方面的问题，而即使对钱不是问题的少数家庭来说，赴京求医也仍然是一条漫长而痛苦的道路。

去年冬天，郭素杰接手了一对从西安来京的母女。当时两人已经来京一周，虽经妈妈四处筹措，手术费仍差四万块，阜外医院床位永远紧张，不可能长时间地等下去。妈妈在病区门口崩溃大哭，不愿让女儿出院。医生实在没办法，在这个时候找到郭素杰。

她一边着手了解患者家庭情况，一边联系基金会和医院。“我们这里有几家救助资源，您这边再给我们一个下午，再给她一点点时间，可不可以？”

另一个案例当中，小患者的诊疗费用原本预计在 20 万左右，患者家庭事先准备了 30 万资金，没想到孩子术后胸腔积液严重，在重症监护室的单独病房里呆了足足四个月，不止耗尽了资金，也击溃了父母的情感和承受能力。

忧心忡忡的护士找到春苗，希望能够做些什么。春苗督导组通过四格画游戏尝试对患者家属进行心理支持。起初，美院毕业的孩子妈妈一张都画不出来。后来经过引导，孩子妈妈终于画出了图画，但画面中甚至不允许自己的丈夫出现，“我只有我儿子，我没有儿子不行！”

“她（孩子妈妈）都快把我逼疯了……以前从没吵过架，来北京天天吵，看我不舒服，”孩子爸爸告诉郭素杰，“幸亏有你来当她的‘出气筒’。”

来自西安的那对母女在手术不到两周后顺利出院，回到了家乡，曾困守重症监护室四个月的小男孩林林的治疗过程则持续了七个月之久。如今，两个家庭的孩子都已恢复健康，而他们，只是春苗基金会医务社工们每年经手案例的百分之一。

## 要救的是人，不是病

根据国家卫生部发布的《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我国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约为 5.6%，这一比率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对应新增病例的实际体量不可忽视——我国每年新增出生缺陷儿数量约 90 万例。这意味着，几乎每 30 秒就有一名出生缺陷儿呱呱落地。同时，国际研究显示，出生缺陷儿中约 30% 在 5 岁前死亡，40% 造成终生残疾。

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小患者、患者家庭和整个社会，都在承受难以磨灭的伤痛与可观的经济成本。

安骥描述，在门诊听到医生的诊断后，大部分家长的反应都像是被下了“判决”。专业要求和门外排着长队的患者造成的工作压力，决定了医生不是、也不会是那个能够在此时安抚情绪、舒缓焦虑的人，这期间巨大的交流鸿沟和情感空白，成为医务社工工作的发轫。

而对于支持和培养着医务社工的春苗基金会，问题仍非如此简单。

在工作中，医务社工并不是在“单打独斗”，一线积极服务的背后，离不开庞大的系统性中后台的支持。这包括筹款，包括对每一位医务社工大量的基础理论、临床技巧的专业培训。而每一例个案从接手到完成，也涉及中后台详细的档案记录反思，和基金会对于一线社工的专业及情感支持。

郭素杰回忆起，当来自西安的妈妈在医院门口崩溃大哭、孩子没做手术就要出院，即使是接受过专业培训的自己也几近崩溃。她找到 21 年社工经验的督导为自己做心理辅导，“会给你一些肯定，也可以倾诉和发泄。”

而对案主的需求调研和服务经历的反思、分析，也催生了新的认知和实践。春苗发现，在医治资金救助渠道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许多家庭在出院后面对大部分支持的终结，“治好了，你走了，它可能是

一个切断式的。”很多孩子出院后因照料不当，返病和返院的情况多发，来回折腾。

要救的是人，而不是疾病。于是，服务延伸到了院外和出院后。春苗的一线社工开始向家长讲解护理知识，社工和志愿者团队也继续为案主链接社会资源，如对接公益律师、协助申请当地的房屋改造政策等，希望通过出院后仍在继续的支持力量，帮助这些患难家庭平稳“着陆”。

除了复杂先心患儿，春苗还在救助家庭有困难的早产儿，家庭护理条件有所欠缺、或是家长缺乏护理能力的孩子，可以去到位于顺义的春苗儿童成长基地暂住。基地的全职护理阿姨会指导家长学会如何照料。

2019 年一年，春苗与北京阜外医院、八一儿童医院合作，完成了近 600 个复杂先心儿童、早产儿的救助个案。但对比新生儿缺陷儿和重症儿童总数，一个机构的救助仍是杯水车薪。



▶ 春苗顺义儿童成长基地一角 / 谢雯雯



▶ 正在与案主沟通的安骥



▶ 春苗组织 2019 年度六一活动，病区里出现了欢声笑语 / 春苗月刊

## “人世间该有的东西”

全心投入公益领域之前，春苗基金会秘书长崔澜馨曾在河北老家行政事业单位工作过。由于不甘心过这样被安排好、一眼就能看到底的人生，她来到北京，做过销售、行政管理，创过业。她心思细腻，善于洞察他人感受，很容易跟人建立起信任关系，后来被老板派去处理大客户关系。那时的她，工作做得风生水起，深受老板信任，心里想的只是怎么把“份内之事”做好。

2006 年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她认识了留美医学博士刘东。刘东邀请她参加公益活动，刚开始她并不感兴趣，也拒绝了两次。后来她第一次跟着刘东医生去到一所孤残儿童救助寄养中心，直到见到了孩子们，崔澜馨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局促地等在原地，被刘东拽了一把到孩子面前做了介绍。

“你摸摸是不是挺凉的呀”，她看到刘东医生给孩子做心脏检查，他双手捂着听诊器对孩子说：“这个（听诊器）头是金属的，两根管子是来听你心脏

跳动的声音的。我捂一捂可能会好一点，但等下放在你身上还是会有点凉，但是你不要害怕。”

这番话之所以给崔澜馨留下深刻印象，源于崔澜馨小时候的体验：小时候学校里体检，她最不喜欢的就是医生直接拿着冰凉的听诊器，一下子贴到皮肤，让她心惊一下。“他们不像是有些人那种作秀的状态，而是真正在做这件事”，在结束回程的车上，崔澜馨开始不停地问刘东各种问题，在国外做医生时的经历，怎么想到加入义诊，还有哪些活动可以参加……

后来，她从志愿活动的参与者转变为组织者。生活似乎比过往“有了一点不一样的色彩”。两次、五次、十次、一百次活动……她逐渐接触到那些真的看不起病的小孩。

当时她还在企业里工作，很多时候，都会让她觉得自己在“两极世界”中撕扯：一个尽头里，身边一些人一晚挥霍掉无数金钱，奢侈品、大牌包包

傍身，信奉“‘包’治百病”；而在另一个尽头，妈妈爸爸带着孩子跨省求医，在医院走廊过夜。

在一次救助中，一个小朋友不幸离世，崔澜馨怎么都无法接受，她觉得她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2010 年，她辞去企业工作，与刘东一起创办了春苗，希望聚集更多的人和资源进行救助。

逐渐地，一批伙伴被汇聚在一起。

春苗位于顺义的儿童成长基地的护理阿姨多是周边村里住户，拿着不高的薪水、为重症孤儿提供 7x24 小时的服务，两班倒。小宝宝们病情危重、护理难度大，需要时刻观察和精细化护理，夜班阿姨是不能睡觉的。问起坚持的理由，几位阿姨笑答是真的喜欢小孩子，把这些来到基地的小朋友当成了自己的小孩。

而奔波于办公室和几家合作医院之间的医务社工们，到手的薪酬仍难以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与普通水平的白领相比。是什么让他们决定继续？

“你知道吗，这才是人世间该有的东西”，做了两年医务社工以后，这是郭素杰的答案。“你可以给他们一点关怀的时候，那真的不是钱可以解决的问题。”

她提到自己能够帮到别人的欣喜，提到社工小伙伴和督导的互相学习与支持，提到倾注了心血、专业又精细的社工档案，提到患者家长在雨天对她的一声问候。

还有在人心里种下的一颗种子。“那是咱们还穿夏装的时候，”郭素杰望向身边的伙伴，腼腆地笑着，“一个受助的孩子的爸爸，还清所有债务之后，挣钱了，然后捐到基金会，说拿这个钱去帮助更多的人！”

## 未来会是什么样？

“爱与专业”这个崔澜馨提到频率最高的词组，也在这群伙伴的身上和经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作为秘书长的崔澜馨也在十年里不停见证着志同道合伙伴们的加入，还有离开。

“在春苗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合伙人加进来。春苗在医务社工这个领域深耕发展，最需要人的时候，杨雅就‘嘭’蹦出来了，以合伙人身份加入了我们的团队。”

崔澜馨口中的杨雅是拥有 14 年经验的资深社工，现在负责整个项目部，特别是在医务社工服务的升级——从帮患者家庭“找钱”，发展到链接各类社会资源和危机干预、心理服务；从服务北京几家医院的患者，到为外地伙伴做经验输出、资金支持。

“我们也有一个员工，特别想在我们这里继续做，他从银行跳槽出来在我们这里做了不到两年，然后他爸爸就觉得他做的不是正经工作，后来因为这件事，他还约他爸爸跟我谈了一次。”崔澜馨于是耐心解释：春苗基金会是一个正式的机构，医务社工也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正式工作，社保五险一金什么的都有，但的确不是一个可以发大财的工作。

但到最后，这位爸爸还是认为这就不是一份正经工作。迫于家庭压力，那位员工最终选择离职。

面对这种情况，崔澜馨说道：“除日常运营和管理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和理事长一起，希望能够提升大家的待遇，（这样）大家不仅能让自己的生活好，可以养家，还可以更有尊严、有信心地从事这份工作，团队成员可以更稳定、机构也更可持续发展。”

“我们要去跟更多人讲，让大家看到他们（医务社工）的价值。”她总结。不仅是公众，大部分医疗体系内部人士对于医务社工的概念和作用也存在认知偏差。

早在 2012 年，上海就发布地方文件《关于推进医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实施意见》，是全国首个在官方政策上扶持医务社工部门的城市。设置医务社工部门，成为上海三甲医院评级的指标之一。

2018 年，上海全市拥有医务社工全职 156 人、兼职 409 人，所有二级以上医院全部配备了医务社工，实现每 400-500 张床配备一名专职医务社工。

这一大陆地区最高标准，仍有巨大的发展需求和空间。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美国麻省总医院 800 个床位配备了 80 名医务社工，波士顿儿童医院则有 150 名。而在台湾地区，一般医院要求每 100 个床位配备一名医务社工，儿童医院、肿瘤医院、老年病医院这些更可能出现社会和心理问题的医院，要求更高。

北京和其他城市目前还没有关于医务社工的硬性政策规定。但回想入行十年，崔澜馨仍能看到医疗系统的积极发展。

北京之外，随着地方医疗水平的提高、医师多点执业的规范进一步制定和实施，使得支持大城市外的机构进行本地救助成为可能。“医保政策、风土人情，人文等等各个方面，北京和云南肯定是不一样的。”崔澜馨解释，如果春苗等经验丰富的机构可以协助和扶持本地的机构去做，就能有更多的家庭得到更本地化的服务，未来服务也更可能拓展到其他病种。

认知偏差仍是推进的主要困难之一。“这些必须得是当地机构小伙伴和当地医院新生儿科主任他们特别想做，我们才有机会去做。”春苗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先锋”机构和医院，目前已经定下了一些试点，“第一站是云南，第二站是贵州，第三、四站应该是广州和成都。都是与当地的社工机构或儿童服务机构一起合作。”

为减少医疗系统中对于医务社工的认知偏差，春苗还尝试与当地的卫健委等部门合作，组织医务社工的巡回演讲，“让大家看到未来是什么样子的，让

他看到希望，你只有看到别人成功的模式，你才能知道这是不是可以实现。”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这个项目我们既要脚踏实地，又要远望天空。”她这样总结。话题最后，等电梯的时候，崔澜馨又无奈地提起，“前几年好多大学都把社工专业给撤了，（可能大家）觉得不赚钱，没前途吧。”

“那怎么办呢，春苗可以做什么事情吗？”

崔澜馨按了电梯下行按钮，“所以希望你们媒体多帮写一写啊”，她笑着回答，那之后便是一阵沉默。

认知和政策的撬动并非一日之功。作为医务社工在中国的长期探索者之一，她和春苗同事总是互相打气，“现在开始就是有意义的，如果你知道了但不开始，那就是没有意义的。”



▶ 春苗与当地机构合作在昆明市儿童医院开设“爱苗社工站”。

## 读者与社会反馈

八百多个床位才配备一名医务社工，其中供需之间的巨大缺口显而易见。这足以证明，很多医院对这一职业的需求量有多大。未来，为了对广大患者提供更加人性化的医疗康复服务，呼吁咱们身边的社会，多多培训这一供不应求的行业人员，让大家优中选优，持证上岗。我们有理由相信，不远的将来，医务社工这一职业必将大显身手，大有可为。

——微信读者陈星

做医疗社工真心不容易，只是岁月静好中的人们不大会想这些……怎么说呢？人生苦短、所以要做有真正意义的事，坚持吧，为了可爱的孩子们。

——微信读者晓敏

一群可敬的人。

——今日头条读者用户 7547584877114

你好，春苗什么时候能来长沙，有没有机会来，好期待哦，我自己是一名早产儿，不过今年 18 岁了，不过有点遗憾是一名脑瘫患者，现在坐轮椅。

——微信读者福娃

我们救的是人不是病、让我们的医疗更柔软一些。这些话让人暖暖的！

——微信读者难得糊涂

# 05

## 公益支持

许多社会问题之复杂和顽固，常常是由于其已深嵌社会、权力的结构和系统当中。这并不是一个“英雄”或几个就能够修复与解决的。

争取社会各界更广泛的理解与支持、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将有效助力社会创新和社会问题的解决。部分社会创业家便致力于这样的工作——他们有人记录真实的社会痛点、帮助弱势群体发声，有人引导人与人之间的非暴力沟通与协作，有人通过建立和壮大社群支持社会创业家的成长。虽不身处具体社会问题解决的一线，他们的努力同样重要。

17 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 蒋能杰： 那个守在豆瓣上 私信观众的独立导演

文 / 谢亦欣 编辑 / 张希蓓 图 / 除另作说明，由受访者提供

“

我就是个记录者，我就是个发现者，我没那么伟大，我改变不了至少我可以让更多人去看见去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至少记录历史。

编者按：这是一次很早之前就已完成的采写，但因为疫情，因为修改，也因为一直试图寻找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它的素材与初稿在我文件夹里躺了数月之久。没有想到，因为一次蝴蝶效应般的网络浪潮，我们的主角突然收获了此前十年都未曾有过的关注与掌声。

这或许是意外，也或许是偶然中的必然，这样的人，从来都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他叫蒋能杰，一位致力于拍摄公益题材的独立纪录片导演。面对凋敝、断裂和遗忘，一个人能改变什么，他的镜头又能带来什么？蒋能杰没有答案，但事情仍需有人去做。

“作为创作者，我的任务基本完成，公益题材，只有传播才有价值，才能更好发声。”一夜之间收到无数消息，蒋能杰在自己的微博上这样说，“若能推动他们境遇改善一点，也不冤多年的坚持。”

“中国独立纪录片的问题：没人看、难上映、没钱赚，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2020年3月30日，有人在豆瓣电影的短评页面留下了这样的文字。电影名叫《矿民、马夫、尘肺病》，在这样一个毫不特殊的日子，这样一部题材艰苦的现实纪录片登上了豆瓣热门电影榜单。

肺炎阴影笼罩下的日子，人们通过这部片子认识到另一种受伤的肺。片子带着粗砺的真实，描绘了三幅受难图景：矿难与矿民，马夫与家庭，尘肺病患者与死亡。

过去没有人要看这样展现痛苦，也带来痛苦的片子，短评中“独立纪录片”遭遇的问题，这部《矿民、马夫、尘肺病》的确三者全中——默默无闻，无法上映，更没有宣发资金，它的导演采取了一种仿佛天方夜谭的方式，他寻找每一个在豆瓣标记“想看”的人，然后加关注，发私信，豆邮内容是那部片子的网盘下载地址。

这位导演，名叫蒋能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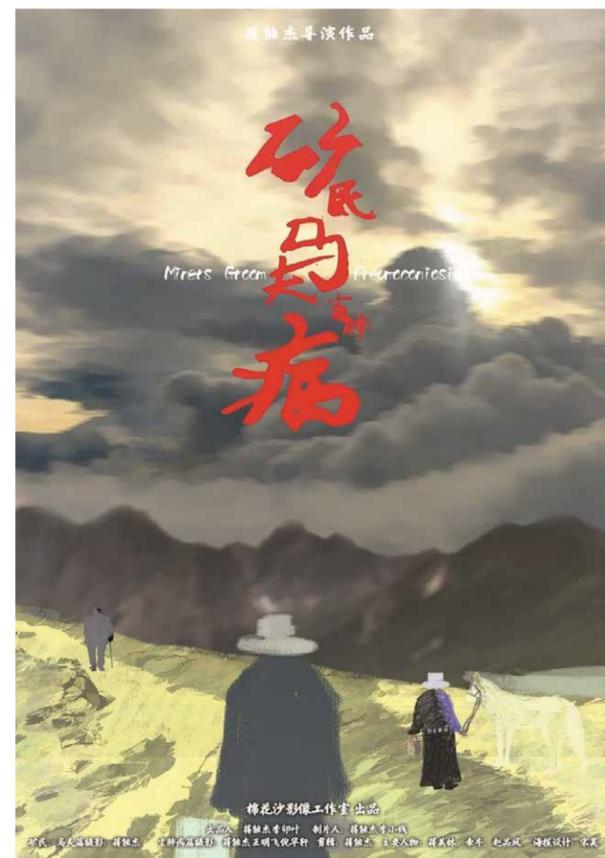
从开拍到杀青，这部成片仅有82分钟片子花费了蒋能杰十年时间，十年过去，他镜头下的主角们有些已经长大，另一些则已告别人世。

而十年对一个导演来说意味着什么？可能是十四部影片叠加的轨迹，可能是乡村与城市间徘徊的时间，或许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不断权衡，也或许，仅仅浓缩于他本人习惯使用的介绍自己的方式：

“我是蒋能杰，拍纪录片的，湖南人。”



蒋能杰



《矿民、马夫、尘肺病》海报 / 棉花沙影像工作室

## 村小的孩子

蒋能杰与镜头之间的故事，最初从一所村里的小学开始。

2001年起，全国掀起了撤点并校的浪潮，2004年，村中开办多年但无力维修的村小学也难逃一劫，最终宣告裁撤，从此村中的孩子们只能到十公里外的镇上读书。绝大多数家庭无力支撑这样的求学路，2006年，村里集资在一间民房里开办了一个“临时私立学校”，供初小的孩子们上学。

村中劳动力多半外出打工，村小当时在读的 22 个孩子里，17 个是留守儿童。几年后，村小的孩子数量翻了一番，老师仍只有一个，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在村小读完低年级，然后也开始跟着哥哥姐姐一起，在清晨六点挤上前往镇里的破旧卡车。

湖南省新宁县一渡水镇光安村，这是村小所在的地方，也是蒋能杰自己的故乡。

2009年夏天，刚刚大学毕业的蒋能杰带着他的镜头回到村里，将注意力定格在了这些孩子身上。黑白颠倒的三个月后，以对孩子的访谈为素材的第一部纪录短片《路》终于出炉，作为处女作，这部片子不久后入围了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但在此之前，蒋能杰本人却在北京耗光了有限的积蓄。

应聘，辞职，再应聘……为了筹集拍摄资金，也为了自己活下去，找工作是当时的他所能想到的唯一解决方案。依靠《路》的成绩，蒋能杰进入北京一家大型影视公司，却没有离梦想更近一步——村小仍在召唤他，不断回村继续拍摄的直接代价，就是不断地辞职。

2010年，因为终于得以重建并且重开的村小学留不住老师，蒋能杰辞掉北京的工作做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老师，回去代了三个月的课。2014年，这段代课岁月、最初《路》的素材与此后继续跟拍的三年

时间，在蒋能杰的电脑里拧成了新作《村小的孩子》。同年九月，《村小的孩子》在法兰克福中国电影展首次放映，荣获观众票选一等奖，二等奖是国内热门电影《钢的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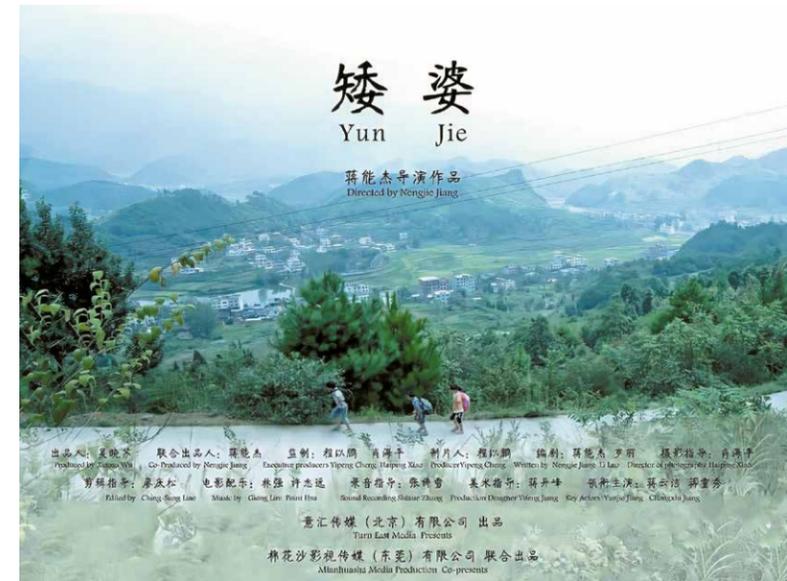
执着于村小并非偶然，在撤校风波之前蒋能杰也曾就读于这所学校，他的母亲也曾是第一代打工大潮中的一员。后来的作品《加一》中，名叫加一的小女孩在父母离家那一刻没有出门去送，而是自己一个人躲在被子里默默哭了起来，蒋能杰小时也曾有过类似的时刻，只是或许没有那么伤心——那时的他，已经比镜头下的加一大了不少。

那时候每年节假日的日子，他就开始数手指头，数完了也就盼来了。“只是没过多久我就又想到要数手指头了”。

而每一次母亲离开，父亲在旁边扛着包，三姐弟就那么在门口呆呆站着，目送母亲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去。为什么告别总是沉默，多年后蒋能杰才有机会得到母亲的答案，“不敢回头，不敢说话，一说话眼泪就出来了。”

从小成绩不错的蒋能杰在长大后考上了大学，读了设计专业，但对于同样属于村小的孩子们，这并非大多数人的可选项。2009年刚读初三的范魏媛在《村小的孩子》里曾说，“没希望（继续）读书，送不起，再便宜也念不起”，同一年大学毕业回到村小的蒋能杰则执着地将这个问题一遍又一遍地抛给镜头前的每一个孩子：“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打工。”这是每一个孩子的答案。



► 《矮婆》海报 / 棉花沙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 不同寻常的路

从每一个憧憬着外出打工的孩子开始，蒋能杰的镜头开始延伸向更深的地方。《村小的孩子》当中那些清晨六点去往镇小学的孩子，大多数人的终点将止步于 2015 年作品《初三》；2009 年《路》中刚刚六岁、尚且满脸懵懂的小女孩云洁，则在 2015 年成了新作《矮婆》的主角。

来来去去，相似的是命运与困境，不同的是每一个人的人生。

“他没成长起来，他就马上要做他喜欢的事情。”刘文良是《晚安广州》节目的导演，他看完《村小的孩子》掉了眼泪，立马邀请蒋能杰上了一期节目，之后两人成了朋友。

他把《路》形容为蒋能杰的敲门砖，他敲进去了，却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而且还走成了。

棉花沙影像工作室成立于 12 年，是蒋能杰真正独立的时刻。工作室最初设在光安村，只有他一个人。“资金是所有电视制作人员要面对的问题”，谈到钱，刘文良叹了口气。

这当然也是蒋能杰的问题。但他的心态是：“有钱是有钱的玩法，没钱是没钱的玩法。”

► 蒋能杰与村里的孩子在一起



► 《村小的孩子》海报 / 棉花沙影像工作室



► 2009 年接受采访时六岁的云洁 / 视频截图





▶ 龙运松老人在《龙老》中 / 视频截图

“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他的玩法。人力成本被最大程度地压缩，拍、剪、上字幕，通通都由他自己来。长期大量的工作，让他的手指落下了疾患，提一下沉的东西就会觉得很痛。13 年工作室才招了第一个人，此后陆陆续续又进来两个。其中一个他认为还不错的也回了乡村，开始做纯商业的拍摄，“也没怎么做产品了”。

而养活自己的问题始终严峻。除了持续不断的纪录片取材，棉花沙工作室也接一些商业项目，其中一次，一个拍摄农村空巢老人的项目找上门来，要求拍拍能反映这些老人生活状态的照片，再把照片拿去工业区和高校展览。

蒋能杰很快意识到，同为弱势群体，老人比小孩更边缘、更容易被忽视。当地的空巢老人一位位进入了他的镜头，除了摄影，也做口述史，有些人在离开镜头之后依然孤独，也有些人在离开镜头之后真的离去了。

展览结束后几年，一些亲属还会因老人过世而找上

门来索要遗照。这是蒋能杰也没想到的用处：至少还能他们的家人提供一张照片。

而蒋能杰因此开启了另一条探索之路：镜头所能触及的不仅有孩子们的未来，也可以有老人们的过往。光安村几位曾参与过抗战、如今只能面对空巢的老兵成了蒋能杰的第一批拍摄对象，抗战老兵系列纪录片拍摄计划于焉发起。

2013 年，蒋能杰首部关于抗战老兵的作品《龙老一生》问世，2015 年又完成了同系列跟拍续集《龙老》，而此时，镜头前的主角龙运松老人已经离世。

这位前中国远征军军人晚景凄凉，但问题却又并非生活窘迫潦倒所能概括——蒋能杰在拍摄者手记中记下了令他震撼的细节，其时国家低保与民间扶助的资金已够老人在农村正常生活，但在问及老人有何心愿的时候，这位终生未获承认的抗战英雄回答：

“去死，希望现在就去死。”

## “我就是个记录者”

从留守儿童，到孤独老人，不同的境遇指向同一个原因，但答案却非某一个人所能承担。农村发展问题是太大的问题，想要通过镜头直面现实的人，不可避免会首先遭遇对自身意义与价值的拷问。

沉浮十年，蒋能杰对此给出了一个相当保守的答案：“我就是个记录者，我就是个发现者，我没那么伟大，我改变不了至少我可以让更多人去看去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至少记录历史。”

对于创作，他拒绝去做任何预设负担的考量。纪录片的价值不与它的票房挂钩，那是发行商需要考虑的事情；观众有多大的共鸣，能在公益上奉献怎样的力量，他同样控制不了，那终归是“他们做的事情”。“我没那么厉害，我虽然拿个机器，我自己都是个弱势群体一样。”

不是没有过通过镜头改变些什么的美好愿望。《路》拍完后，湖南卫视注意到影片中孩子上学交通不便的问题，曾经送给村里一辆校车。但是当地道路太窄，安全问题难以解决。再后来，路修好了，当地政府却无法负担校车司机和汽油的开支。校车终究被闲置。

而创作本身，则在这样的不断承压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越来越强烈的孤独感与越来越高的自我要求。

2018 年，还在读大三的许睿用微信联系了蒋能杰，希望来他的工作室做实习生。“他非常的猛，我觉得他的问题非常的猛”，许睿指的是《村小的孩子》中那个一次次得到了同样答案的问题——“长大后你想做什么？”

想象中总是容易，做起事来才发现纪录片拍摄的难度超出预期。实习期间许睿曾领过去村里拍摄素材的任务，恰好遇到一个小女孩站在田边耕地的草上，

唱歌。许睿悄悄打开摄影机。画面中女孩兀自唱着，旁边是她耕地的奶奶。过了一会他又关掉视频，然后录声音。

事后再看这段内容时，蒋能杰和许睿都感到很可惜。风太大了，舔着耳麦过去，呼呼的风声在空阔的环境中打转，把歌声压了下去。蒋能杰问他，“你为什么不去让她再唱一遍？去一个安静的环境中，离得近一些。”许睿对这种意见保持沉默，只是简单回了一句，对，我当时没有做到。

“你让一个养成习惯三十多年的人，做了十年导演的一个人，去改变他的想法，那是不可能的。”这个大男孩感受到导演在工作中的固执，有时甚至觉得他过于苛求，工作中的蒋能杰并不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领教过这一点的不止他一个。

2015 年以小姑娘云洁为主角的《矮婆》是蒋能杰的第一部剧情片，出于爱才之心，来自台湾的知名制作人廖庆松和林强分别接手了剪辑和配乐工作。两位都在各自领域拿过金马奖，但涉及片子，蒋能杰仍旧固执己见，只做自己想要的风格。“上面写了我的名字，蒋能杰导演，那么就接受一个我的风格，我讲故事的方式，能触碰到你我也很高兴。”

而许睿理解并认同着蒋能杰的工作。“太多人干预他的创作了，有些片子还不能上映不能播放，他非常压抑的。”他称呼蒋能杰为“我导演”，沉默了一会儿，又强调，“我导演，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

毕业后，许睿留在棉花沙做了摄影导演。

## 等待故事发生变化

十年间，蒋能杰在村小做了五次统计，留守儿童的比例一直占到 75% 上下，很多孩子的父母在他们不到一岁时就出去打工，彼此的形象正在他们之间逐渐消失。

《村小的孩子》里，一位奶奶讲过自己儿媳和孙子的故事：儿媳在外面卖衣服，正月背着一个大袋子出去，十二月背着一个大袋子回来，在路上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镜头偏转，另一个问题被抛出来：“你爸长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被问到的小男孩表情有些木讷，摇摇头说，“不记得了”。

留守不只是这些父母孩子要解决的问题，它也是整个社会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而问题上到处是连环的缺口。2004 年，撤点并校后的村小没了，孩子们面临四个小时的山路；快捷的交通工具被捐来，却没有能负载它的马路；路修好了，油钱和人工的费用又打上了问号。即使一切外部条件得到抚平，那个讲台上的人也没有了——张老师在对三百元的工资多次申诉无果后，最终黯然离开了。

剧情片《矮婆》里，云洁奶奶在一次危急抢救后回到家，当晚喊来自己的孙女，状似无意地告诉她寿衣在哪，并叮嘱她把粥放在床头，“奶奶自己待会

起来喝”。第二天，奶奶没有再醒过来，匆忙赶回的父亲只能从自己女儿口中得知寿衣在哪。独自在家带着姐弟俩的老人，前晚已经默默服下了过量的安眠药。

服药的镜头最终被删减，但蒋能杰觉得没有影响情节的交代。电影完成后两年，云洁的奶奶真的去世了，电影仿佛成为了一个预言。被压迫的现实在电影内外交织，它包含的是无法自由表达的创作，是乡村的留守，医疗和养老保障，是家庭创伤下父母和子女两种缺席。

而时间匀速消逝，生活继续向前。2013 年 10 月，云洁的父亲蒋廉生回到家乡做起了装修工，妻子成为村里的幼儿园老师。2019 年，加一的母亲徐梅也做出了辞职回家的决定。

至少在光安村，蒋能杰的镜头已经带来了一些变化，一些大学生联系蒋能杰开展了留守儿童筑梦计划，有孩子对着屏幕那边的妈妈说，“我爱你”，从此父母回家的频率从三五年一次变成了逢节假日必返乡。第二次乡村摄影展办了起来，有孩子形容相机给了他“看世界的神秘角度”。

云洁考入了一所职高学校的会计专业；蒋能杰之后，光安村迎来了第二位回村的大学生教师范乐梅。尘肺病患者赵品凤留下的子女，也接受了来自公益机构的长期助学。

2020 年 1 月 13 日，蒋能杰参加了央视节目《遍地英雄》。大屏幕上显示出光安村棉花沙图书室的画面，蒋能杰的父亲成了图书管理员。孩子们在长桌围坐一团，开着读书会。不同面孔在这十年的记录中不断闪回。

而蒋能杰依然在镜头之后，他的工作也在继续。“我们把这个叫做：等待故事，发生变化。”



► 蒋能杰

## 读者与社会反馈

太多人被美好的偶像剧，繁华的外界信息所包裹，才会害怕看见这些真实的现实。社会痛点的关注度和热度为什么永远是一阵阵的，我想是因为只要不是我们自己身处其中，一时的激愤热血，捐钱帮助他们完全没问题。长久能坚持下来真的很难。真的感谢有这样能坚持下来的人提醒着我们，我们需要看看真实的世界了。

——微信读者灼暄暄

我相信真实记录的价值与力量，且被更多人看到就越大：如果是纯粹的无商业想法，可以对个人采取类似于自由软件的无版权模式公开渠道并允许二次传播。同时也可以在不合适的地方放上自己的联系方式方便有心人联系打赏。

——微信读者后知后觉

导演的十年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标记一阵了，希望我们能给这样的记录者更多支持，毕竟时代的强音和背景音太重，而真实的声音太容易被湮灭了。前几日再去楼下载缝店改裤边，才知夫妻俩做裁缝已经三十年。不指望自己像他们一样如初执着，但我又能否持久地、不偏不倚地为自己或世界做些什么呢？

——微博读者 Alindy-

感谢您 @ 能杰 的坚持 说实话在看到这部片子之前，我对尘肺病真的一无所知。社会现实，是无法躲避开的问题。故事讲的也是小人物的故事，反映出来却是一个大群体的共同故事。

——微博读者 LoieeeeAngXrrrr

加油我导演，等待和春天一起发生变化。

——微信读者段雪松

诚心说一句，固执、坚持自我是挺好，但搞艺术的前提是，先把资金搞来、养好身体。

——微信读者楚目动人

拍摄被时代甩脱的故乡。

——微博读者 biubiubiu 反弹反弹反弹

# 陈志君： 他和他们的舞台， 在工地和乡间

文 / 韩梅梅 编辑 / 张希蓓 图 / 除另作说明，由受访者提供

“

在戏剧中，关系会被彻底颠覆，用戏剧去进行教学，意味着老师要邀请学生脱离现实角色，进入到另外角色，‘入戏’到新的关系中去，获得新的思考。

编者按：古语有云：“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在普通人的认识当中，精神需求似乎总是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以后才成为值得讨论的东西，但在生活水平已经普遍提高，绝大多数人不再为温饱挣扎的现在，什么才是边缘弱势群体真正迫切需要的东西，怎样才能提供真正有意义的帮助，是所有民生部门和公益机构必须面对的问题。

投入公益行业十五年，多年来致力于促进不同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对话、理解和共同行动，陈志君没有选择简单的教育支持或物质帮助，而是选择了即使在大多数城市中产家庭看来也十足前卫的“应用戏剧”、“协作”、“对话”等手法，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启发更多样的“想象力”之上。不一样的选择背后，是陈志君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 陈志君（蓝衣）

“面对今天这么多对公益的理解的是是非非，我实在不愿自己下一个定义加入其中，在我看来，这是我们正在扩展对‘社会’的想象力，而我警惕任何试图泯灭想象力的行为。”陈志君在博客中写道。

在他看来，想象力是刺破表象的剑，跨越鸿沟的桥，风暴中的灯塔。如此聚焦于“想象力”的他，也因此与外界刻板印象中的“公益人”拉开了些许距离。

“80后”陈志君，是一位公益从业者，一名教育戏剧推广者，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的儿子、丈夫和父亲。对于公益事业，他有点贪心，从打工社群、流动家庭到青春期少年和 NGO 从业者，都是他的“服务对象”，将这些看似互不相关的群体勾连起来，得到的是过去十年推动陈志君不断前行的信念：想象力，能够跨越人与人之间的理解鸿沟，沟通与共识因此可能。

“想象与我们不一样的人的境遇，才有可能成就真正的合作，才有可能打破旧有的范式，推动和平、公正和可持续的发展。”陈志君在那篇博文中说。

## 寻找自我之路

培育与激发想象力，陈志君最初使用的办法是“展示”。

大二那年暑假，陈志君加入了“灯塔计划”——一个由几名广州大学生发起，组织高校学生下乡义教的非政府组织（NGO）。彼时，陈志君在中大环境科学专业就读，他抗拒成为一个“工科男”，想转系读公共政策未果，空闲时便窝在图书馆读与教育相关的书籍。

与许多传统支教项目不同，“灯塔计划”的目标并非帮助乡村学校改善教育质量或提高学生考试成绩，而是为了让这些生在城市化大潮之外的孩子们“有机会接触别的东西”。为此，志愿者老师们绞尽脑汁，为了备课不计日夜，所有的汗水与努力则化为一次次不走寻常路的课堂体验：带着孩子们，他们一起制作水火箭，一起进行社会实践，在课堂中引入各种形式的游戏环节，也在许多次的课堂上谈论和接触各种艺术。

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希望这些对于“不一样的东西”的展示和体验，可以在孩子们心中埋下更多可能，从而在未来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一如“灯塔计划”的宗旨：方向引领一生。

为期一个月的支教活动给年轻的陈志君留下了深刻印象，孩子们的信任和依赖从此成为始终不竭的驱动力。直至大学毕业，他将之后的每一个寒暑假都贡献给了下乡支教。服务乡村教育，让陈志君找到了自我价值，但同时带来的还有困惑：在教育上，这些农村的孩子究竟需要什么？如何陪伴孩子成长，让教育公益可持续？

公益的一扇窗，由此被打开。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广州公益圈也迎来了春天，媒体界称广州是“最具公民社会气象的城市”，敢言、

有行动力的青年不断涌现。他们关心的议题，涵盖了文化教育、环境保护、个人权利、公共事务等各个方面。他们也相信行动会带来改变，崇尚多元价值、社会共治。借助着社交媒体入场，从互联网到现实，为社会对话扩宽空间。

“当时我第一次知道中国是有 NGO 的，民间组织是公民自发、自主组织起来，提供社会服务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这一下子打开了我的视野。”毕业后，陈志君加入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各路 NGO 工作者打交道，协办讲座、沙龙，运营公共空间等活动，塑造着他对公益的想象。

对教育的认识也在改变，“我要做的教育不仅仅是增进技能，而是令人更好活出自己，为自己和他人承担责任。”陈志君说。

► 大学支教期间，陈志君与孩子们的合照



## 打破边界的尝试

目标点明了方向，手段却仍需探索。

也是大学毕业那一年，在负责一个青年公民教育项目时，陈志君第一次接触到了戏剧工作坊。

在这之前，陈志君并非一个文艺爱好者，对他而言“戏剧”代表的仅仅是一些遥远的名词，幼年时他曾在一次表演时唱错词，事后被家人反复取笑，中学时则因为对流行乐不感兴趣，而无法融入同龄人的圈子……“艺术给我的印象是，它是任务，是身份，是关系，是别人的谈资。”

但在戏剧工作坊内，无所谓演技，也无所谓剧本的戏剧表达，让 23 岁的陈志君感到了“震撼”、“兴奋”、“解放”。“原来艺术也可以帮助别人，原来借助艺术，每个人有能力去表达自己，参与式的教育可以这么进行。”

► 木棉剧团集体创作剧作《我们的戏》



2005 年年底，在广州市番禺区一处外来打工者聚集地，陈志君与伙伴们成立的应用戏剧公益剧团“木棉剧团”初次登台。剧团将“一人一故事剧场”主题定为“过年”。在 60 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友面前，陈志君和志愿者们先聆听他们春节返乡故事，再通过即兴表演，呈现给观众，工友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讲，志愿者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演，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事后回顾，陈志君觉得，“那种心灵的震撼不亚于一次大地震。”他第一次在艺术当中找到了意义，“这种意义不是纯审美上的意义，还有服务的意义，是聆听、见证他们的生命故事。”

就处理工伤纠纷等现实问题，木棉剧团曾以论坛剧场的形式，组织外来务工者们参与讨论。“把我们想象的东西放在剧场中，将剧场变成一个实验室，去试试可以怎样做？”陈志君说，“这是很有力量的，我们会慢慢见到生活不是铁板一块，不是只有一个结果的，每个结果都是无数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得来的，我们可以如何选择？”他的理解是，参与式剧场承载了选择的探讨，提供解决问题的多种可能性。

剧团尽量选择边缘群体服务，从智障、残障人士到麻风病康复村，鼓励他们发声，增进不同社群间的对话。在陈志君看来，戏剧的魅力在于其公共性，勾勒出人的相互连结，并为此催生行动；戏剧的珍贵在于其将不同人不同事演推至极致，赋予观者想象力，打破固有认知边界，新旧交汇，思想就此被激活。

走进入群、深入社区的应用戏剧，能否成为连接教育、公益的那座桥梁？陈志君希望，能成为这种艺术力量的分享者。



▶ 陈志君在《五年级的交叉点》中扮演爸爸向安

## 新的探索

对于应用戏剧的更深探索，在六年后将陈志君带往了英国。

作为应用戏剧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教育戏剧（Drama in Education）发源于英国，它强调以戏剧为载体，引导孩子们在情景实践中学习。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通过了《教育改革法案》，将戏剧教育收录进学校正式课程，意在借助戏剧探讨社会问题，启迪思维。

而迟至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在南国一隅开始投身应用戏剧的陈志君，则在不断实践中遭遇了越来越多的疑问：应用戏剧需不需要有艺术性？需不需要更加“专业”？引导工友们采用一人一故事剧场、或是定格某一个画面的形式来完成自我表达，这与

他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关系？戏剧的解放力量如果真有，那么它又是如何实现的？

2011 年，陈志君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一起踏上了飞往英国的飞机，将进入华威大学攻读教育戏剧硕士。

在英国，老师告诉陈志君，戏剧是一种最民主的教学方式。

“在传统的课程上，教师是掌握权力的，教师叫你这么做，你只能这么做。而在戏剧中，关系会被彻底颠覆，用戏剧去进行教学，意味着老师要邀请学生脱离现实角色，进入到另外角色，‘入戏’到新的关系中去，获得新的思考。”对传统“灌输式”的教育，这位新晋父亲也开始有了更多反思。

“我们的教育过于偏重知识的记诵，过于强调正确答案，这样的教育是与真实生活脱节的……当我们‘学完’后，我们身处的世界仍然犹如黑房。”几年后，陈志君在一篇相关主题的约稿中写道，“戏剧就像火柴、蜡烛或火把，它照亮黑房，让我们看到片刻真实和复杂的世界。”

华威大学的教育戏剧硕士课程设计，三分之一的时间学生们用于学习表演，另外三分之二的时间，则学习社会、政治、文化等理论课程。

课余，陈志君和同学们会去往当地的小学，进行教育戏剧的教学实践。

“在海上，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岛。有一天，岛上闯入了陌生人。岛民从恐惧、尝试到接纳，但最终还是把外来客踢出了小岛，然后在岛上筑起了高高的墙……”根据这个绘本内容，孩子扮演岛民，教师则负责扮演关键角色外来人，制造张力、引导讨论。“我们究竟要不要把这个人扔出去，还是要接纳他？学生代入角色，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

陈志君认为，和一般戏剧不同，教育戏剧无须排练，

也不讲表演技巧，重点在于营造场景，带领学生投入到情境和角色中，探索其角色、事件及背后的社会意义，利用戏剧互动冲突，激发一探究竟的热情。

在英国，亲历过唾手可得的艺术资源，近在身边的社区剧场，不同人群的观点碰撞……陈志君直言，“好羡慕”英国的课堂环境，学生们能通过教育戏剧更贴近社会议题。但与此同时，他也十分清醒，“我的实践应该在国内。”

他依然想成为能够改变社会的人。



▶ 陈志君和伙伴们与留守儿童一起走放学路 / 应用戏剧引力波



▶ 善导将访谈关键信息整理筛选，再决定在戏剧中探讨呈现什么 / 应用戏剧引力波

## 交叉点

2013 年底，陈志君回到广州，开始和几个公益伙伴共同运营善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下称善导）。

2015 年至 2017 年，善导走访了珠三角流动人口社区，收集了超过 30 个流动人口家庭的故事，创作了关注流动儿童家庭亲子关系的话剧《五年级的交叉点》，在外来打工人员集聚的深圳市龙岗区等地进行了数场公演。

过去 10 年，城市流动人口的问题在不断改变，农民工群体在变老，但城乡之间公共服务鸿沟仍存，其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户籍门槛始终高悬。在善导调研的流动人口社区，面临孩子升学是否“回老家”难题的家庭，比例高达 80%。

故事剧本由此展开：“和很多外地来广州打工的家庭一样，燕子的爸爸妈妈当初也怀揣着让生活更好的愿望来到广州打工奋斗，但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上学问题也成了这个家庭关注的中心。怎么留在城里，要不要送回乡下……”

陈志君说，这是“回归初心”。演出结束后，作为观众的孩子、家长被邀请发表观点和感想，分享切身经历，并且组织论坛剧场，鼓励观众试着带入角色，和演教员互动。

善导的工作人员们发现，流动家庭的家长们对下一代的教育是有期待的，但在教育态度上，出于制度壁垒等等原因，他们“无可奈何”或“事不关己”。这导致了他们尽管有让下一代接受更好教育的愿望，但却并不会为了这些愿望而付诸行动。

教育剧场的使用，目的正在于打开探讨空间，唤起家长的改变动力，帮助其参与管教孩子和改善家庭

环境，同时，也是为了帮助公益组织服务这些流动家庭，为之打开思路和局面。

2017 年至 2019 年，善导又和广州市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合作，推出了第二个教育剧场项目“防范剧场”：在广州中小学中，以互动参与式剧场的形式，对学生群体进行普法教育。

除了应用戏剧，近年来陈志君与善导的工作也越来越向“协作技术”（Facilitation）倾斜，这一抽象理念杂糅了非暴力沟通、换位思考、参与意识、合作共融等等，正在成为陈志君多年公益、教育经验积累和愿景的注脚。善导相信，拥有协作意识、技术与视野的“协作者”（Facilitator）能够促进社区和社群的转化，促进人们在参与中学习，从而培养有能力面对问题的个人与社群，推动共同决策和行动。

回顾过去十五年走过的路，想象与创造力始终是陈志君最为重视的东西。“过去我曾认为创造力不过是一种天马行空的表达，”他总结，“但现在我认为，创造力是一种能够想象‘生活可以如何’的能力。”

有的时候，正是这一点点想象力方面的区别造就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有创造力的人，即使在困境中，也能够拥有能动性。”陈志君说，“ta 始终相信自己的创造可以让现实变得不一样。”

## 读者与社会反馈

接触过针对一般儿童的教育戏剧，受访者聚焦弱势和边缘人群，很棒！

——微信读者哈哈哈哈哈

“把我们想象的东西放在剧场中，将剧场变成一个实验室，去试试可以怎样做？”陈志君说，“这是很有力量的，我们会慢慢见到生活不是铁板一块，不是只有一个结果的，每个结果都是无数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得来的”。

——微博读者 siceng- 北京



▶ 木棉花开民众戏剧研讨会

# 林红： 十一年，她寻找那些 正在改变世界的普通人

文 / 谢雯雯 编辑 / 张希蓓 图 / 除另作说明，由受访者提供

“

她从多年埋头苦干中抬起头，看到在全国的各个角落，有一群和她差不多的人，正在为解决某个社会问题而不断探索、努力。

编者按：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讲述了二十个关于普通人如何努力改变社会的故事。他们在生态环保、教育、养老、乡村振兴、文化等领域辛勤耕耘，或陪伴一群人、或守护一方土地，一点一点推动着我们社会的进步。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并非所谓的“孤胆英雄”，在他们不断探索的路上，有一些人一直在支持他们。本篇故事的主人公林红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2020 年，新冠疫情和国际局势让许多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和孤独。在每个人都经历过长期自我隔离，希望和信任几近干涸的当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期盼，期盼来自四面八方的涓涓细流在某个时刻汇成江河。

林红希望，自己在做的事情，能成为一个新的出口。

36 岁那年，林红决定离开学习和工作了 18 载的计算机科学和互联网领域，扎进“公益圈”。

她做的并非传统意义上泡在一线的乡村教育、保护水源这样的公益项目，也非更多人熟知的捐钱捐物的“慈善”。理解她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的人，并不太多。



▶ 民勤县位于两大沙漠之间 / “梭梭农庄”



▶ 林红

## 【一】散落

2009 年，林红在北京进入了微软亚洲工程院的“中国创新组”，那时的她已经是微软高级项目经理。而在遥远的甘肃，另一个人正在经历人生的灰暗时刻。

那是一个外表精干的甘肃小伙，名叫马俊河，他的家乡民勤县位于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的夹缝中，是中国北方地区的沙尘暴起源区之一，也是战略性的生态屏障地带。

2009 年是他和另一名志愿者牵头成立“拯救民勤”志愿者组织的第三年，迫切想要做更多事情的他，辞掉了兰州的医药销售工作，回到民勤，发誓要从荒漠化手中抢救自己的家乡。

面对黄沙，他能找到的最好办法就是种下尽可能多的梭梭苗。这种多年生落叶小乔木耐干旱和盐碱，

可以防风固沙，被称作西北治沙的“先锋树种”。但那年的春天，“拯救民勤”连 3000 元也未能筹到。此前攒下的积蓄也已所剩无几。

他没钱买树苗、没招募到足够志愿者，也不被乡亲们理解。春日不等人，能够种植梭梭的时间，一年只有那么几十天，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马俊河一次次奔进沙漠——他到底要如何拯救自己的家乡？

也是 2009 年，在广西，北京姑娘璐瑶在贫困县田阳开始了支教生涯。

动身前她刚刚在英国完成了金融、管理两个硕士学位。在支教的第一堂课上，问起孩子们对未来的畅想，孩子给出的回答大多是像爷爷奶奶一样种地，或像爸爸妈妈一样去广东打工，那之外的第三种可

能似乎并不存在。这对璐瑶触动很大，她鼓起勇气告诉指导她的本地老师：“我想发起一个助学项目，带孩子们看看外面的世界。”

没人阻止她，但也没人认为她会成功。没有资金来源，她先用自己的薪水支撑起了这个名叫“巴别梦想家”的小小项目。在当地没有社会关系，她就先从愿意让她试试看的开始做。她是项目的主要资方、管理者和当时唯一的员工，平日勤奋工作，假期奔赴广西。

没人知道这能持续多久，璐瑶自己也不知道。她只是以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为代价，将这个暂时运转了起来。

远在北京的林红尚不知道这一切。对比起来，她的烦恼显得“正常”得多：在电子平板产品还未普及的 2009 年，她的项目组想做一款可以用于存储课程

录像和书籍资料的“电子书包”，解决中国不发达地区的教育问题，从而获取市场。

设想很美好，“中国学生只要带着那块平板去上学就可以”，问题在于定价：技术精英们震惊地发现，对于微软来说已经没有利润空间的价格，依然相当于他们目标客户家庭一年的收入。此外，电子书包非常缺乏内容，也并不符合受众需求。

林红，一个外人眼中的标准“学霸”，却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感到了无措。她从小出身优渥，在九十年代的北京，在北大上了一学期课就出了国，在瑞士、美国名校就读计算机本科和硕士，25 岁毕业后顺理成章进入“硅谷圈”。

那个时候，对她来说，“中国”就是“北京”的同义词。



▶ 璐瑶与梦想家孩子们共同讨论机构未来愿景 / 王身敦

## 【二】惊醒

2009 年年底绩效考核的时候，林红在上司面前崩溃地哭了。团队这么努力，却并没有做出站得住脚的产品。老板诧异地问她，是对薪资水平不满意，还是对升职速度有异议。她哑口无言。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东西不对劲。

一次闲逛，在北京大学一个书摊上，林红顺手翻开一本叫做《如何改变世界》的书。

答案来得猝不及防。

世界原来可以通过如此多种多样的方式被改变：一位印度女性大学讲师创立 24 小时紧急救援热线，为百万失散儿童寻亲服务；一位巴西农机系毕业生，用了 20 年时间探索技术革新，为 2.5 万个低收入家庭供电；英国护士南丁格尔深入战区研究护理学，打破偏见和陈规，将英国军队医院的死亡率从 43% 降到 2%，也促成英国医疗系统改革。

这些创新者针对社会问题进行的探索，经过长期不懈的试错和迭代，最终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变。

书中写道，“事实上，我们能以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改变世界。”在迷茫中困守的林红，感觉自己找到了一个出口。

改变的契机也随之而来。那时，南都公益基金会正在招聘，想着《如何改变世界》中描绘的景象，林红从微软辞职，成为南都基金会的项目总监。

在当时，中国大部分基金会走的都是“项目制”或支持机构的模式，而国内成熟的公益机构和项目都还很少。众多公益人尚处在摸索阶段，不但无法给出“三年后我的项目会是什么样子”的预期，就连当前项目运营模式也难以清晰解析。



▶ 2018 年，林红和伙伴丫丫在柴窝堡附近的山里埋放的红外相机中看到了雪豹的身影

而这些尚未摆脱茫然无措状态的先行者，往往就是最需要支持和帮助的那些人。结合《如何改变世界》中支持先行者本人的模式，基金会开启了一个支持“人”的“银杏伙伴成长计划”，林红成为负责人。

尽管此前管理经验不可谓不丰富，林红还是在第一步就犯了难：当时，中国几乎没有机构在做类似实践，没有本土经验可参考。她有一些模糊的感觉，却无法清晰界定——她需要支持的是什么样的人？如何评判一个人是否符合标准？怎样做才是对的？

但她明确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将电子工具交给农村孩子，却不教他们使用网络课程，那是不对的；通过给留守儿童播放父母打工的视频，让孩子、家长在连线中哭成一片，说自己是解决了问题，那是不对的；游戏开发商做个时间限制小补丁，就得意洋洋宣称“科技向善”，那是不对的……

一厢情愿的好意不代表能真正解决问题，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应该是空中楼阁地利用科技，也不应该是向某个匮乏地区粗暴地“砸”资源。

为了寻找答案并找到“对”的人，林红和团队开始频繁出差，去触摸北京之外的中国。

### 【三】相识

2011年，林红和同事在甘肃民勤一片新生的梭梭地里认识了马俊河。

那时，马俊河和他的梭梭似乎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2010年开始，马俊河决心对治沙事业进行专业化管理，另一面也更加致力于寻求社会支持。

他展示民勤治沙成果的图文和视频，逐渐出现在一些媒体版面上，这个将自己的人生与家乡土地相连的小伙子渐渐有了些名气，他的梭梭事业也获得了不少外部支持与肯定。

但这些名气和社会支持，在民勤面对的严峻威胁面前依然杯水车薪。林红和团队意识到，面前这个皮肤黝黑的西北小伙就是他们要找的人：那是马俊河全职治沙的第六年，他和志愿者们种下的千余亩梭梭正绽出新绿。

更重要的是，马俊河很清楚，治沙不可能只靠小部分有意识的人、靠机械地种梭梭。如果有更多试错空间，他想探索更绿色、科学的方式，帮助父老乡亲脱贫致富，让更多人愿意留下守护家园，而不是一代代人逃离。

2018年，被林红和她的同事“找到”的时候，璐瑶还在奋力地为梦想家奔走呼喊。

那是璐瑶彻底辞去上海上市公司工作、全心投入“巴别梦想家”的第四年，是她陪伴当地乡村孩子走过的第九年。但在当时，梦想家还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和认可，在资金、人员和项目上都还有很大困难。

九年来，璐瑶通过建立“成长共同体”，对一群未离开过家乡，平时很少见到父母，情感和上都极为封闭的孩子们进行全心的陪伴。璐瑶自己也不停地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活动不停升级迭代。

虽然收获了孩子们的信任和成长，璐瑶却在众多机构资助人面前频频碰壁：她只有一个人，她的参与式工作坊方案再怎么成熟、优秀，一年时间能够新增加的“服务对象”也只有十多人。单从增量数字上来看，九年下来她只服务了八十多个孩子——那太慢了，规模化何在？效率何在？

林红和团队笃定璐瑶正是那个对的人。在一个越来越追求“短平快”、追求规模化影响力的时代里，她的“慢”并不是因为不够努力和不够聪明。

在林红看来，社会领域中的“规模化”，远不是公众熟悉的商业范式中的模样：商业中的规模化可以通过钱，即资本的转移、业务的铺开来实现；但在社会领域，真正实现规模化更多需要依靠的是“社会资本”的创造，即依靠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信任和互惠。

因为涉及人的意识和社会规范的变迁，这个过程更慢、更需要耐心，社会企业家每一份努力都是为了抵达和连接人心，带来真实、深刻的改变，“不会因为你没有跑赢一条赛道，就化为乌有。”

林红坚定地要支持更多这样的人。在当时的状况下，其中最基础的，是给予每人连续三年每年10万块钱的资助。这笔资金让一些创业家在一段时间内不会为生计所困，让他们中的一些人获取父母的认可、能够宽慰家人，或是去尝试一些看起来极具“冒险精神”的实践，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后来，大家逐渐发现，钱之外的挑战还有很多，正因为社会创业的“慢”，散落四处各自为战的创业家常会经历孤独、漫长的旅程，有时也会迷失方向，迷失自我。

随着社会的进步，下一步需要做的是让这些社会



▶ 韦祥龙在布依族村寨做田野调查，询问织锦图案的象征意义和工艺特点 / 王身敦



▶ 2009年刚加入的苏光富与长大后的苏光富 / “巴别梦想家”

创业者的视野格局增大，思维和行为模式产生改变，更系统地看到问题的关键，与相关方共同去解决问题，去寻找平衡点。

林红希望能把这些人以某种方式连接在一起。2015年，“银杏计划”从原本的组织架构中独立出来，成为“银杏基金会”，探索一条新的路径——建立社会创新者的社群。

个人英雄主义很难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银子弹”。林红说，“因为社会问题很复杂，不是靠一个人就能解决的。”在新的探索下，每一年，这些被称作“银杏伙伴”的社会创业家都会相聚一到两次，互相交流、建立联系，贡献社会问题整体和系统视角中自己的那一部分。

### 【四】相聚

2019年，民勤志愿者协会接收的志愿者人数突破了一万人大关。更重要的是，在马俊河和伙伴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本地老乡也纷纷加入种梭梭、保卫家乡的队伍中。

马俊河发起的农业合作社与132户农民签订了包销协议，授权网店27家，累计销售农产品2483.7万元。种植梭梭之余，他本人也变身“种梭梭的马哥”，带领乡亲们利用电商直播带货。沙漠里种出的蜜瓜、西红柿、小米、肉苁蓉……和它们背后的故事，通过直播摄像头和麦克风呈现在全国消费者面前。

在广西，“巴别梦想家”项目迎来了自己的十周年，多年的陪伴和积累正悄悄裂变。

近几年开始把适龄孩子送出大山、送进大学的璐瑶，第一次在田阳县的凉茶铺里迎回了一个孩子。那是璐瑶十年前第一批陪伴的苏光富，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定回到群山环绕的家乡、回到“巴别梦想家”，成为璐瑶外的第二名全职员工。



沙漠中的梭梭 / “梭梭农庄”

其他大学在读的孩子，也自愿在繁忙的学业中成为项目的主力，并在寒暑假纷纷回到家乡，一起担起从前璐瑶一个人支撑的“使命”，主导陪伴、服务超过 10000 名境遇相似的孩子。更多的人看到变化的发生，梦想家的项目得以被带到了百色市，服务对象也从学生拓展到年轻乡村教师。

而在银杏伙伴社群的建设下，通过单笔小额资金支持、营造合作场域、鼓励和培育社会创业家们的合作文化，更多伙伴间的火花碰撞和协同合作也正在发生。

从前是记者、做打工子弟教育的欧阳艳琴，与服务女工的齐丽霞，合作开启了“女工故事博物馆”，鼓励和支持女工和他们的孩子写自己的故事，通过写作中表达自我，向社会发声，促成交流与理解。

布依族的韦祥龙和藏族的更确木兰两位来自不同少数民族的创业者，则合作举办了“藏地之花”堆绣技艺培训，在教授藏区牧民这一中国传统手艺，在尝试为少数民族地区创造新的经济点的同时，也探索着传统文化的传承。

分别处于环保、儿童阅读、罕见病这些不同领域的张伯驹、梁海光、王奕鸥则在各自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共同探索了突破筹款壁垒的方法，并把经验集结成文字免费分享给了大家。

当新冠疫情来袭，已建立起信任关系的二十多位社会创业家，在专注人道主义救援的郝南和另一位银杏伙伴陈丹的号召下，迅速反应与集结，各司其职、齐心协力，从全国各地为当时湖北还在等待床位的重症患者购买和输送他们亟需的制氧机。最终在不到 20 天的时间内，自行和带动其他企业、个人向湖北输送了约 3000 台制氧机。

说到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合作，林红总是十分激动和振奋。她眼前仿佛出现这样一个画面：在一条昏暗、看不见路的路上，行人不多，一开始影影绰绰看不真切，但当有几个人先成功点亮了微弱的灯，更多同行者看到了彼此，能够你扶一把我、我提醒你一下你，继续走下去，继续去点亮更多的灯。

“原来老有人问我为什么做‘梦想家’，我经常这么说，有些事情我看到了，我没法装作没看见，我骗不了自己。我觉得银杏也是这样一群人。”璐瑶说。

“虽然大家有不同的领域、价值、不同做事的选择和策略，但是（他们让我看到）这个社会中有很多人是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让我知道不是只有我自己。”

别人遭受痛苦，不愿袖手旁观。别人失去机会，不能漠然视之。她从多年埋头苦干中抬起头，看到在全国的各个角落，有一群和她差不多的人，正在为解决某个社会问题而不断探索、努力。

## 读者与社会反馈

心怀天下，脚踏实地；  
比肩而立，彼此为荣。

——微信读者伯驹（银杏伙伴）

最近在独自做一个公益项目，一开始的热情逐渐淡去，需要这样文章继续鼓舞自己。感谢！

——微信读者好好学习，天天锻炼

我也一直告诉孩子：努力学习不仅仅为了找一份好工作，你们这一代人是改变世界的。人活着是要让自己和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三十岁前的我都是想着更好的工作更大的房子，理解到这一点是在我三十岁后，但我希望我的孩子在小时候就能建立大的格局观，这个世界才会被长大后的他们变得更好，希望如此吧！

——微信读者 kemeyhan

社会领域的问题通过“社会资本”积累解决，社会资本的核心就是人的意识改变和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建立的信任和影响力。希望更多的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能不断加入和传播他们的思想，让这个时代变得更好！

——微信读者方江丽

感动，也想做这样的人，还有哪里招募志愿者吗？我也想尽点绵薄之力。

——微信读者 Alisa

看了感觉很温暖，又联想到了鲁迅先生说的：世上本没有路，有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微信读者 zhangjp

## 《必有回响——记 21 位社会创业家的故事与社会反响》

内容出品：世界说、银杏基金会

内容编辑：谢雯雯、张希蓓、朱逸蕾

排版设计：林兆茵

文字校对：欧阳庆、谢雯雯



## 银杏基金会

微信公众号：银杏基金会 (ginkgofoundation)

新浪微博：@银杏基金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 9 号东环广场 A 座银杏空间号  
东环广场 A 座银杏空间



## 世界说

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globusnews)

新浪微博：@世界说的小世儿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 8 号院三里屯 SOHO 6 号楼 5 层  
财新传媒



